

炎黄春秋

第 **5** 期
2009 年

“五四”精神 普世价值

高占祥：普世价值不可一概否定

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

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

另一个段祺瑞

目 录

求是篇

- 1 “五四”精神 普世价值彭 迪 钱 行
6 五四运动及民族主义的走向子 明
10 大学大学：何时再有蔡元培章立凡

春秋笔

- 17 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宋以敏
26 住房改革的由来与现状杨继绳

往事录

- 28 南京是如何解放的许荏华
32 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林蕴晖
39 国民党在大陆“二五减租”的失败杨天石
43 “4821”苏修特务案韩 磊

一家言

- 46 普世价值不可一概否定高占祥
47 社会主义的世纪遗产应克复
49 谁都摆脱不了客观规律的掌控冯东书

亲历记

- 52 从我的经历看反右郭道晖
60 一个小学生在1958年的经历高 明

人物志

- 64 李正文的奇功张惠卿
72 另一个段祺瑞杜婉华

怀人篇

- 74 耀邦同志教我们做人做事
——公开一个鲜为人知的批示马懋如
76 缅怀萧克老将军黎 白

古今谈

- 78 汤寿潜与晚清立宪运动傅国涌

海外事

- 83 一个人的抗议史贾西津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荣华 李 普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维民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杨天石 杨继绳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徐 孔(副召集人) 秦 晖
袁 鹰 高尚全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曾彦修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 徐 孔 吴 思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社 长：杜导正

副 社 长：徐 孔 杨继绳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执行主 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网 络 总 监：张晓鸥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白建钢 郎福呈

秘 书 长：徐 孔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发行部 邮箱：yhcqfxb01@126.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010—68525374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6.90元

“五四”精神 普世价值

• 彭迪 钱行

“五四”运动虽然已经过去 90 年,它的划时代意义没有过时。它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不但给中国人民指出了救国兴邦的道路,而且以最精炼的语言概括了近代文明世界发展进步的基本原则和前进方向。

1919 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爱国革命运动就是在“五四”精神鼓舞下席卷全国,震惊中外,它象征着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里程碑。毛泽东说过:“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毛选四卷 523 页)人们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五四”精神是普世价值观重要的组成部分。

“五四”精神的要点:一是人民作主,尊重本国和全人类的个人价值和基本权利;二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按事物演变的科学规律办事。“五四运动”的先驱者把这两点精神亲切地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取自英文 Democracy and Science 第一个音节的谐音)。

这两位老师对指导人类的生存与进步的重要作用,已为世人公认。但对这两个老师是文明世界的孪生兄弟,不可分割,同样重要,缺哪个都不行的观点则见仁见智,不见得人人赞同。这种现象也不奇怪。因为人们对“民主与科学”二者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效益,认识有深有浅。人类能适应、驾驭甚至一定程度改造客观世界以利生存和发展要靠科学智能。这一点,不言自明,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但民主精神对促进科学发展和指导人类社会,包括各种群体,社团,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和谐相处,共同进步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得到所有国家认同。此外,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民主改革涉及政治权力的归属转移,往往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而裹足不前。

笔者两人都是在“五四”时代出生,耳闻目睹

世界大战的风云变幻,参与过烽火连天的抗日和解放战争,体验过我国革命胜利的喜悦,也遭受过人为的折腾磨炼。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我们又曾同时或分头在苏联东欧和西欧北美等国家工作或访问,给了我们一些观摩比较和反思的机会。这种跨世纪跨国界的经历给我们留下许多难忘的印象和感慨。其中也许最切肤的疑难就是:为什么我国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尽毕生精力,出生入死,忘我战斗,在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和谐的中国时竟会在自己国家内遇到这么大的人为的阻力和困难?我们略有自知之明,没有下过硬工夫,没有足够的水平从研究经典著作中找出答案。欣逢“五四”运动 90 华诞,我们只想略尽老骥绵薄之力,对“五四”以来这段时间里自己的见闻和体会稍事梳理,试图找出一个简明的答案以邀批评指正。我们发现,一个最通俗易懂的答案其实就在“五四”精神之中。

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证明,那些既重视科技开发,同时也重视民主建设的国家,大踏步前进。世界进入近代文明时代以后,在发达国家中,科学与民主往往是接踵而来或同步发展,相互促进。例如在西欧,12 至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反映了人们人文主义精神和个性解放的人权观念的觉醒,在政治思想、哲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欧洲教会和皇权的专制统治进行了坚决、反复和持续的斗争,从而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后来的创造发明开辟了道路。在英国,18 世纪初的科学发明带动了工业革命,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同时也培育了新的知识分子和日益强大觉醒的产业工人,紧接着就爆发了 19 世纪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宪章运动”。由此可见,民主为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和科学研究创造条件,科学为探索社会前进方向 and 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依据。

既不讲科学,也不讲民主的政权,外不能抵御强权,内不能取信人民,迟早要被历史淘汰。只讲科学,不讲民主的国家,也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希特勒统治的德国,科技水平相当高,不可一世,但他的法西斯主义,对内屠杀犹太人,对外侵略扩张,国际国内,丧失民心,导致彻底垮台。日本军国主义也是仗势科技发达,军力强大,在亚太地区逞强,残暴侵占杀害外国人民,受到中美等受害国家奋起抗击,最后战败投降。

前苏联东欧从国防需要出发,对军事科学相当重视,这可以理解,但不讲民主,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由少数人,一个党甚至一个人对大多数人实行专政。这种对民主精神的背离迟早要受到惩罚。笔者首次去前苏联东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看到它们的生活条件,教育水平比中国高,我们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高兴。另一方面也看到一些负面现象。

莫斯科的建筑高大庄严,令人肃然起敬。但道广人稀,日用商品奇缺。一些官员向我们宣讲他们的成就。但人民情绪不高,工作人员散漫拖拉,政治气氛沉闷,说话小心谨慎。在东柏林,工人游行示威,人们把汽车打翻在街头,苏联派出几万军警镇压,形势紧张。那时,波兰比较宽松,市民愿意和我们来往交谈。不久,波匈事件爆发,连匈牙利的领导人都被苏联军队逮走枪毙。后来听说中国劝阻苏联出兵华沙,波兰才免遭同样命运。捷克斯洛伐克气氛也显得紧张,人们和我们说话有所顾虑,在公共场所,左顾右盼,欲言又止。若干年后,当苏联的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以“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布拉格之春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捷克人民为什么紧张。只有南斯拉夫气氛比较自由开放。尽管中国追随苏联,公开批判南斯拉夫,但笔者在那里采访时,当局对我们中国记者还相当客气,反映了这个国家在铁托领导下的气度不凡和自信。1956年我们在北京,忽然听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报告,揭露斯大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残杀干部和人民的真相,骇人听闻,出人意外。过去我们爱唱的苏联歌曲“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们心里在问:这个国家在哪里?

和许多中国同事和朋友们一样,我们都很纳闷,都在思索议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怎么啦?

当时的政治气氛既紧张,又活跃。大家思想上如饥似渴,想知道事出之因,想预料发展前途。主观上出现了调查研究、分析总结的愿望,客观上也出现了这种机会。遗憾的是,从1957年夏天开始,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反右政治风暴,为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唱赞歌。一场如实总结经验教训以利清醒前进的历史机遇就这样擦肩而过,从而切断了一场新中国的思想启蒙,中国又回到了一轮又一轮的愚昧时期。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强调在中国“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全国鸦雀无声。

历史无情,中国的“最高指示”救不了苏联和东欧。20多年后,几乎是一夜之间,苏联和东欧的专制政权全部解体垮台。许多人认为,它们失败最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假“无产阶级”之名,行专政之实,违反民主,失去民心。如果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应该同情数以百万计的被专政致死的苏联人民,并从苏联的失败找出内在的原因,引以为戒。但在中国,有人不仅不对前苏联和东欧广大人民的新生祝福,反而竭力为专政者的失败唱挽歌,牵强地归咎于外国干涉,甚至对那些杰出勇敢的民主改革的领军人物如瓦文萨和哈维尔等,冷嘲热讽,公开非议,严重地伤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感情和民主精神。

1956年我们第一次到英国当记者。那时大英帝国已经衰落,不再是对外殖民扩张的霸王。我们第一次看到坚强含蓄而幽默的普通英国人。二战中伦敦被德国轰炸破坏得很严重,有些地方还留下炸弹的伤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自豪的英国人继续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和正义。在伦敦和其他城市,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和平游行示威,反对英国政府追随美国的战争政策,有少数警察保护,秩序井然。在英国议会两院,我们目睹首相或其他官员向议会汇报政府工作,接受审查。那时正是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许多议员发言批评英国政府的中东政策,艾登首相为此而被批判下台,由麦克米伦接替。离职后的丘吉尔虽然威信很高,但只是一个普通议员在座参加讨论。在海德公园,各种观点自由讨论成风,既是政治生活,也是思想交流。在这里,没有多少清规戒律或不许人们说三道四。

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称雄世界,对外横行霸

道,不讲民主,凭借军事优势,推行单边主义,一再武力扩张侵略,干涉他国内政,残害外国人民,结果是从古巴、越南到伊拉克、阿富汗,到处碰壁,屡战屡败而屡教不改,在国内国外威信扫地,形影孤立,如不改弦更张,对外遵守国际行为准则,采取民主和解,平等待人政策,终将走向衰败。这次美国人民选出名不见经传的黑人入主白宫,破美国历史的纪录,反映了美国人心思变。在此关键时刻,美国能否虚心总结教训,改过从善,世界都在以怀疑的态度等着瞧。美国一大优势是对内讲民主。虽然它的民主制度远非完善,尤其是执行中问题不少,但它立国的基本原则“民有民治民享”,在维护人民当家作主,议政参政,批评监督弹劾党政领导的基本权利,保障言论学术思想自由,广纳天下英才等方面,有独到之处。这是美国人的骄傲,也是美国力量的源泉,不可轻视蔑视。

对中国来说,只讲科学,不讲民主的教训也很深刻。在这里,重温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片段也许是有益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闭关锁国、腐败虚弱的清廷面临列强侵略欺凌,不学习国外全面提高国民科学水平和公民意识的成功经验,企图单纯靠军事上重整旗鼓兴邦而反对在内政上革新图强。其结果是李鸿章、张之洞的坚船利炮洋务运动既没有扎实的科学根底,更没有民主制度的有力保障,其结果是前方兵败如山倒,后方康梁的立宪变法被专制王朝无情镇压而夭折,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下,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当时中国的主要敌方日本走的恰恰是一条相反的道路。他们上下一心,坚决维新图治,内外政策全面改革开放,而不是关门内敛和自我窒息。它一方面大力加强军事实力,同时大胆吸取外国在科学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成功的经验,大量出版本国的和翻译引进西方的书刊,重视知识精英而不是剥夺他们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其结果是一跃而成为第一流的强国,从中国东北开始,大举入侵,给中国造成无法忍受的灾难。这些教训刻骨铭心。

国民党在中国当政以后,犯了类似的错误。它拥有全国的资源财富和统治权力,控制全国所有的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拥有8百万美式装备的大军,企图凭强大的军事实力,消灭装备落后、

力量单薄的共产党的新生力量。但它对人民实行一党专政,压制民主,贪污腐化泛滥成灾,造成民穷财尽,怨声载道,在农村得不到广大农民支持,在城市遭到市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群众的强烈反对,失尽民心。与此相反,当时共产党取得胜利的诀窍是它在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在解放区实行民主制度,在蒋管区的城市中团结工人群众、知识分子和工商企业界,号召全国人民共同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共和国而斗争,深得民心。是正义和民主,而不是单纯的科技和军事实力,取得了胜利。

最后,回顾一下新中国建立后的某些失误的教训。如果讲真话,应该承认从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抄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中国也是失败的。它和“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原则背道而驰。中国一些开国领导人原来大都受“五四”精神感召,有的参加过“五四”运动,有的在西欧和日本等地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有着开阔的视野,立志为建设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中国献身。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领导决定拜列宁和斯大林为师,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取代了“民主与科学”精神。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和有关列宁主义的论述是我们党员反复学习的必修课。我党取得全国政权的第一天,更确切地说是进北平城的前夕,就向全世界发表宣告,将近代民主与科学的发源国家列为敌性国家。甚至将民主、人权、自由、平等、人道、人性等近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斥之为西方资产阶级独有的毒品,在中国必须消灭于萌芽之中。这种决策并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又没有经过民主讨论,属于个人拍拍脑袋就说了算的典范,结果是“五四”精神名存实亡,“德先生”实际上就“靠边站”了。

实践证明,这是严重的失策。用通俗易懂的比喻,民主与科学像一辆双轮车。如果只有一个车轮勉强往前推,结果不是歪倒,就是向后转。何况民主本身就是科学的组成部分,没有民主,科学、艺术、文学、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很难腾飞。

解放后我们党领导的反右,反右倾,大跃进和文革等都表现了对专制的偏爱和对民主的反感。反右,反右倾,大跃进和文革等,都是因为领导既违背了科学精神,更违背了民主原则,滥用

“无产阶级专政”手段,以言治罪,提倡思想盲从,不许发表与党不同意见。其后果是错误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给人民和国家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不可估量,一再使党和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沿。中国人痛定思痛,敢于面对真理的政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从东西方几十个国家几十年的实践中体会到,世界上没有什么永远伟大正确而不受实践检验不许修正摈弃的政党或主义。无数专政制度的受害者以自身或家人的鲜血和眼泪写出大量回忆文集,力求感动领导对那套不讲时代、地点、条件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思革新,回到民主和科学的轨道上来。

顺应民心,已故的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在30年前启动了历史性的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新道路。对新中国来说,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它首先在经济领域,对促进国家和人民的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扩大民主自由的作用,使“五四”精神复苏,中国面貌一新。邓小平在世时会提到政治改革开放配合经济改革开放的必要,但没有采取行动。继承他的领导人也不时提到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但专制思维和专政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政治改革仍处于举步维艰的阶段。

经济自由发展,而不改变专制思维和专政制度,政治和经济大权必然旁落,继续被少数人高度集中,不容一般公民和党内党外人士成立独立的机构监督过问。果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权钱结合,产生了权贵集团,垄断和蚕食国民经济,左右国家政治走向,从上到下,贪污腐化泛滥成灾,贫富差距拉大,公民权利受损,公正善良的公民和干部,没有关系网和后台,无权问津,广大的人民群众更是敢怒而不敢言。

由此可见,“发展是硬道理”不应该理解为只发展经济而不同时推进民主改革。只有经济和政治、科学和民主紧密结合才能避免走弯路和邪路,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腐败问题,促进国家走向民主自由,繁荣富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发展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家赞成。民主改革,让既得利益的权贵放权,阻力甚大。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它再一次证明,从专制转变为民主是何等困难。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将解放思

想列为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而不提倡阶级斗争和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解放思想的突出范例。缔造和谐与暴力专政是完全对立的。党的十七大的路线方针正确地将民主改革问题列入今后的工作重点之一。全国人民,海内外都表示拥护关切。领导采取有利于国家民主发展的措施,即使是小步前进,都得到人民由衷的拥护。损害民主权利的行动,即使事情不大,也往往引起公众的忧虑和评议。

多年来的人大政协两会中只见到代表们对重大国事提点具体的小意见,对党的决议主要是表示赞赏支持,举手通过,胜利闭幕。没料到例行公事之中,今年的两会出现了一些新鲜事物。

首先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一次小组会上表示自己“如果说了外行话,请大家指正”。我们这些年从早到晚听腻了大话套话,好久没有听到国家领导人讲这种平常人的谦和语言了。它使我们怀念老一辈领导人的领导风格。记得有一次周恩来给外事工作人员辛辛苦苦做了两天报告,内容充实生动。但他讲完后接连说了好几次“没讲好,没讲好”。我们相信这不是客套而是真心话,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相信胡锦涛讲的也是真心话,带了个好头。

令人更加瞩目的是,在这次两会期间,会内会外有更多的人敢讲真话,指出两会应该是国家议政的场所,不应该是各界名人的汇集所,更不应该是为了安排一些从政府工作岗位上退位的高官而设。两会代表应该是深入民间,为人民信任,能够而且敢于反映广大人民疾苦和心声的公仆。这届大会上突出的一位敢说真话的是广东的代表、中科院院士钟南山。他在一次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地说:“领导不在的时候,代表们发言讲得很深很多,很透很尖锐。领导在的时候,很多代表10分钟的发言,8分钟用来对报告歌功颂德,一分钟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一分钟来不及谈问题了。我感觉这样的气氛不太好。”

据3月11日《信息时报》报道,钟南山的发言获全场掌声,可见他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该报评论说:人民把代表和委员选举出来,为的就是把人民的苦衷倾诉出来,希望国家能重视民生难题,从而解决难题。评论指出,这些代表

委员们不应辜负了人民对他们的期望,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会外舆论,特别是网上的议政之风远超过会内。有人指出,我国领导人公开一再宣称依据国家依法治国,但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并没有执行。又例如“宪法明文规定代表全国人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实际上,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力机关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自相矛盾的法令都是共产党决定的,没有经过广大人民讨论同意,怎么解释都很难使人信服。据说这就是“中国特色”,是唯一正确的最好的制度,强调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种武断显然难以被全民同意。正如资深学者俞可平在两会期间发表的文章指出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针对一位官员严词宣布中国“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时,一位作者叶铭葆在网上发表感想,提出了两点评论:第一,用词不当。“西方那一套”是骂架的语言,等于说“老子不吃你那一套鬼把戏”。这对西方人珍惜的民主制度,很不尊重。第二,事实错误。西方并没有什么“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它们实行的是人民作

主制,由人民讨论,通过选举决定是一党、两党或多党执政,是轮流执政还是长期执政,而不是由某一党一家硬性决定自己永远执政。这位叶先生对各种政治制度的研究比我们更加严肃认真,更加内行,更加谦虚,也更加关注国际影响。

钟南山的发言,俞可平的文章,报刊或网上的评论,不见得人人都同意,但敢讲真话,社会上反应热烈,迄今没有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干涉压制,体现了我国公民意识的提高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值得庆贺。胡主席虚怀若谷、兼容并蓄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

如果这意味着我国开始从“专政”这个历史误区回到“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道路,那将是国家和人民之大幸。这样做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即令是那些“专政”的迷恋者或既得利益者也没有反对的理由。违反科学、害怕民主和实行专政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也建不成的。

科学发展,民主思潮,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五四”精神经得起实践检验。德先生和赛先生不能走。现在是真心诚意地将这两位老师同时请回来的时候了!

(彭迪系新华社原副总编辑,钱行系新华社对外部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 吴 思)

广 告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 2008040039 号 京医械广备字第 2008050153 号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6号

电话:010-64071474 64074641 64002810

传真:010-64055026

邮编:10000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B

电话:010-84608848 传真:010-84608847

邮编:100027

SW 声望听力 网址: <http://www.sw-tl.com>

解决听得见
听不清
耳聋
耳鸣的烦恼

五四运动及民族主义的走向

· 子明



梁启超

五四时期,即1919年前后的几年,是中国社会异常活跃的年代。广义五四运动,是指五四时期的多种国民运动,既包括“对外的”新外交运动(梁启超所谓“作为外交的国民运动”),也包括“对内的”新文化运动、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狭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千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唐德刚语)。对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笔者将另文阐述,本文只讨论狭义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走向。

在传统中国,有尊王攘夷的华夏中心主义,有朱元璋、洪秀全式的种族革命,有“三武灭佛”式的文化排外,但是没有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后者源于西方文明,对于中国来说是舶来品。梁启超说:“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法国大革命,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其《人权宣言书》曰:‘凡以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又其国之全体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于外国。盖国民者,独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火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

梁启超把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引入中国,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1905年的“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运动开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端绪,经过1915年的“抵制二十一条”运动和1918年的“抵制中日密约”运动,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达到顶峰。义和拳的排外运动和孙中山的排满主义都不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正宗,梁启超才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之父和直接诱发者。

梁启超很早就对中日两国将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会议上展开外交交锋有所准备。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际,梁启超就警告中国外交当局:“公等当与日本交涉时,勿忘却尚有战后之列强交涉行即相踵而至也。战后必有大会议,此大会议中,中国问题为重要议题之一,此稍有识者所同料及也。届会议时,日本对于此议题必能享受得最有力之发言权。此非惟吾国人知之,非惟日本人自知之,即世界各国当无不同认乏。日本如有正当之主张在,彼时岂忧不能贯彻,何以汲汲焉,必以今日提出?必以今日提出者,彼盖确信其所要之条件,在大会议时决无通过之望,故乘各国之无暇东顾,而因以协我云尔。”中日关系后来的演变,证实了梁启超的预见。

1917年梁启超力主对德宣战时,这样解释自己的主张:“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而言,非乘此时有所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必深明乎此两义,然后问题之价值乃得而讨论也。……今兹之事,吾侪所认为最后绝不容逸之一机也。”梁启超希望通过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提高中国的国际地

位，在战后和会上取得国际团体成员的资格，以利于一系列外交悬案的解决，营造一种举国一致对外的气氛，一举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尽管梁启超的主张获得国内许多政治家、评论家的支持，包括原来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但仍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包括孙中山、黎元洪、康有为在内不予支持，结果反而使这一举国对外的契机成为内争加剧的诱因。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作了多方面的策划。他筹措了10万元经费，挑选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勱、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作为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行前，他还建议国内报界紧密配合和会上的外交努力，“惟一条件既经提出，全国舆论务须一致，以贯彻其主张。”

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2月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此时，梁启超已经抵达欧洲开展民间外交活动。他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他发现不仅威尔逊等对中日交涉的内情不甚了解，连自己也被北京政府蒙在鼓里，对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借款合同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一无所知。梁启超在巴黎进行了频繁的游说活动，发挥了出席和会的中国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但是，尽管进行了一切努力，仍然无济于事。

4月29日，英美法三国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30日，续开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形，北京

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竟然也考虑要签字了。在此紧急关头，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当天接到梁启超电报，次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晚间送到研究系的《晨报》报馆，由总编辑陈博生接收，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林长民的短文全文如下：“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巨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同日的《晨报》还载有国民外交协会1日发给巴黎和会英法美诸国代表和中国专使的电文。国民外交协会按照梁启超的建议，严正警告中国专使：“和平条约中若承认此种要求，诸公切勿签字。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诸公为国家计，并为己身计，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也。”

5月2日，蔡元培从汪大燮处得知有关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5月3日下午4时，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等三十余人开会。议决：一、5月7日午后2时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所订关于处置山东问题之秘约；三、如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专使；四、向英、美、法、意驻京使馆申述国民意见。会后急电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及各团体、报馆，内称：“本会定于本月七日作廿一款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

回国权,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

北京的大学生们则先行了一步。5月3日晚7时,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和十几所其他学校学生代表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议决进行办法四项:“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四、定于星期(即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什么是作为五四运动旗帜的中国民族主义?用梁启超的话来说:“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在这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互为表里;也可以说,梁启超引进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一样,都是普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如果说义和团“排外”、“灭洋”的根据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五四运动的思想支撑则是世界公理。罗家伦起草的五四游行白话文宣言提到了这一点,许德珩起草的文言文宣言更是再三言之:“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倂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

五四运动前夕的思想家,大多信奉世界主义、大同主义。蔡元培在为《学风》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鼓吹“完全世界主义”。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说:“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是现在世界上的第一大好人。”胡适写道:对外应“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是世界始可谓真进化,而吾国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义也。”

然而,凡尔赛和约给了中国知识界一个很大的打击。刚刚树立起来的普世价值观又动摇了。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随感录中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

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5月18日,他在另一则随感录中感叹道:“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敌不过强权的时代!可怜为公理破产的比利时,所得权利尚不及亲德的日本,还有什么公理可说?横竖是强权世界,我们中国人也不必拿公理的话头来责备协约国了。”

恰在这个时候,俄国人为了解脱外交困境,拿好话来忽悠中国人了。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布第一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方与南方政府宣言》,公开宣布废除旧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在华掠夺所得的权利。1920年9月27日,苏俄又发布第二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照会》,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阶级从中国残暴地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这两个“宣言”博得了中国知识界和政界的普遍好感,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苏俄政府并不准备真的兑现两次对华宣言。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向正同北京政府进行谈判的苏俄驻华代表越飞发出指示说:“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在当时两国谈判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两个主要问题,即中东铁路问题与外蒙古问题上,苏俄代表没有作出丝毫的让步。然而,苏俄的空头支票已经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影响了中国人的选择。

梁启超倡导的中国民族主义,逐渐被苏俄的花言巧语迷失了方向,变调为第三国际鼓吹的反帝国主义。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是全盘接受列宁主义。国民党在苏俄提供金钱和军火的诱惑下,也接受了第三国际的理论。国民党“一大”文件中,加入了反帝的内容:“图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二大”宣言更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这就把中国完全绑在了第三国际“世界革命”的战车上。当时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威胁最大的国家是北边的苏俄与东边的日本,而国

共两党的“革命外交”，却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针对目标。1925年五卅运动的导火索明明是日资纱厂的罢工和日本大班枪杀工人顾正红，却在第三国际世界革命战略（实为苏联外交战略）的指导下，演变成一场以“反英”为主的“反帝”运动。转移斗争目标的实际效果，是掩护了苏俄对内蒙古和日本对东北的吞并野心和侵略行径。

五四运动之后苏俄能够在中国得手，得益于当时的远东格局。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确定了欧美列强对华政策的基调：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不支持不援助中国内战的特定一方。二十年代前半期，日本政府推行所谓“币原外交”，其主要内容是：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经济外交，不干涉中国内政。它在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主要关注点是巩固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这就为苏联政府以军事援助为手段干涉中国内政，参与中国内战，扩大自身在华的势力与影响创造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甚至在蒋介石“清共”之后，其外交部长王正廷依照惯性仍继续推行“革命外交”。等到田中义一大将出任日本首相，实行对华强硬政策，于1928年接连制造“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中国执政当局急忙改弦易辙，从“反英”转向寻求英美的外交支持，已经悔之晚矣。

在1920年代，真正坚持五四运动思想旗帜的是《醒狮》周报、大江学会、孤军社、中国青年党等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宣言：“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反对国民党“（一）欲拥戴军阀以求武力统一；（二）欲依赖外人以图包办国事”。国家主义派指出：“以为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才是国民革命最终目的的人，不知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本不是一个整个的组织，其本来性质就含有竞争冲突的成分甚多。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国际的，而是国别的，中国若想解除不平等的束缚，只有利用这种列强间冲突抵触的形势，从中分别应付，断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促成列强的团结一致，自行断送独立的生命，尤不应甘心受苏俄的卵翼，盲目前驱，代人受祸。他们之所以反对与苏俄亲善，是因为它‘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

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

竭力鼓吹“反帝”的“世界革命”者，却沦为“赤色帝国主义”的走卒，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本位和国际道义立场。譬如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为苏联红军入侵东北辩护，号召“武装保卫苏联”；又譬如在二战期间，先是为瓜分波兰的“莫洛托夫—李宾特洛甫协议”叫好，没两年又随着苏联成为波兰流亡政府的盟友。

1949年以后，开始是外交“一面倒”，全盘苏化；后来又拥抱“美帝”，搞反苏“一条线”。直到胡耀邦、李一氓提出调整外交路线，中共“十二大”才确认“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实行“全方位外交”。以国家利益而不是国际无产阶级利益为本位，重新回到了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前途，既不能依赖俄国人，也不能依赖美国人，只能依靠通过民主机制表达了自己意志和凝聚了自己力量的十三亿中国人。这才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真谛。

余英时说：“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三次政权的变更：一九一二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一九二七至二八的北伐，建立了南京的国民党政权；和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但是，对于民族主义还要做进一步的分辨。同盟会、光复会所说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还是种族主义，孙中山所谓“驱除鞑虏，光复我民族的国家”，章太炎所谓“光复汉族，还我山河”；国民党和共产党建政时所凭借的“民族主义”，已经是落入第三国际意识形态窠臼的反帝国主义。梁启超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还没有机会在中华“民族—国家”建构上真正大显身手。

作为现代国民意识形态底色的民族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与民主主义共同生长起来的。这样一种孪生的“民族—民主主义”，它在中国正方兴未艾，处于上升阶段，尚未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准。我把目前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分为民族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民主主义三大流派，它们的互动与合力，是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原动力”。这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我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走向的一种新理解。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大学大学：何时再有蔡元培

• 章立凡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这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启用教育部印信的当日发布的。5月，教育部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蔡元培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颁行上述举措的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原是维新派中的一员，后弃官从事教育事业，并逐渐转向革命。1902年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1904年他在上海组建光复会，翌年光复会并入同盟会，他被孙中山委任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在德期间著有《中国伦理学史》等著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并于1912年（民国元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正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废止了历代封建王朝正统教育的读经制度，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取代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他认为：“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隶属于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有超轶政治之教育。”凭着这样的理念，他创建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体系。

出掌北大，宗旨正大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蔡元培不愿与袁政府合作，于1912年7月辞职，翌年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了民初《临时约法》，蔡元培应邀回国，同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前身即清末之京师大学堂，实为一座“官僚养成所”，衙门习气深重。据蔡元培自述：回国后“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清除积弊的理念，于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他认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到校视事的第二天，他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这三点要求，都是有针对性的。

蔡元培在1906年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故对清末以来大学生的积习，有着深刻的了解：

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

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这些积习，在今天的大学中（特别是在混学历的官员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有鉴于此，蔡元培特别强调学生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求学不应以做官发财为目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不同于一般“学成任事”的专门学校，并指出“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

蔡元培在演说中痛陈“学生在校如果不能‘植其基，勤其学’，即便将来出而仕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在第二年的北大开学式演说中，他又明确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蔡元培《北京大学开学式之演说》）。蔡元培的这些办学主张，足令后世以大学为学店、以学历为利禄身阶者汗颜。

求贤若渴，唯才是举

蔡元培分析北大学子的心态说：“求学于此者

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由于当时的中国政法学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多由官员兼职，蔡元培认为这是“不得已之举”，“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并着手加强文、理等学科的师资力量。

蔡元培到北京后，曾向老友汤尔和探讨整顿北京大学校务，汤向他推荐了《新青年》主笔陈独秀，蔡与陈本是相识已久的革命同志，他翻阅了《新青年》，并向汤打听到陈在北京的住处。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日，就到西河沿中西旅馆访问陈独秀，力劝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回忆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约定，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石元皋《陈独秀生平点滴》）。考虑到出任文科学长需要一定资历方能通过，蔡元培甚至为陈杜撰了履历，使他顺利地到北大任教，《新青年》杂志社也随之迁至北京。

1917年7月，另一位新文化领袖、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并因胡适的介绍引进了不少新派学者。蔡元培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被蔡元培聘入北京大学的，还有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蔡、李二人于1917年在北京相识后，在“教育救国”及“兼容并包”上多有共识。1918年，北大逻辑学教授章士钊请辞兼任的图书馆主任一职，并推荐李大钊接任。据章回忆说，自己“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无非为著述参考之便，而以吾蔡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李大钊字守常）

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子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后来,湖南青年毛泽东因准岳丈杨昌济教授的推荐,被李大钊接受为图书馆助理员,并到北大旁听。

蔡元培延聘师资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哲学家梁漱溟 1917 年受聘担任北大哲学门讲师时,年仅 24 岁。据梁先生回忆,蔡先生是因看到他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的《究元决疑论》(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后提出聘请的:“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新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之文学院长),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我本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而据闻在欧洲在日本一般所谓印度哲学,皆指‘六派哲学’而言,其中恰没有佛家。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只有应承下来。”(梁漱溟《忆往谈旧录》)

但蔡元培遴选教员,也有其严格的一面。当时北大各科尚有若干洋教员,皆从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请托介绍而来,学问参差不齐,来校后又感染了中国教员的懒散习气,北大依照合同辞退了其中不合格的数人。于是有洋教员要控告校长,英国教员克德来、燕瑞博请英国公使朱尔典来同他谈判,均为所拒。朱尔典曾扬言“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蔡则一笑置之。

厉行改革,健全学制

人人都知道北大的校训是“科学与民主”。蔡元培是将教育科学化的第一人,也是推行大学管理民主化的第一人。蔡元培曾谈到: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

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他在北大校长任内,推行了一系列教育体制的改革。1917 年 10 月,他主持召开了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胡适建议改分级制为选科制,此议获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预科应修满 40 个单位,本科应修满 80 个单位,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选修科目可以跨系。这是中国的大学选修课及学分制的由来。蔡元培说: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为推行他的“沟通文理”主张,蔡元培率先提出了将大学分为本科与专科的创议。他于 1917 年 1 月提出大学改制议案: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大学(蔡元培:《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但在当时未能成功。1918 年 10 月,他再度向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建议:大学本科,“融通文、理两种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兼习生物学之类);习理科者,不要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1919 年,北京大学正式实行“废科设系”,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十四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蔡元培鉴于北大商科毫无设备,仅有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将商科并入法科。当时北大预科的设置受教会学校影响,偏重英语及体育,其他科学则比较落后。学生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学习上会发

生困难。蔡元培在校长任内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蔡元培身为北大校长,视野却放在高等教育的全局。他说:“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当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北洋大学有工、法两科,北京另有一工业专门学校,三者都是国立院校。蔡元培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停办北洋法科,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

教育部核准,北大的工科的土木与矿冶并入了北洋大学,将工科省下来的经费转用在理科上。

蔡元培对北大的一大贡献,是接受胡适的建议,仿效美国大学建制,推行“教授治校”制度。他提出“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的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究各种事务’。”(蔡元培《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

此时,蔡元培邀请他早年的学生、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得意弟子蒋梦麟到北大共事。他请蒋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蒋出任总务长,顾孟余任教务长。1930年,三度代理校长的蒋梦麟正式执掌北大,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十六字方针,进一步健全了北大的管理制度。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是民主,他不仅推行教授治校,也主张学生自治,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他认为组织学生自治会“可以把治者与被治者的分别去掉”,“由学生传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国民自治的精神”。(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演说词》)当时的北大成立了许多学生社团,组织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并办刊、出书,都得到



蔡元培

蔡元培的支持,其中最著名是傅斯年、罗家伦组织的新潮社,许德珩、易克嶷等组织的国民社,以及由守旧派教员支持的国故社。五四运动就是由前两个学生社团组织发动起来的。

蔡元培素来主张男女平等。1919年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在北大收女生旁听作为正式女生的过渡,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这个主张得到他的赞同。1920年春,北大就招收女生9人入文科旁听,暑假又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蔡元培曾谈到:“有人

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提倡“劳工神圣”,同时为穷人争取平等教育权利。1915年6月,他在法国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皆通过该会的渠道赴欧洲学习。1919年3月,他在北京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工读互助团,并组织募捐,帮助贫苦青年实行半工半读。

为使本科毕业生继续从事较深的专门研究,蔡元培还接受胡适的提议,计划设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并先办起了国学研究所。北大在蔡元培任内以文科见长,但他也十分注重理科的建设,请到了李四光等名师到校执教,以求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1930年蒋梦麟继任后,北大理科有了长足的发展。针对守旧派的尊孔以及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创议,在北大先后成立了书法研究会、书画研究会、音乐研究会。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民主。他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新派”人物来校任教,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各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中国共产党的三位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都是北大教员。蔡元培在积极提倡新文化的同时,并不排斥旧学,一些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旧学代表人物,如主张清室复辟的辜鸿铭、鼓吹洪宪帝制的刘师培以及国学大家黄侃等,也同时在北大执教。

据北京大学 1918 年初的统计,全校教员 217 人中有 90 位教授,平均年龄仅 30 余岁。对 76 人的统计显示:50 岁以上 6 人,35 岁以下 43 人,其中陈独秀 39 岁,梁漱溟 24 岁,徐家璜 25 岁,朱家骅 26 岁,李大钊、刘文典、胡适 28 岁,这在当今的大学中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北大本科学生平均年龄为 24 岁,师生年龄段的接近,给校园带来了清新活跃的学风,其中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冯友兰等,后皆成为一代学术宗师。

蔡元培说: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良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他虽然主张“兼容并包”,但仍坚持自己的新文化主张:“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当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对北大的办学方针提出挑

战。他攻击新式教育“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覆孔、孟,铲伦常为快”,认为提倡白话文“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他还告诫蔡元培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他在《学衡》杂志发表的另一版本公开信中,更大骂“神圣学校,几为万恶之府矣”,“不顾是非利害,不计将来之效果,信口狂言,以全国天真烂漫之少年,为其试验品,为其功利名誉之代价,是可忍孰不可忍!”

蔡元培立即发表公开信回击,驳斥林纾的造谣诬蔑。他指出林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他要求林纾提出证据,北京大学教员在校内校外,何时何地发表过“覆孔、孟,铲伦常”的言论?他还举证指出,北大教员中研究孔孟乃至尊孔的大有人在,至于教员在《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蔡元培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严复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林纾翻译外国小说,都是由白话译成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原本乎?”林翻译过《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言情小说,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如果有人以此“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

蔡元培在这封公开信中,重申了自己的办学原则:

(一)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

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宽松环境,“教育独立”理念下的制度改革,学生自治下的自由结社……没有这些元素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保护学生,去职复归

蔡元培在北大推行的教育改革,一直受到北洋安福系政客的攻击。他发表致林纾的公开信后四十七天,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

1919年春,中国以战胜国的地位出席巴黎和会,却未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及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密约。5月1日,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次日,研究系的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披露了这一消息。同日,蔡元培也将北京政府密令签约的内幕告知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并召集全校教职员开会商讨挽救之策。

5月4日北大学生结队出发请愿时,蔡元培有过劝阻之举,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同时也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过去他也曾两次劝阻过学生游行,但这一次态度不同。他在电话中回答教育总长傅增湘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

游行学生焚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的事件发生后,蔡元培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尽到了一位大学校长的天职。当时北大师生齐集法学院大礼堂商议营救办法,蔡元培在询问了学生受伤和被捕情况后说:“我做校长的有责任保护我的学生。我要救出这三十几个学生来。你们现在都回教室,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

5月5日,教育部下令要求各校长将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当日下午,蔡元培等十四所大专院校校长在北大开会,认为事件“乃多数市民运动,不可让被拘少数学生负责。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蔡元培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当场议决成立校长团,向当局请愿营救。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蔡元培亲率全体师生到北大红楼前广场迎接。

北洋当局认为蔡元培是学潮的幕后指使人,内阁会议上提出解散北京大学,撤换蔡元培等主张,教育总长傅增湘也遭众人围攻。被捕学生安

全返校后,蔡元培为承担责任,于8日提出辞呈。同日,北京政府内定由马其昶取代蔡元培,并下达三道命令:查办北京大学校长,将已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整饬学风。其中查办令因傅增湘拒绝副署未能公布。在这种情势下,蔡元培决定挂冠出走。

5月9日清晨,蔡元培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上海,转抵杭州。他发表出京启事表明心迹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蔡元培挂冠出走后,北大师生一再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挽留蔡校长,其他院校师生也一齐声援。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同上辞呈,表示与蔡共去留。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五四运动的影响播及全国,引发了全国学生的罢课,工商各界同仇敌忾,以罢工罢市作为声援。北京政府迫于压力,下令慰留蔡元培,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电令中国代表团从缓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提出: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蔡元培在痛陈教育官僚化的种种积弊后指出:“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他强调:“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旧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他认为“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

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这三个“不”字,真是掷地有声。有学者总结说,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五四运动的目标实现后,各校秩序恢复,因蔡元培拒绝回任,北京大学群龙无首。北京政府曾一度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因学生反对不能到校。北京教育界及北大师生派出代表,到杭州恳请他回校。蔡元培回忆说:“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最终应允复职,只做北京大学师生的校长。他向全国学联代表发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忠告,并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提出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9月20日,蔡元培重回北大视事。到校后,他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重申民主治校的理念:“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到1927年离任,其间因出国考察等原故,实际主事五年半,后期多由蒋梦麟代理。他在十年半的任期内,因各种政治原因,曾七次提出辞职,毫无恋栈,足见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教育官僚。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蔡元培、李石曾等的推动下,成立了中华民国大学院,蔡元培出任院长,在全国推行大学院区制度,以贯彻他的“教育独立”构想,但实行两年后,即在国民党内外的反对下归于失败。此后,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逝世。

抚今追昔,蔡公何在?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国大江南北之时,

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生命之火燃到了尽头。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赍志以歿。

蔡元培的道德文章和教育成就,得到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一致推重。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和中共领袖毛泽东先后发来唁电。3月10日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灵柩,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参加公祭的各学校学生及社团代表万余人。中央研究院同仁挽联是:“道德救国,学术救国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3月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24日上午,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持。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为蔡元培举行国葬。

蔡元培逝世后,陈独秀发表追悼文章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他评价蔡元培的人品气度说:“其一,他一生追求进步革新的人格魅力;其二,他博大的胸襟,容纳百川,不拒细流。”(陈独秀《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这些话并非溢美之词,从微观的角度观察,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发动的一场学潮,而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以及李大钊、鲁迅等,则并非这场学潮的实际发起者,对学潮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三位新文化巨人中,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胡适提倡白话文,而蔡元培执掌北大,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舞台和人才。这一代19—20世纪之交中西文化碰撞背景下产生的精英,是无法复制的。

五四纪念年年有,今年正值九十周年。新文化运动已离我们远去,尊孔读经又回来了,学术大师只见背影,诺贝尔奖纪录为零,教育的官僚化、功利化积重难返。当人们高标科学发展观,并重新认识民主这个“好东西”时,反思中国的教育,不禁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像蔡元培那样的真正教育家——还会有吗?

2009年3月25日风雨读书楼

(作者系北京作家)

(责任编辑 李 晨)

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

宋以敏

我们这里所说的对外关系,是指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与判断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人们都归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内工作方针作了根本性的拨乱反正,也就是改“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当然是对的。但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长期以来,人们却提得不多。其实,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这两个拨乱反正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对世界形势的根本判断,是我们制定对外和对内政策的基础和前提。试想,如果我们一直认定,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那还能放心大胆地埋头于经济建设吗?正是在这个世界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拨乱反正上,胡耀邦是当时领导人中认识比较清醒、也提出得最早的一位,对我们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胡耀邦勇于正视我国对外关系所存在的问题,并较早提出了进行调整和改变。在这方面的拨乱反正中,他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政策的新依据、新原则、新方针,以及外事工作所应采取的新做法和应具备的新风格。这都是对中国外交的突出贡献,值得我们,特别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进行外事工作的人员认真研究和学习。这里就先对以下三个问题作点初步讨论。

一,胡耀邦对世界形势和时代问题的新判断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央领导人中,胡耀邦最早看出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特征,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主要潮流是发展而不是革命。

(一) 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是国家对内和对外战略决策的根本依据

关于时代问题,中国学术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进行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到九十年代才渐趋一致,这就是都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且党中央也在 1987 年十三大报告中正式宣布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即时代特征的提法。现在还有人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或许是受“‘左’比右好”的传统影响的缘故。

确实,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接受共产国际的这一提法,并且一直坚持了下来。由于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所以人们也简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是这样说的。直到建国后头三十年,我们还强调这一提法,当然也就按这一判断制定自己的战略方针了。这就是:对外,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从不断革命发展到“全民皆兵、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历史已经一再证明,这一判断和决策,不但使中国丧失了一个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黄金机遇,而且把国家推到几近崩溃的边缘。经过“文化大革命”,全国从上到下已逐渐觉悟到,不能再这样胡折腾下去了。

出路何在?除了文革中的“四人帮”追随者和少数不愿放弃既得权益或思想僵化的“左”派以外,全国上下在必须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这一点上很快就达成共识。这就又碰到了对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的估计,也就是对时代特征的判断了。

集中搞经济,人们的思想转变比较容易,改变对时代的判断可就比较难

一些了,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特别是当年决策和长期积极执行的参与者,在决定以经济为重点之后,对时代问题的看法就一时变不过来。连邓小平也是逐渐变化的。文革结束后头三年,他仍然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还一再强调战争因素在增长。这当然影响内外决策。所以那几年,对内并未放松备战,如大小三线的建设;对外,还提高了“反修”的宣传,直到组织人员编写《社会帝国主义论》,也更加强调“苏修”是战争的主要根源和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因而要进一步加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这集中地表现在胡乔木受命起草、1977年11月1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特长文章中(但在1982年为胡耀邦起草十二大报告时,乔木又对李慎之等人说,那篇文章是胡说八道)。

此后的五六年里,邓小平的看法逐渐转变为战争有可能推迟,至于推迟的年数,从起初的三五年到不久后的十年,再到争取二十年或更长时间。这在他带头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就显露出对国际形势估计和国内建设发生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从他的许多谈话中都可看出他内心由此引起的焦虑。例如他一再讲要争取十年、二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和平,使我国经济有个大发展;另一方面又老讲战争不可避免。这正如他后来说的,建设得好好的,一打仗就又完了。

从邓小平亲自修改审定过的《文选》看,他对战争看法的改变始于1984年10月10日同德国总理的谈话。其中提到,“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完全改变,可能是1984年11月1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对这一判断的正式宣示,则是1985年6月4

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主要谈的就是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有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是改变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此后,经过党的十三大,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或时代特征就完全定下来了,至今30多年再无变动,大约今后相当长时期都不会再变了。

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时代判断和对外战略的改变,当然是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一客观需要的推动和实践检验的结果,也是对国内外舆论和我们自己有关机构科研成果的审视与接受(例如,1980年李一氓就提出和平可以维护,三个世界的理论站不住,应当承认苏东各国为社会主义并和外国兄弟党恢复关系;宦乡也提出应和美国拉开距离、对苏调整关系的研究报告),更不排除对领导成员中不同意见的考虑和采纳。这里要特别一谈的首先就是胡耀邦的思路和提法。

(二) 在中央领导集体中最早提出战争与和平的新见解和新判断

胡耀邦早就不同意当时流行的所谓“两霸相争必有一战,战争危险主要来自苏联”的说法。他也明确反对把苏联进攻我国看成发生战争的主要危险。1979年7月17日,他在我国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说:“过去我们说苏联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研究得不成熟,提出的理由不充分。这个说法必须重新考虑。我们必须把苏联统治集团奉行的政策同它的社会制度区别开来。不然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和理论方面就站不住脚。”“苏联统治集团反华,二十年来亡我之心不死,但不等于他要搞亡我之战。他要搞对华战争,进行亡华之战,我觉得不容易。他的决心不容易下。同时,苏联人民以及相当多一部分干部,对我友好之心未灭,希望同我们友好。单看领导集团亡我之心不死是不全面的。”可惜他的这些正确意见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中并未得到响应,而且还受到批驳。

胡耀邦也很早就注意不要在宣传上老讲“战争不可避免”、“准备打仗”之类的话。认为这些话不但不符合实际,在世界舆论中显得孤立,还严重影响我们的国家形象。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

记处专谈外事工作的会议上,他就说:“维护世界和平这面旗帜,我们必须高高举起。”由于胡耀邦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早有明确认识,所以在其他领导人和主流舆论还在不断谈论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他在十二大报告中已明确指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当然,由于中央领导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还存在分歧,他对和平的观点虽然成竹在胸,报告中也还须提得面面俱到一些。不



1984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会见来华参加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的日本青年代表和从事日中友好工作的日本老一辈知名人士

过在国际问题研究界却把十二大看成了分界线:在这之前的中央提法是战争不可避免(只能争取推迟),之后已变为和平可能维护了。宣传上,也从此显著降低了战争威胁的基调,而主要是讲和平了。

(三) 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支援世界革命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毛泽东是列宁主义者,历来主张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胜利后,支援世界革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到了晚年,他更进一步认为世界革命中心已移到中国,他也已成为世界革命领袖,支援世界革命也就更公开更积极了,多次表示我们为援助外国革命“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直到1975年7月他还对泰国总理克立说:“(马来西亚总理)拉拉克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革命的?邓小平在文革后的1978年3月31日,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也说,“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了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苏

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但是胡耀邦文革后的认识就不同了。1977年5月他已公开批判反“苏修”、支持世界革命的《九评》,说,“现在看来,《九评》的基本方向是错的,这个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根源。”他还问道:“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

根据列宁解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是要一国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二是取得胜利的民族要为推翻国际资本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这本身就是输出革命。中国党在十二大后已不再多提国际主义,十三大起更明确地正式放弃了这个口号。其实,胡耀邦在1979年3月11日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就提出要改变对外宣传。例如他说,“宣传国内的东西,目的究竟是什么?过去讲是为了‘促进世界革命’,我看这是大话,现在不宜这么提。”“我们要实实在在地规定我们对外宣传报道的任务,不要硬去加上什么‘提高左派思想’呀、‘争取中间群众’呀、‘分化上层人士’呀

……我们搞对外宣传，主要的还是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为了创造有利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际条件。”

在支援世界革命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不只是说说而已。十二大后，特别是小平同志改变看法后，中国在实际行动上也停止了对世界革命的援助。例如，邓小平采纳李光耀的意见，中断了同东南亚各国党的关系，停止了对它们的各种援助，包括关闭马、泰共在中国的广播电台、撤出为缅共创建的解放区中的中方人员等。再就是不但终止了对越南的援助，也单方面废除了一切援阿（尔巴尼亚）协定，立即和全部撤出中国专家。这就使整个对外经援数量从1973年最高时占我国财政支出7.2%，降到1%左右。

以上这些都说明，胡耀邦对于作为时代特征的战争、和平与革命的问题，早就有了清醒的和十分肯定的认识。这还可以从他以下的回顾中看出来。1986年7月20日在河北省委召开的承德学习会上，他就国际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和平与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这两条政策和中国的论断有没有根据呢？对不对呢？我们要争取长时期的和平环境，这有没有根据？是否正确呢？我到日本去一看（按为1983年），得到了这个印象。这次又到西欧去一看，更加深了我的印象。”这个印象就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也是一个事实。简单地说，就是想打的人不敢打，怕打的人更加怕打。少数人想打，想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但他们不敢打。从日本到西欧，对战争的恐惧，那是胜过我们中国人几百倍的。个别人即使想打也是不敢打的，打一场世界大战哪有那么简单呀。”

（四）对另一时代特征的发展问题早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新时代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发展代替了革命。胡耀邦对这一特征的认识，从上述反对革命输出和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思想中已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认识的“发展”，还不只是人们说的主要指南北关系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发展，而是指全世界的发展，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

胡耀邦在涉及发展问题时，总是立足于全球化，提倡全世界加强交流与合作。对第三世界，他提出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特别是大胆吸收西方

的先进文化（物质的与精神的）和经济援助。对中国，他强调对外开放。

胡耀邦对作为时代特征的发展的认识和据此提出的决策意见，不仅同毛泽东要搞世界革命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完全相反，而且同华国锋时期局限于为把经济赶快搞上去而提出并开始执行的对外开放也有质的不同。他认为，在这方面同样必须对过去的认识和实践进行拨乱反正。1982年1月14日，他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把对外经济关系提到“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的高度，说：“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近几十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情况又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对待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决不当忽略这一点。”他要求大家“大大地开阔眼界，提高水平”，说，“我们绝对不能困囿于过去的狭小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地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他提出，“为了有效地吸引直接投资，需要一套开明的方针。第一是大中小项目一齐上，当前以中小为主，这样见效快。第二是欢迎外国资本家、华侨资本家和港澳、台湾资本家一起来。第三是适当放宽政策，让他有利可图。”

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推行对外开放的统帅，也承认在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主导地位，认为对外开放也主要是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开放。不过他在谈发展问题时，往往把发展只归结为南北问题，强调南方对北方国家的重要性。1985年3月4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他全面阐述了对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看法。他说：“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穷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二,胡耀邦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关于建国后我国的外交政策,许多人在事后都概括为:“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实,这是极不确切的。因为在建国后头30年,我国执行的并不完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执行的“一边倒”,算不得独立自主,这是很明显的。七十年代执行联美反苏的“一条线”,也不算独立自主。这是邓小平首先指出的。1985年8月4日,他对缅甸总理吴奈温说,“我们过去曾说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说我们过去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无正式文献可征。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1982年以前并未出现过这种表述。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1949年《共同纲领》,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1975年修正的宪法都没有提。直到胡耀邦就对外关系进行拨乱反正以后的1982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个提法才郑重地出现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同年修改的宪法上。这一明确表述,标志着我国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和过去截然不同的新阶段。

(一)为什么说建国后头30年我国没有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外交要求,在事关国家根本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对外事务只能由自己决定一切,不看外国的眼色行事,也不在外部的压力下屈服和丧失原则。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存在着一致对外的准则,还公认以苏联为首,相互间并不平等。因此在建国后头十年,我国不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很自然的。

1,“一边倒”就是自己不要独立自主

接受苏共领导,对中共来说确实是一贯的。在延安时期,不但斯大林要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毛虽然极不愿意还是不得不去。连共产国际解散后做了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写信给毛,干预中共事务,毛也只能表示完全接受季的指示。这说明取得政权后的中共执行“一边倒”政策是必然的,并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由于美国僵硬的反共政策使司徒雷

登失之交臂,或者因为刘少奇访苏时得到斯大林提供大量援助的许诺,才导致毛发表“一边倒”的文章。

现在人们把“一边倒”仅仅理解为外交政策,这是不对的。“一边倒”的要害是遵从苏共领导和照搬苏联模式。这是所有正式文献和全部历史事实都证明了的。例如刘少奇1949年6月下旬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和苏方商谈建国后的大政方针。他在7月4日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就说,“关于联共(布)与中共的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报告说,“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这种关系当然谈不上独立自主。

外交上听苏联的,要和它保持一致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就是民间的国际活动也必须跟着苏联走,包括世界和大以及工青妇组织等。这里举一个例子。时任中国总工会主席的刘宁一,1956年参加了世界工联的一次会议,回国后给外交部干部做报告。由于他讲话向来幽默风趣,使听报告者至今印象深刻。他说,苏联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了一条中国并不赞成的建议,他就问:是不是莫斯科的指示?回答:不是。又问:是不是(苏联驻当地)使馆的意见?回答:也不是。刘宁一这就表示自己的态度了。他在报告中引用京剧《打渔杀家》上的台词说:既无圣上旨意,又无六部公文,凭着何来?就这样把苏方的建议给顶回去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这种遇事先问莫斯科的态度,直到中苏关系恶化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2,“一条线”战略也不是独立自主

同苏联的关系破裂后不久,中美关系开始趋缓与接近。1973年毛泽东提出所谓“一条线”的战略构想,意思是要使中、美、日、欧以及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联合成一条线,建立反对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事实上只能推美国为首,不能想象

当时的中国会奢望去领导美欧。第二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就是为“一条线”战略制造理论根据。邓小平 1974 年在联合国特别大会上的发言和上面提到的胡乔木主持起草的那篇文章,都是对这一理论的阐述和发挥。公开的说法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必然导致世界大战,争夺态势则是苏攻美守,因此苏联是比美国更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第三世界也要和第二世界联合起来,反对第一世界,但不能同等相待,主要还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战略和理论的实质,就是进一步开展向美国靠拢、大力推行“联美反苏”的外交。

在文革后好些年我们还坚持联美反苏的理论和政策。小平同志认为,美中既然都把苏联视作自己的主要敌人,美国当然就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由于中美力量悬殊,在中美间一时建立起的反苏战略联盟中,我们不能不为了反苏而迁就美国,这就使我们在美苏争夺中帮了美国的忙。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苏关系正常化三大障碍问题就是在帮助美国牵制苏联。事实上美国是利用我国同它联合心切,在台湾问题上反而更加放肆起来。国会 1980 年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政府又提高了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性能和数量,曾使中美关系一度出现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虽有中美 1982 年签订的八一七公报,但售台武器问题反而越闹越大。这些都说明了在“一条线”战略下,我国无法推行独立自主政策,所以邓小平才有上引的明确解释。

(二) 对新时期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提出和规划

1, 首次使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得到正式定位

1982 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并作了明确规定。这就是:“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中国对外政策“有长远的、全局的战略依据,决不迁就一时的事变,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动”。1982 年修正的我国宪法,也是第一次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庄严宣告:“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胡耀邦并不回避过去外交没有独立自主这一事实。十二大以后,他就多次谈到与大国结盟的危害。例如 1984 年 5 月 18 日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说,“对我们来说,同大国结盟有两个不好。第一,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

界各国交往,而同大国结盟可能妨碍,或者至少影响我们广交朋友。第二,它会妨碍我们抵制对方可能有的越轨行动,甚至还有可能给对方利用去反对另一些友好国家。这是我们总结过去几十年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受到全国人民支持的长期决策。”

2, 抛弃革命外交,奉行正常外交

胡耀邦 1981 年 3 月 9 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不啻是对几十年外交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这篇讲话不再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把世界各国划分为敌、我、友三类,依此确认它们属于联合、中立还是反对的对象,而是要求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所有国家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这次讲话中,他还系统地提出奉行完全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方针,专门提到“过去‘左’的幼稚,在这方面有表现。因此,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不容易的。”他为“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定出“必须做到的三条”,这就是:“一,任何时候不依附任何外国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我们不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指挥棒转。二,不受任何一种国际上的临时事件所支配。国际上往往出现一些临时事件,好像很严重。我们要冷静考虑、冷静分析临时事件对我国的根本利益有什么关系,但不受临时事件所支配、所左右。三,不为国内外某种一时的情绪所蒙蔽,所激怒。不要为领导个人情绪所左右。迁就眼前事变就是机会主义。不要一将军就跳,不要被来势汹汹的环境和情绪所蒙蔽,所支配。要考虑国内外广大人民的呼声,但不受其蒙蔽和支配。”看来他的这次讲话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以至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都对他说,“你太大胆了,敢(把这次讲话)印出来。”

胡耀邦的讲话极有针对性。过去我们的对外关系受到毛泽东情绪的影响,可谓处处可见。不谈他和赫鲁晓夫的争吵,导致中苏关系从友变敌、苏联一下由社会主义变成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甚至变成了法西斯,连苏联人民都不能“寄予希望了”。只以对我长期保持友好并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如朝鲜战争、参加联合国等)支持我们的印度为例,也看得很明显。想当年,我们同印度是多么友好,两国常喊的口号是“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即印中人民是兄弟)!”尼赫鲁访华时,上百万人上街夹道欢

迎,临走时毛主席还吟屈原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亲自相送。可是没过几年,1959年4月我们在西藏采取平定叛乱的行动后,在我国驻印度大使馆和孟买领事馆门前发生了印度示威群众焚烧毛主席稻草人模拟像的事件。这引起毛泽东极大震怒,亲自修改外交部依据国际惯例起草的严重抗议照会文稿,不但第一次给印度戴上了“扩张主义”的帽子,还加了一段外交文书上少见的情绪化的话:“这件莫大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事件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群众极端地不能容忍的,必须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否则不可能罢休。如果印度当局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奉命申明,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向印度方面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不圆满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奉命永远不能停止,就是说一百年(记得原来的传达是“一万年”)也不能停止。”中印关系从此急剧恶化。不久之后,印度就成了“帝、修、反”中“反动派”的代表国家,尼赫鲁被说成是“半人半鬼”式的人物,胡乔木也写了一篇《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就使中印关系从友好变成敌对,至今未恢复到此前的水平。

(三) 对苏联、美国、日本和第三世界看法和政策上的拨乱反正

一谈对苏联。

胡耀邦到中央工作后就一直为扭转对苏的敌视态度和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努力。他很早就明确提出不要把苏联视为敌国。1981年3月9日说,对苏联“要去掉一点‘左’的幼稚。”“不要使人们误解我们同苏联整个国家相对立。不要赤白对立。”他对外也不隐讳观点。1983年2月20日对日本记者说,“有人说中苏两国关系积怨很深,一下子难以消除,我不赞成这一看法。”

二谈对美国。

他反对同美国建立以“联美反苏”为基础的战略关系,主张对美国也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建立相互平等的正常关系。1981年10月赵紫阳出席坎昆会议,是我国开始调整“联美反苏”方针的标志。这是在胡耀邦同年3月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的半年左右之后。这篇讲话针对性很强地全面谈到中美关系问题,表示不能把反苏霸放到反美霸之上,更不可对美国抱有幻想。他主张我国应当争取同美国和平友好相处,是国家正

常关系而不是结盟关系。1986年7月20日他就说过,中美“是一种朋友关系,他们也说是朋友,不是盟友。”

三谈对日本。

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中从认识到实践,言行最多的是关于对日本的应有看法和积极推进中日友好合作。联系到十多二十年来中日关系的动荡和下滑,对他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就不能不多说几句。

首先是他高度评价日本的发展,提倡向日本学习。1983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的报告会上,他说:“日本教育普及,技术先进,生产发达,经营管理水平高,应认真学习日本那些有益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其次是高度评价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说,“中日睦邻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必将更大地造福于两国人民和子孙后代,并为亚太地区、全世界的和平,为21世纪的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做出更加光辉夺目的贡献”;“只要中日两国能够友好下去,战争就打不起来,亚洲和平就有了保证,世界和平就增加了很重要的力量。”

他还一再强调要平等对待日本,也不过分强调中日历史问题,以免引起两国人民情绪的对立。他总是着重谈友好,即使谈到历史,也讲得比较全面。他说,“两国的历史、现状、利益和观点都有所不同,当交往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双方都应顾全大局,谨慎从事,认真体察对方的友好建议和合理要求,力求避免做任何伤害对方人民感情的事。”1984年3月18日,他会见伊东正义率领的日中友好联盟访华团时就说,“投以木桃报以琼瑶。这些年来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给予不少支持,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为了两国世代友好的目标,胡耀邦特别注意通过加强两国青年间的交流,为下一代培植友谊和信任感。经中央所有领导的同意和批准,胡耀邦1983年访问日本时宣布1984年邀请三千日本青年来访,同我国青年进行友好联欢。

四谈对第三世界。

胡耀邦除继续表示我们坚决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外,还提出一些对第三世界的新看法。他不是把第三世界看成没有多少差别的“一大片”,而是

如实地看到第三世界各国间的巨大差异，特别重要的是，认为它们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反帝和反本国“反动派”，更不是联合起来和我们一起反“苏修”，而是集中力量尽快把本国经济搞上去。提出第三世界今后的重点在于共同谋求经济发展。他在1986年7月的承德学习会上说，“今后对第三世界要多提供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帮助，主要是和它们共同总结经济何以搞不上去的经验。”

三，胡耀邦在外交思想、外交业务和外交风格上的拨乱反正

（一）谈“外交工作授权有限”

过去由于个人崇拜和高度集权，使外交工作事无巨细都得听从或等候“最高指示”，极大地限制了外事部门和外事干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之不能根据外交政策和应有的职权随机应变、灵活处理，往往错过时机、耽误工作，还造成内部矛盾。连身为总理和分工主管外事的周恩来，对诸如国宴邀请名单和菜谱这样的事都要写上“请主席批示”上呈毛，其他较大的对外工作就更不用说了。1956年周恩来访问印度，碍于尼赫鲁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一再讲情，他倾向于释放一名在押美军间谍，发电请示毛。不料毛看罢大怒，亲拟复电说，我们抓到的美国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越是尼赫鲁、哈马舍尔德说情我们越是不放。周恩来只好对尼赫鲁表示拒绝和向毛作检讨。又如1973年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在告别宴会上提出再和周总理谈一次。对所谈问题周没表态，只说要报告中央，遂立即打电话向毛请示，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而基辛格又要马上登机回国，周不得已只好做了个对基辛格所提问题今后可继续交谈的表态。人们知道，后来这件事就被用来当了导火线，给病重中的周总理招来最后一场多次会议的大批判，连乔冠华也敢于给他带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

下面再举个研究工作中写内部报告，对国际形势分析也不准提不同意见的一个著名例子。这就是毛泽东对外交部1973年上送《新情况》（第153号）的严厉批评。这年的7月4日，他对张春桥、王洪文等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

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指外交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了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这段话引起一系列的批判和检查是不用多说的了。在这种体制和气氛下，谁还敢提不同意见？

周恩来根据他经过延安整风总结出的经验（包括多请示、少做主，多检讨、少解释，多听话顺着来、少提不同意见等），外交部一成立就给立下一条“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原则，对上面这样做，对下面也这样要求。所以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甚至连反映外国情况，都要强调“讲立场”、“对口径”，就是看是否合乎上面的看法和要求。这种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变成察言观色、揣摩意图，进而成为多余的了。

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在外交上的拨乱反正，就首先从为周总理辨冤说起，但也指出他的不足，实际上是开始对“授权有限”的质疑。1981年3月9日，联系毛泽东在外交工作上对周恩来的一再无端指责谈到外事工作必须改革时，他说，“外交工作的特点是外交活动，要提倡闯和钻的精神。外交部培养了一批好翻译和守纪律的工作人员。但没有培养出多少合格的外交家。当年周总理受到批评有四句话，对总理是不公正的。但是总理有时是过细了，外交人员要抓大事。外交部人才不足，知识不够。外交人员不熟悉国内的政治历史文化，不能很好地进行对外谈话。要消灭外文文盲。对外宣传工作很差，赶不上越南、台湾、南北朝鲜。出国的人太多，出国的人中应增加专家、学者。外交部给中央的东西太少。”1982年9月15日他在出席外交部召开的使馆政治思想工作会议时又提到七十年代四句诗，说“这是不公平的。应该改为‘大事不敢讲，小事必须送。如果不照办，势必打修正……’外事工作应该有创造性。六十年代规定的细则，现在看来有的没必要。有的繁文缛节的东西，不能再用了。总理对工作要求严，对自己要求也很

严,但不必搞那么些繁文缛节。既有创造性又有生动活泼,不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

他还呼吁必须改革外事部门卡的太死、严重影响工作的局面。1978年12月31日,他在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说,“在这方面(对外宣传工作)也存在许多‘禁区’、框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看对象、对牛弹琴,效果甚差,笑话不少。我看这种状况也要尽快改变。”1980年4月17日,他对有关部门说:“外事工作、经济工作、宣传工作都面临一个改革问题,不改革,不适合需要。”

(二) 强调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

张闻天通过研究和实践,早在建国初期就对外交业务提出了全面的看法和建议。他的有关报告当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并转有关部门和驻外使馆参照执行。报告中首先指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胡耀邦无论是否知道或记得这件事,反正他对外交调研工作的重视是同张闻天一样的。例如1982年1月14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的,“我们一切外事部门,一切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都要努力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你所到的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全盘情况。不仅要了解上层人物的动向,还要了解背景,不仅要研究这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还要研究它的经济和历史。”

(三) 强调向外国学习

胡耀邦大力批判过去的闭关锁国政策,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因此特别强调向外国学习。而且提出学习外国要有虚心的态度,不可妄自尊大,轻视别人的经验。他在1981年党成立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说,“无论是人家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我们都要通过自己的分析,吸取其中有益的可供借鉴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在努力研究和总结自己经验的同时,努力研究和分析别国、别地、别人的东西。”1983年8月15日在接见日本《每日新闻》社社长时说,“不管对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美国,我们都是念一本经‘发展人民友谊,学习先进经验。’因为正如他1984年2月10日和外交部一干部谈话时所说,‘我们与世界差距太大了。’

(四) 重视外交风格和礼貌

胡耀邦对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具体对外活动也

非常重视,要求有一个新的风貌,并且以身作则,表现出不亢不卑、尊重对方和友好大方的大国气派。这方面他说的和做的内容都很丰富,无法细谈,这里只简单提一下。

他在对外交往中,一再提倡讲友好、讲文明、讲信义、讲人情味,出发点都是同各国政府和人民改善关系、交朋友。对于一切不利于友好交往的行为,如不讲文明礼貌等陋习,他可说是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关乎国家形象和丧失还是赢得人心的大问题。他每谈国际问题和外事工作,总会有这方面的话题。1981年3月9日的讲话,就要求外交部工作要有政治眼光、外交艺术,出国访问要寻求和平、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反对游山玩水,要严格处分丧失国格的人。在1986年7月20日承德学习会上,他举了肯尼迪被暗杀后报纸上登出漫画标以《肯尼迪啃泥地》,赫鲁晓夫去世后报纸上报道的题目是《赫鲁晓夫死了》这两个例子,说“这些都叫做没有国际礼貌,这样做是不好的。”“凡是属于国际礼节礼貌的,随便丢弃,一定会丧失人心的。”1983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讲话又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要给人‘只讲政治’‘只谈原则’的印象”,要“多交朋友,有点人情味,从极右派到左派,凡是主张同中国友好的,统统讲交情、讲友好,都可以交朋友。现在,在外交场合不交朋友,没有点人情味不行。”

上面谈的这一切都说明,胡耀邦所以能为对外关系拨乱反正做出巨大贡献,是因为他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前面,具备非凡的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有一套正确的政策思想和具体做法。他的贡献,有些是我们今天外交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有些没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接受,因此没能收到应有的成效。这是他本人的遗憾,也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损失。

(本文引用胡耀邦的话均出自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责任编辑 吴思)

公 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住房改革的由来与现状

• 杨继绳

房子是人们重要的生存条件。

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轮到工人，只有破旧的小平房。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连维修费也远远不够。房租低，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这一份补贴。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1000元房租，实际只付5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普通工人这方面的收入就很少了。改革前，分房是一种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称为“福利性分房”。

福利性分房制度消灭了房地产市场，国家又无力不断地建房、无力不断地配给。所以，几十年下来，住房条件越来越差、面积越来越小。以天津为例，建国初期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在工人住宅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临时性小平房一直住到八十年代，条件之恶劣、环境之污秽难以言状。

1980年代后期，就酝酿废止福利性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但这件事涉及到原来住房面积大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即官员的利益。经过反复的利益博弈，直到1998年，才下定决心，住房改革付之实施。

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各地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卖给住户。卖给住户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1998年北京市中心区大约6000多元1平方米，卖给住户的价格是1450元，每平方米差价4550元。如果住100平方米，差价就是45.5万元，比他一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在北京以外的城镇，卖房的价格更低，差价更大。

住宅商品化是在原有的公房分配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仅把原来隐藏在房租补贴中的那部分不平等货币化了，又在卖房的价差上加上了新的不平等。行政级别越高，原来住房面积就越大，得到的差价就越多。而普通工人得到的很少。农民根本没有这项收入。

有人说这是对既得利益者的赎买，既得利益者得到了买房的差价，社会得到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有人说，这是中国官员享受的“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

然而，说“最后”，实在是太天真了。一次赎买没有完成，还得继续不停地赎买。

1998年7月1日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想住房吗？拿钱来！父母把终生的积蓄给子女买房；父母没有能力的，年轻人身负银行巨债，成了“房奴”。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

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

就在我家附近步行所及的地方，如西客站南、广安门外一带，一片又一片的新住宅区拔地而起。

我散步走进在达官营附近的“广源居”。这片住宅分东西两区，总计50多万平方米，有中心花园、地下车库等等完善的设施。我问：“这房子卖吗？”一位中年人回答：“这房子是分的，不是卖的！”我说：“1998年就停止分房了，现在是2008年，怎么还分房？”一位领导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用异样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反问：“谁说1998年就不让分房？”旁边的人介绍说他是“国管局”的领导。我说“国发[1998]23号文件说的。你是国管局的领导，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他态度缓和了，说：“这房子不是分的，是卖给自己职工的。”我问：“卖多少钱一平方米？”他说：“这我就知道了。”没等我再问，他就走

开了。经打听,这是新建的国务院公务员住宅,按4000元的“经济适用房”价格卖给公务员。临近的房子市场价是18000元。我进一步了解得知,局级干部的标准180平方米(1998年局级干部只有120—140平方米)。计算一下,一名局级干部买一套180平米的房子,可以得到252万元的差价!

建设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财政部关于颁发的《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建房[1994]761号)第三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是指以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供应对象,并按国家住宅建设标准(不含别墅、高级公寓、外销住宅)建设的普通住宅。”这个文件的第四条规定:“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认定的标准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怎么认定?填报政府规定的申请表格,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和住房情况,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居民委员会、街道、工作单位层层把关。

国家公务员怎么不加区别地都成了“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国务院公务员盖的高级公寓为什么变成了“经济适用房”?国务院自己发的文件为什么自己不执行?国以信而治天下,国之不信,何以服民?

在马连道家乐福附近,有一片名为“中兴佳园”的住宅区。分南北两区,大约有近60万平方米。这是2007年建成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宿舍。有中心花园,假山,石径,游乐区,地下车库。建设标准超过了社会上的商品房。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子正在忙着搬家,我问:“这房子真好。多少钱一平米?”她很自豪地回答:“多少钱也买不到,这是中直机关分的!”我进一步了解得知,这个住宅区也是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中直机关干部的。

这些高档的“经济适用房”不仅大大低于商品房的价格,还有很多商品房没有的优越条件。如:人民大会堂在马连道建有约4万平方米的两栋南北向板楼,每户126平方米,还有一个车库。这126平方米少算了很多公摊面积,若按商品房的公摊面积计算,则有130多平方米。车库不卖,但出租价每月只有120元,大大低于市场价。此外,还不收物业管理费和暖气费。在这两栋楼中还有多套部级干部住宅,每套260平方

米(按商品房公摊面积计,则有近350平方米),人民大会堂是个局级单位,没有部长,这些部长级的房子至今都空着。

除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以外,很多中央部委也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职工。在北京六里桥西局的“丰益苑”小区,国家发改委建的一大片公务员宿舍即将竣工。连科技部这样的清水衙门,也在西客站南建成了“首科花苑”C、D两个小区,以“经济适用房”卖给职工,其它有钱的部委就更不在话下了。

和朋友们聊起来,才知道在北京其它地方,如新街口、广渠门、三里河、会城门等周边环境较好的地段,也有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全北京市到底有多少高级住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官员?这应当是不难统计的数字。

我揭示这些情况,不是批评住这些房子的公务员们,而是指出改革政策不公正。

北京以外的地方怎么样?据我所知,1998年停止福利性分房以后,各地党政机关以改革的名义,或搞“集资建房”,或搞“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或者搞“定向开发”,内定的开发商,以极低的价格“拍”下土地,建好房子以极低的价格让机关“团购”,再按级别档次分给官员。这种以改革的名义谋私的情况,媒体常有揭露。外地的情况比北京更为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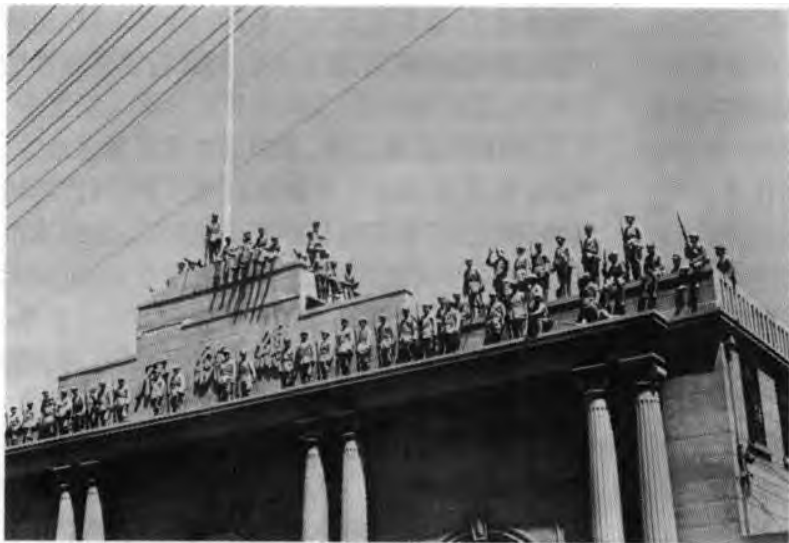
从住房改革中的问题我想到了政治学中“人性恶”的假设:任何人只要掌握权力就有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的倾向。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对权力的约束、限制和监督的机制。我们的制度恰恰缺乏这种机制。这是政治改革滞后的结果。在我们这样的制度条件下,手握制定改革方案大权的人们,就可以把改革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住房改革如此,其它改革何尝不是如此?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部门的利益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的不良倾向。

强势群体左右中国改革的方向,必然进一步造成社会不公正,加剧社会矛盾。这是中国改革最令人忧虑的事。

2009年3月10日

南京是如何解放的

• 许荏华



这是一张被认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标志性的照片。一排解放军战士整齐地站在国民党总统府门楼上。这是为拍摄电影留下的照片。另一张照片，是几名解放军战士爬上总统府大门门顶，扯下象征国民党统治的旗帜。它是解放军4月24日进驻南京后由新华社随军记者邹健东补拍的照片。这两张“历史性照片”都被广泛地用来作为各种党史、军史、文学、影视作品等记述解放军通过武装进攻解放南京的凭证。但是，它却并非历史的真实。南京解放的真实历史，是“里应外合式”的和平解放。

1990年4月，率三野八兵团首先进入南京的陈士榘将军会见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时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国民党）海陆空军多已起义，南京的守敌逃光了，解放军得以和平方式占领南京。”（见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1990年6月致宋任穷的信，《陈修良文集》138页）

1949年4月20日，中共和南京当局在北平的和平谈判最后破裂。4月20日夜，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命令，令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解放全中国。

20日晚和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突破国民党军在安庆、芜湖间和镇江、江阴间以及贵池、湖口间的防线。

内战初期，守卫京畿的国民党军警宪特约有11万人。后因战线越来越长，兵力日趋分散。南京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斗争，使蒋政权完全孤立。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这些军警不愿为蒋政权当陪葬，海陆空军纷纷起义，南京已无力守备。4月22日，蒋介石布置总退却。22—23日，剩下的

防守南京的军警，纷纷出中山门，沿京杭国道溃逃。

23日一整天，南京是个“空城”，一座无军警守备的空城。

接令去占领南京的三野八兵团的35军，原准备的船只已奉命支援其他渡江部队，在江北的民船已被国民党掳掠一空。南岸的船只也都被封锁在内河河汉中。直到23日傍晚，103师战士才找到几只小船，派侦察员乘船向南驶去。小船被首都电厂值班人员发现，问明是解放军，立即调来6名船工，驾驶着他们藏匿起来的运煤码头的“京电号”小火轮，驶往浦口，接解放军过江。这是渡江解放南京的第一船。工人们又找来一艘可载运二三百人的趸船，载运解放军渡江。同日，104师的侦察员与南京木船船主童达兴等接上头，童不顾个人安危，往返六次，将一个连的解放军接运南岸。23日晚，浦口车站轮渡所工人王德太等人，将保护下来的渡轮“浦口号”及拖船“凌平号”、“沧平号”驶往北岸。几天后，栈桥修复，“浦口号”投入轮渡，装备坦克、汽车、重武器的大部队得以顺利过江。

23 日午夜、24 日凌晨,35 军 104 师 312 团 2 营奉命占领总统府。

南京,这个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就这样没有打一枪一炮,回归到人民手中了。

海陆空军纷纷起义 防务机密荡然无存

南京的和平解放,是里应外合的成功范例。外合,是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陈兵江北,大军压境。没有这个大局,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放弃南京,下令弃城而逃的。里应,是南京地下党团结全市人民,反对国民党政权进行了长期艰苦斗争,特别是在战略大决战中,成功地策动反动政府的党政军警起义,众叛亲离,使蒋介石无可可用之军。地下党又派人打入国民党的军事核心机关,取得核心的军事情报,使蒋介石无可守之险。

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在过去在敌营内部工作的基础上,于 1948 年 10 月成立策反部,利用所有的各种关系,策动国民党军警起义。

1948 年 2 月 26 日,国民党空军俞勃驾 B24 重轰炸机起义。俞勃原是个大学生,家贫。考入空军后,曾赴美受训。回国后,不满国民党打内战。在空军医院的医生林诚(地下党员)的启蒙和影响下,参加了地下党。他又在空军中发展了两名党员。他们几人趁空军召开会议之机,驾机起义。原计划轰炸总统府,因故未中,最后飞抵石家庄。这是全国首架飞机起义。

1949 年 2 月 25 日,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邓兆祥舰长率领 600 官兵起义。这只英国赠予国民党的装备精良的军舰(排水量 7000 吨),是蒋介石赖以阻止解放军渡江的主舰。邓兆祥在英国受训,为人正直,曾与我党有秘密接触,有起义的思想基础。中共上海局和南京地下市委分别有六七条线与舰上官兵秘密联系。其中地下党员毕重远(中学生)团结进步士兵,组成“士兵解放委员会”,首先发动起事。海军下级军官王淇在其弟王毅刚(金陵大学地下党员)的推动下,与曾祥福、莫香传等 21 名军官秘密组成“军官起义小组”。当该舰接到命令从吴淞口开赴江阴对解放军作战时,邓兆祥宣布起义,指挥“重庆号”以

高速驶往青岛,转往解放区烟台。

1949 年 3 月 24 日,担任南京——当涂一线和南京近郊防卫的 97 师(由原保卫蒋介石、顾祝同、陈诚的三个警卫团改编而成,是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直接指挥的“御林军”)师长王宴清率部起义。但这是一次不很成功的起义。王宴清为人清廉,不满政治腐败,厌倦打内战。南京地下党派党员李益之(大刚报记者)通过农工民主党的邓昊明(王宴清的舅舅)的关系,与王保持接触,阐明形势,讲解中共政策,帮他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下定决心起义,并且作了几个团长的工作。但不慎走漏消息,王被张耀明扣留,旋被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覃异之(覃后在湖南起义)释放,王宴清遂舍家率部起义。蒋介石闻讯派飞机、部队追歼,王仅带了两个团长及百余人到达滁县,得到陈士榘的接见。97 师的起义,在蒋军中引起强烈的震动。

1949 年 4 月 22 日,南京飞机场 431 电台和指挥塔台 30 余人(包括 3 名地下党员),在台长地下党员罗贤朴率领下起义。一些国民党党政要员不得不改乘汽车逃跑。24 日,起义者将 4 架飞机交解放军接管。

1949 年 4 月 23 日,国民党第二舰队少将司令员林遵在南京燕子矶芭斗山率舰长 9 人、舰队队长 2 人、25 艘舰艇及全部官兵起义,加入解放军海军行列,并向我党我军领导人发出致敬电。林遵曾与周恩来有多年交往,中共上海局有专人负责与他联系。第二舰队的起义,使国民党海军失去控制长江江防的能力。

1949 年 4 月 23 日,南京下关狮子山炮台,在少校台长胡念恭(地下党员)领导下,在解放军渡江时,一炮未发,按照党的指示在佯装撤退途中,将人员和武器装备交给解放军。

1949 年 4 月 23 日,驻马鞍山的国民党 66 军 53 团 3 营营长戚超人率部起义,连同收容的散兵游勇约 2000 余人向解放军投诚。戚超人的弟弟戚卓人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地下党员,为动员其兄起义来到南京,在南京市委领导下动员其兄起义。

南京民革负责人孟士衡也在做策反工作,他计划在南京宪兵、警察中组织起义,不幸事泄,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三人被捕,遭到杀害。

这就是南京解放前守卫京畿和长江沿岸国民党军警的基本情态。

情报工作关乎战役的胜负成败。渡江战役中长江沿岸敌方部署的情报尤为重要。中共上海局和南京市委在中共南方局长期情报工作的基础上,为这一决战性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1948年10月南京市委设立了情报部,派党员和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庭、保密局、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作战处、联勤总部、美军顾问团、青年部学运小组等机构,获得了国民党在华东地区调防和驻扎情况的情报,特别是长江沿岸桥头堡布防的情报。1949年3月,南京地下党市委派朱启奎(市委委员)与白沙同志,化装成西药商人,渡江到苏北,途中遇险转程到合肥,向解放军渡江司令部汇报南京的情报工作和群众工作,将上海局提供的军事地图(原件)、“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锁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交给总前委。他们向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汇报了南京市人民反搬迁、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情况,为接管南京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策反和情报工作都是极其危险的工作,地下党员和革命者不顾个人安危,完成党交给的使命,造成蒋介石无可用以防守之军,无可保作战之密,不得不作总退却之举措。

群众运动使蒋介石陷于完全孤立

敌军的瓦解,是南京和平解放的条件。解放战争的巨大胜利和党领导下的群众斗争,造成蒋介石彻底孤立的局面,又是敌军瓦解的条件。没有这个局面,敌军的起义,国民党统治机器的土崩瓦解,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国民党首都南京,以学生运动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得到全市以至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呼应。国统区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了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配合解放战场的第二条战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伪军事占领下重建的南京地下党,和中共南方局在“大后方”建立的秘密组织汇合起来,构成南京爱国民主运动的核心力量。在学生运动中,国立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

进步力量最强大,其中“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青)和“民主青年协会”(民协)是最有实力,并具有一批有斗争经验的学生领袖和骨干的地下组织,其中绝大多数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5月,中共南京市委将不同关系的地下党组织统一起来,逐步建立了学委、工委、文委、金融委、公务员委等,分别领导各条战线的斗争。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陷入政治经济全面危机,民怨沸腾。对民主力量的镇压,激起更强烈的反抗。1946年底和次年初,学生冲破法西斯统治的严酷高压,举行了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暴行的“抗暴运动”。1947年5月,中大学生发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5月20日,京沪苏杭5000多学生在首都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反内战反饥饿的联合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打伤一百多人,逮捕28人。南京五二〇血案,得到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几十万学生和各界人士的声援,并发展成全国范围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史称“五二〇运动”。毛泽东主席为此撰写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之中》的文章,称“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是与解放战场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此后,南京和全国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相互声援,尽管国民党加强了镇压,几番大逮捕,运动却是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政府顾此失彼,狼狈不堪。由于中央大学在多次学生运动中起“领头羊”作用,被誉为南京爱国民主运动的“民主堡垒”。到1949年初,为了反对搬迁、护校、迎接解放,成立了“应变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以进步教授为主,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党派参加的“校务委员会”,取代国民党指派的校长行使行政权力,实现教授治校。南京老百姓把中大看作南京的“小解放区”。他们凭直觉猜测,中大“应变会”是共产党领导的某种中心。4月21日,首都警察厅一位警官来到中大,要求向中大校委会缴枪,交出警察厅弹药库的钥匙。中大地下党派100多名党员、新青社员,到警察厅取回大批步枪、机枪、卡宾枪,装备了中大“应变会”的纠察队员。

五二〇运动后,南京的工人、教师、新闻工作者、公务员,警察等在地下党领导下,以不同形式开展了争生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1947年

11月,全市小学教员为提高待遇保障职业,举行请愿。同年12月,南京电信局职工、江南汽车公司职工要求改善待遇,斗争分别取得胜利。1948年,南京永利碱厂职工、首都被服厂职工、全市三轮工人等,争取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斗争先后取得胜利。7月,两浦铁路职工在地下党领导下举行“七·二大罢工”,浦镇机车厂、浦镇工务段、电务段、机务段、车务段、港务所、水厂、电厂等单位5000余人参加了罢工,铁路瘫痪,军运停运。全市小学教师为抗议美国教士和士兵殴打小学生,举行全市总罢教。

通过这些斗争,扩大了进步分子的队伍,在许多基层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到解放前夕,约2000人成为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其中百余人撤退到苏北解放区,为解放南京和接管准备了干部。他们被编入金陵支队,随军南下。其中一部分人员在三野联络部整理的材料的基础上,将南京市各方面的调查资料,汇编成《南京概况》上下两册,共30余万字,内容包括南京土地、人口、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构、公私营企业、外侨等方面的情况,为顺利接管南京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实际上,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逐步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同情,以至接受。南京市人民渴望解放。国民党统治的覆亡,是人心所向,是它自身腐败透顶的恶果。这就是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南京的大背景。

让历史返璞归真

南京里应外合式的和平解放,解放军的顺利接管,南京人民从而避免了一场炮火的洗礼,生命财产免遭涂炭。但是,在党史、解放战争史,各种文献、作品中,都没有记载这个历史的真实。是无意的忽略吗?

解放战争中,大城市的解放有几种模式。天津模式是打下来的,北平模式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的。是否还应承认有第三种模式“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呢?把解放军攻克南京城还原成里应外合的和平解放,并非所有人能轻易接受的。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地下党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是

“枪杆子里出政权”论者,虽然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也曾经要善用知识分子;但在革命取得胜利后,立即要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被定位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变成革命的对象了。而地下党的主体正是知识分子(除了少数像上海这样的稍有工业基础的城市才有真正的产业工人党员队伍)。

在南京以及其他地区获得解放之初,党的领导人对地下党采取了降级安排、控制使用的政策。新解放区的各级主要领导均由南下解放军干部担任。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下去时,地下党员就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异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名义被逐步淘汰了。南京解放不久,就对南京地下党进行了一次整党。理由是地下党成分不纯,被敌人混进来了;入党动机不纯,欲投革命胜利之机。这次整党中,南京2000名地下党员中有100多人受到开除党籍、停止党籍,以至坐牢等各种处分。后来经过查对,并没有查出一个坏人。实际上,那些地下党员(包括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无不是在坐牢、杀头的威胁下的勇者。当他们提着脑袋参加党时,并未想在党内捞个一官半职。

对地下党的不公平对待,原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曾经表示不满。为此,她本人受到批评,后被调往上海、杭州。1957年,她和她的丈夫沙文汉(原上海局成员,时任浙江省长)双双被打成右派。在实际生活中,对地下党员的不公,不在于不让他们身居高位,而是借口他们的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等等,而加以歧视。此外,知识分子党员善于独立思考,不盲目服从,爱提意见等,是习惯于独断专行的当权者所不容的。

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经大有改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今天回顾过去这段历史,并非要为什么人出气、喊冤,而是以前车为鉴的态度来重温历史,返璞归真,总结经验,从过去寻找今天,从今天寻找未来,实现几代人为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想。

(作者是南京原中央大学的地下党员,解放后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工作。原文两万多字,经穆广仁删节、改写而成) (责任编辑 李 晨)

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

• 林蕴晖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导致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其严重后果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一直为国内外学人所关注，有关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也出现多种数据。笔者根据赵发生主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等国内出版的权威著作，以及与此相关的书籍资料作如下梳理。

1959年至1961年的粮食状况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导致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严重困难”，以1960年为最甚。据《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一书披露，1959年到1961年，三年粮食的平均产量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三年年平均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827.6亿斤，而平均每年征购的粮食则比1957年增加95.8亿斤，粮食征购占总产量的比例三年平均高达34.4%，其中1959年高达39.6%。这就在广大农村购了过头粮。1960年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分析说：“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200亿斤左右。”连续三年的高征购，导致农村占有粮食大幅度减少。全国农村平均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由1957年的589斤下降到1960年的429斤。1960、1961两年，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足1斤，重灾地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口粮。由于没有了饲料粮，牲畜大批死亡，1961年末骡、马、驴、牛的存栏头数为6949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8382万头减少17.1%；1961年末生猪存栏只有7227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14590万头减少一半以上。^{注1}

对当年饿饭的情景：饥饿——浮肿——死亡，顾准先生在他的“商城日记”中留有如下记

载：

1959年11月4日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

刘引芝的父亲死了。

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

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

11月13日

红薯收获……。薯块水分多而淀粉少，脆弱极了，一碰就断……。民工路过，欣羡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

11月20日

二顿均以红薯叶当菜。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

11月22日

第一天吃红薯叶，三顿，每饭一碗。晚间菜稀饭，加大碗红薯叶，翌晨拉肚子。20日吃红薯叶，量减半。

12月2日

我的胡萝卜挨偷了，被偷至少十几个。萝卜种至少又有一个大的被偷了。昨下午，一个妇女当着下棚许多人，偷胡萝卜。当群众饥饿的时候，如何看得住？

12月15日

昨天三稀，今天中午居然一顿干饭，而早饭特稀。可以补充的食物了然无存，清晨傍午，颇为饥饿所苦。

……

徐家断炊，赵家棚子砍公共食堂大锅，都是征购中的事。……估产过程中间，大力开展反对富裕农民路线，斗争私藏粮食，是今春所做的第一幕剧……。

12月17日

劳动队的肿病病员，一下子在一个月中，从

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夏天来时,肿病是极个别的,不过李国庆之类真有心脏肾脏病的而已。九十月间,七组:岳正中、李学海、刘代勤全肿了,人数增到四十余人。而今,一个月,一下加了三十余人。六组,除一二人外,全部肿了。

……

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

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小孩,在一个半月相继死亡。这个家庭也特别大,未死人前连黄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人,则死比例也不算小了。

一家连死几人之例,已听到的有:

柳学冠,母亲和弟弟。

张保修,哥哥和嫂子。

12月22日

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注2}

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一书中,记述了当年震动中央的另一饿死人事件——甘肃“夹边沟事件”。位于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劳改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1957年后专事“收容”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判以劳教的3000名右派)。

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在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如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到了明水之后,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人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

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请地委给调点粮……。也就在这个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注3}

再就是四川省的情景。1960年3月,英国路透社转发了伦敦《新快报讯》的一则报道,称为“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事件,配发的照片是一名小个男子,手提白色灯笼,在天安门广场旁若无人地行走。照片旁注:这个男子显然是用这种方式来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这则被称为“白日点灯”的事件迅速反映给了周恩来,周随即指示北京市委进行调查。这个“白日点灯”的人很快被查获,此人名叫何明渊,四川省达县人,审讯时供认,对当地的粮食征购政策和经办干部的作风不满,同村和邻村出现不少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就是由此造成的,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其妻因此而失踪。何明渊称,曾为当地情况先后到专区和省城三次上访,均遭无理拘押。无奈之下,到京制造“白日点灯”案,以影射现实形势“暗无天日”。北京市公安局派专人到四川省达县调查,证明情况属实。当彭真将调查结果向刘少奇报告时,刘少奇听后,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注4}

有关非正常死亡数字的种种说法

对这场灾难主要源于天灾还是人祸?人们仍有不同的认识。国内有研究者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即便说不上风调雨顺,至少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气象部门把全国气象状况划为五个等级,叫做负二度区、负一度区、零度区、一

度区和二度区,分别表明涝、偏涝、不涝不旱、偏旱、旱。就是说,结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灾害就越少。在公布的从1954年到1972年长达十几年的年份里,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比1954年、1957年、1965年和1970年、1972年都更接近零度区值。^{注5}这个统计是根据水文总站历年的历史资料来说的,应该是有说服力的。因此,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薄一波在30年后回顾这段历史,就曾坦率地承认:

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注6}

中国从1959年到1961年所发生的全国范围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总数究竟是多少,迄今还没有一份官方的统计数字或研究报告。现有的半官方出版物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情况,大体有1000多万、2000多万、3000多万到4000多万的四种说法:

《当代中国的人口》一书对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状况有如下记述:

全国人口死亡率1960年高达25.43‰,农村地区高达28.58‰。据有关部门统计,超过20%的有675个县,其中超过100%的有40个县。根据这一时期不够准确的统计数字,总人口的变化情况是:三年累计,按总人口计算减少135万人,按自然变动增加622万人,两者相差757万人。从1964年普查结果看,三年困难时期里这两个数字都有一定的问题。1959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里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现象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677万,比前一年增长数下降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加1213万,只比上一年少增128万人,增长率仍保持在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政府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减慢,特别是浮夸风盛行,有些地方为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

多报人口。从1960年来看,总人口减少1000万人,自然变动减少304万人都偏低,实际人口减少还要多。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249万。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根据1964年普查资料计算,在1962至1964年的三年中,总人口增加数和自然变动数不一致,主要是1961年以前统计不准造成的。根据1964年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大约减少1486万。^{注7}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注8}

中国人口学研究者蒋正华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的专论中,估算1958年到1963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注9}

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1984年写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算中国1958年到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注10}

英国记者菲力普·肖特著的《毛泽东传》中说:“1959年和1960年,有大约2000万人死于饥饿……。1961年又有500万人饿死了。”据此,作者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其依据是:“1980年,中国的头号领导人胡耀邦公开承认饥荒的存在,确定死亡数目为2000万人。这一数字依据了常委会编纂的临时文件。以后一些西方作家和中国作家们提议说,总死亡数目为4000万人到6000万人。然而,这些估计都是在受损最严重的地区取得了数字后,再将之推广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后达到的数字,与那一段时期总人口趋向的相互关联松散。在缺乏与之相反的结论性证据的情况下,2000—3000万额外死亡数字应当是最可信的。这个数字也的确是充足的”。^{注11}

贾斯柏·贝克先生著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认为,美国人口学家裘蒂丝·巴尼斯特博士在《中国人口的变化》中得出在1958到1961年的饥荒年间,中国“死亡人口比正常死亡人口超出三千万”的结论,“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可靠的估计数字”。^{注12}

曹树基先生在《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结论说: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45.8万。^{注13}

丁抒先生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文中,以中国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有了逐年出生数、正常死亡率和统计局发表的人口数,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非正常死亡数了。计算结果是:1959年非正常死亡数是212万,其中196万是农民。1960年至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分别是1778万、1190万和291万。连同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数,整个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数约3500多万”。^{注14}

丛进先生在《曲折前进的岁月》中认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加上前述减少的1300万,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注15}

金辉先生在《“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的结论是:1959—1961年的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文中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1949年至1965年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推论说:

1964年底总人口70499万。从1964年的总人口数按公布增长率逐年递减回去,就可以得到它:1963年底——68603万($70499 \div 1.02764$);1962年底——66390万($68603 \div 1.03333$);1961年底——64645万($66390 \div 1.02699$),甚至更低。它比公布的1961年总人口数65859万少了1214万。

我们以1959年底的公布总人口为基数,按1960年、1961年的公布增长率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比1961年的公布总人口多1295万人。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数字:1324万、1214万、1295万。三数平均为1278万。其与公布总人口净减数字1348万之和为2626万。

三年灾难的后果之一,是使中国少增长了6000—8000万人口。1959—1961年间非正常死亡2791万,加上1961年公布总人口数中抹掉的

这1270余万,中国在1959—1961年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注16}

两本“中国人口”公布的数据

以上出现的不同数据,既有计算方法的不同,也有起止年代的不同(1959—1961,1958—1961,1958—1962,1958—1963),因而也就很难求出一个统一的数据。本文根据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专著: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另有全国除台湾、西藏以外27省市的分册)提供的数据(1959年到1961年的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按1957年正常年份死亡率的人数),计算出一组1959年到1961年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以及据此推论出一组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参考数字。

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发表的数据^{注17}是:

1957年中国死亡687万人,死亡率为10.80‰;

1959年——1961年中国死亡人数和死亡率为:

1959年970万人,14.59‰;

1960年1693万人,25.43‰;

1961年939万人,14.24‰。^{注18}

1959年——1961年三年共死亡3602万人。按1957年正常死亡率三年应扣除2061万人,余下1541万人为非正常死亡。

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提供的1957、1959、1960、1961年的人口死亡率与《中国人口》相同。但书中称:从1964年人口普查的结果看,这段时间(指1959—1961——笔者注)的实际死亡率可能还要高。1963年底全国人口数为69172万,1964年底为70499万,全国增加人口1327万人。而1964年全国自然增长率是27.64‰,增长人数应为1930万,比总人口增长数多出603万。这603万人的虚报数如何产生的?根据1964年6月30日普查时人数69458万人计算,上半年增加286万人,下半年增加1041万人,两者的比例显然不合理。问题就在于,这多出的603万是以前的死亡人口未销而留下的虚假

数字。……这批死亡人数主要是 1959 至 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积累下来的。如果把这 603 万死亡人口考虑进去,1960 年前后的死亡率可能要提高 10‰左右。^{注 19}

这样,上述 1959 年到 1961 年非正常死亡的 1541 万人加上 603 万人,总计非正常死亡应为 2144 万人。

值得指出的是 非正常死亡情况最早出现在 1958 年(如四川、山东、河南,而甘肃 1958 年死亡率高达 21.11‰),有的省份延续到 1962 年,如四川省 1958-1962 年平均死亡率高达 34.03‰,普通死亡率仅为 7.02‰。^{注 20} 据原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 1962 年 6 月 28 日下午在中南海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汇报说,四川省 1958 年到 1960 年死亡 1000 万人(1957 年的《户籍年报》四川省人口 7215.7 万,1960 年底为 6236 万),1961-1962 年四川大约还有 250 万人死亡,因此认为 1958-1962 年四川省饿死 1250 万人。据此笔者推论,从 1958 年到 1962 年间,中国因大跃进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 3000 万人左右。

尽管研究者对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的说法不一,但无论是一千多万,抑或四千多万,都丝毫不会影响对 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共和国历史上这场灾难的严重性的估计。

附录：

《中国人口》各省、市、自治区分册

公布的 1958 年——1962 年间的人口死亡数和死亡率

北京市 1961 年死亡 7.9 万人,为 1958 年的 1.56 倍,死亡率升至 10.80‰(1958 年为 8.08‰)。(李慕真主编:《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12 页。)

天津市 1959 年死亡 55.094 万人,死亡率为 9.88‰(1958 年为 8.66‰);1960 年全市死亡人数 59.485 万人,死亡率为 10.34‰;1961 年全市死亡人数 57.745 万人,死亡率为 9.89‰(1962 年回落到 7.36‰)。(李竞能主编:《中国人口》天津分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24 页。)

上海市 50 年代前期到 1957 年死亡率降至 6.1‰;1959 年至 1961 年上海市的粗死亡率略有回升,但与全国相比上升幅度很小,1959 年粗死亡率为 7.8‰。(孙竞

新主编:《跨世纪的中国人口》上海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55 页。)

河北省 1959 年死亡人数 462.364 万人,死亡率为 12.29‰(1958 年为 10.92‰);1960 年死亡人数 599.458 万人,死亡率为 15.84‰;1961 年死亡人数 516.288 万人,死亡率为 13.63‰(1962 年回落到 9.06‰)。

山西省 1960 年死亡人数 23.94 万人,死亡率为 14.2‰(1958 年为 11.7‰;1959 年为 12.8‰;1961 年为 12.2‰;1962 年回落到 11.3‰)。(毕士林主编:《中国人口》山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年版,第 96-97 页。)

内蒙古自治区 1959 年死亡人数 11.26 万人,死亡率为 10.99‰(1958 年为 7.94‰);1960 年死亡人数 10.65 万人,死亡率为 9.45‰;1961 年死亡人数 10.32 万人,死亡率为 8.77‰。(宋迺工主编:《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31 页。)

辽宁省 1959 年死亡人数 29.3 万,死亡率为 11.8‰(1958 年为 8.8‰);1960 年死亡人数 29.1 万人,死亡率为 11.5‰;1961 年死亡 44.4 万人,死亡率为 17.5‰(1962 年回落到 8.5‰)。(宋则行主编:《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年版,第 53 页)

吉林省 1959 年死亡 17.4 万人,死亡率为 13.4‰(1958 年为 9.1‰);1960 年死亡 10.1 万人,死亡率为 10.1‰;1961 年死亡 16.9 万人,死亡率为 12.0‰(1962 年回落到 10.0‰)。(曹明国主编:《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04 页。)

黑龙江省 1959 年死亡 20.7 万人,死亡率为 12.8‰(1958 年为 9.1‰);1960 年死亡 18.4 万人,死亡率为 10.5‰;1961 年死亡 20.6 万人,死亡率为 11.1‰(1962 年回落到 8.7‰)。(熊映梧主编:《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18 页。)

江苏省 1959 年死亡 62.19 万人,死亡率为 14.55‰(1958 年为 9.40‰);1960 年死亡 78.59 万人,死亡率为 18.41‰;1961 年死亡 56.63 万人,死亡率为 13.35‰(1962 年回落到 10.36‰)。(杜闻贞主编:《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13 页。)

浙江省 1959 年死亡 27.91 万人,死亡率为 10.81‰(1958 年为 9.15‰);1960 年死亡 30.39 万人,死亡率为 11.88‰;1961 年死亡 25.84 万人,死亡率为 9.84‰。(王嗣均主编:《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15 页。)

江西省 1959 年死亡 25.30 万人,死亡率为 13.01‰

(1958 年为 11.34‰) ;1960 年死亡 32.01 万人,死亡率为 16.06‰ ;1961 年死亡 23.28 万人,死亡率为 11.54‰。(马巨贤、石湍主编:《中国人口》江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08 页。)

福建省:1959 年死亡 11.95 万人,死亡率为 7.88‰(1958 年为 7.46‰) ;1960 年死亡 23.89 万人,死亡率为 13.34‰ ;1961 年死亡 18.81 万人,死亡率 11.89‰(1962 年回落到 8.23‰)。(傅祖德、陈佳源主编:《中国人口》福建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00 页。)

山东省 1959 年死亡 98.5 万人,死亡率为 18.19‰(1958 年为 12.77‰) ;1960 年死亡 124.8 万人,死亡率为 23.60‰ ;1961 年死亡 96.6 万人,死亡率为 18.49‰(1962 年回落到 12.35‰)。(吴玉林主编:《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50 页。)

河南省 1958 年死亡 62.8 万人(此前每年死亡人数在 50-60 万之间) ;1959 年死亡 70.2 万人 ;1960 年死亡 190.8 万人 ;1961 年死亡人数回落到 48.9 万人。(貂琦主编:《中国人口》河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06 页。)

湖北省 1959 年死亡 46.04 万人,死亡率为 14.50‰(1958 年为 9.54‰) ;1960 年死亡 67.03 万人,死亡率为 21.19‰(1961 年回落到 9.19‰)。(谭宗台主编:《中国人口》湖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06 页。)

湖南省 1959 年死亡 478479 人,死亡率为 12.99‰(1957 年为 10.41‰) ;1960 年死亡 1068118 人,死亡率为 29.42‰ ;1961 年死亡 618470 人,死亡率为 17.49‰(1962 年回落到 10.23‰)。(毛况生主编:《中国人口》湖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38 页。)

广东省 1959 年死亡 43.51 万人,死亡率为 11.74‰(1958 年为 9.13‰) ;1960 年死亡 59.36 万人,死亡率为 15.12‰ ;1961 年死亡 40.54 万人,死亡率为 10.67‰(1962 年回落到 9.32‰)。(朱云成主编:《中国人口》广东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20 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59 年死亡 383952 人,死亡率为 17.49‰(1958 年为 11.74‰) ;1960 年死亡 644770 人,死亡率为 29.46‰ ;1961 年死亡 422201 人,死亡率为 19.50‰(1962 年回落到 10.25‰)。(黄贤林、莫大同主编:《中国人口》广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12 页。)

四川省 1958 年到 1962 年,5 年中平均每年死亡 231.62 万人,年平均死亡率为 34.03‰。死亡人数最多的

1960 年,达到 364.74 万人,死亡率为 59.97‰(1963 年以后的 13 年间死亡率回落到年均 10.38‰,年均死亡 81.58 万人)(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20 页。)

云南省 1958 年死亡 44.20 万人,死亡率为 21.62‰(1957 年为 16.29‰) ;1959 年死亡 34.34 万人,死亡率为 17.96‰ ;1960 年死亡 49.98 万人,死亡率为 26.26‰(1961 年回落到 11.85‰)。(邹启宇、苗文俊主编:《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72 页。)

贵州省 1959 年死亡 35.03 万人,死亡率为 20.28‰(1958 年为 15.26‰) ;1960 年死亡 88.62 万人,死亡率为 52.33‰ ;1961 年死亡 38 万人,死亡率为 23.27‰(1962 年回落到 11.64‰)。(潘治富主编:《中国人口》贵州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34 页。)

陕西省 1958 年死亡 19.99 万人,死亡率为 11‰(1957 年为 10.3‰) ;1959 年死亡 23.58 万人,死亡率为 12.7‰ ;1960 年死亡 23.52 万人,死亡率为 12.3‰(1961 年回落到 8.7‰)。(朱慧珠主编:《中国人口》陕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24 页。)

宁夏回族自治区 1958 年死亡 27936 人,死亡率为 14.98‰(1957 年为 11.06‰) ;1959 年死亡 31825 人,死亡率为 15.82‰ ;1960 年死亡 29331 人,死亡率为 13.90‰(1961 年回落到 10.71‰)。(常光主编:《中国人口》宁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10 页。)

甘肃省 1958 年死亡 272455 人,死亡率为 21.11‰(1957 年为 11.32‰) ;1959 年死亡 230375 人,死亡率为 17.47‰ ;1960 年死亡 538479 人,死亡率为 41.46‰(1961 年回落到 11.47‰)。(苏润余主编:《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20 页。)

青海省 1958 年死亡 27905 人,死亡率为 12.99‰(1957 年为 10.40‰) ;1959 年死亡 40216 人,死亡率为 16.58‰ ;1960 年死亡 103582 人,死亡率为 40.73‰ ;1961 年死亡 26872 人,死亡率为 11.68‰。(翟松天主编:《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24 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59 年死亡 115992 人,死亡率为 18.84‰(1958 年为 13‰) ;1960 年死亡 104618 人,死亡率为 16.67‰(1961 年回落到 11.71‰)。(周崇经主编:《中国人口》新疆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08 页。)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注1 赵发生主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8页。

注2 顾准著：《顾准日记》，北京，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6、21、33、43、48、51—52、58页。

注3 李玉霄：《杨显惠 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5期。

注4 沈河：《发生在1960年的“白日点灯案”》，上海《报刊文摘》2006年11月8日。

注5 转引自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上海《社会》杂志1993年第4、5合期。

注6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73页。

注7 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8页。《当代中国的人口》直说，1961年以前的统计本身就不准。可以认为，1486万的数字也就很难认为是准确的。

注8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转引自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上海《社会》杂志1993年第4、5合期。

注9 转引自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注10 转引自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注11 [英]菲力普·肖特著：《毛泽东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页401。

(上接48页)社会主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曾坚守着公有制的一统天下。直到今天,还有人以鄙视的态度将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判定为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呢!理由是:这些国家还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为了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必须突破陈旧、僵化的社会主义观念。这种社会主义观念将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的神圣原则,至于实践的效果如何倒不加以计较。但是,所有制(不论是公有还是私有)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判断一种所有制之孰优孰劣,姓社姓资,不是看它挂的是什么牌子,而应当看其以什么绩效报效社会:第一,是否能为社会提供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第二,这些财富是否能供全体社会成员合理地共享。对此,社会民主党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保留的是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从而能为社会提供比你们实施公有制的国家提供得多得多的物质财富;有了这丰富的物质财富,政府才可以进行二次分配,调节贫富差别,使全社会共享富裕。这才是人民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否则怎能获得人民的普遍支持呢!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是:国家不掌控(全部)生产资料,不包办生产经营,但通过税收集中社会财富进行社会主义的再分

注12 贾斯柏·贝克著：《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页。

注13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表一：1958-1962年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安徽633万，四川940.2万，贵州174.6万，湖南248.6万，甘肃102.3万，河南293.9万，广西93.1万，云南80.4万，山东180.6万，江苏152.7万，湖北67.5万，福建31.3万，辽宁33万，广东65.7万，黑龙江19万，河北61万，江西18.1万，陕西18.7万，吉林12万，浙江14.1万，山西6万，合计3245.8万。

注14 文章来源：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great_famine.txt

注15 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页。

注16 上海《社会》杂志1993年第3、4合期。

注17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注18 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149页。

注19 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49页。

注20 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配。我们因此把它归结为一个公式：生产由你，分配由我。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成功的秘密。它还使政府省了不少心，大大降低行政成本。这是对马克思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修正和对实践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其实，社会主义的标准不应当狭隘地定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它应当有多项测评标准。如看其公民的权利是否得到切实的保障，看其法纪和伦理规范是否得到普遍遵奉，看其社会财富是否公平分配，看其工农、城乡、体脑劳动与贫富差别是否逐步缩小，看其国家、社会与公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和谐。总之，社会主义应当体现在国家的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个人的自由与幸福。这种社会主义的新标准新理念，一方面融合了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鉴于苏式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对社会主义概念内涵推陈出新，这是对过去长期为之遵循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

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已成为历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即融入了人类普世价值的康庄大道。

(责任编辑 李 晨)

国民党在大陆『二五减租』的失败

• 杨天石

北伐后,国民党宣布其农村政策:“改良农村组织,整理耕地,制定最高租额之法律,增进农人生活。”其城市政策是“颁布劳工法及工厂保护童工及女工。”^{注1} 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军湘、鄂期间,为动员农民支援北伐,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有大量左派参加的中央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通过《最近政纲》,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减轻农民负担,统称“二五减租”。^{注2} 孙中山生前说过,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注3} 1926年的“二五减租”方案可以说是孙中山上述思想的具体落实。当时各方,包括中共在内均无异议。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方案。同年底,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以极其严厉的口吻批评中共在土地问题上软弱,要求立即以激烈手段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1927年春,部分中共领导人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着手按国际要求开展农民运动,以致在中共和国民党内部都出现分歧,形成左右两派的对立。同年,蒋介石等在江浙地区发动“清党”,成立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标榜实行“二五减租”。1927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佃农对于地主除缴纳租项外,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权”。^{注4} 根据这些精神,湖南、湖北、江苏都曾制订过相应条例,但是,真正实行过的只有浙江省。

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浙江党政联席会议曾公布《最近政纲》,宣称“减轻佃农佃租百分之二十五,遇有重灾歉时,更得酌量减轻之”。1928年,浙江省主席何应钦等人认为:“佃农终岁勤劳,三餐难得一饱,业主一次投资,子孙坐收其利。事之不公,无逾于此。”^{注5} 同年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省政府联席会议通过《浙江省十七年佃农缴租章程》,规定“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佃农依最高租额减百分之二十五缴租”。这样,佃农只须向地主交纳收获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自己则可得百分之七十五。《章程》同时规定:“副产业之收入,概归佃农所有。”《章程》一方面对地主撤佃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佃农“不缴租”。^{注6} 同时颁布的还有《佃业理事局暂行章程》,规定省、县两级设佃业理事局,由省县党部、省县政府、省县农民协会等三方组成,处理农民和地主之间出现的纠纷。省党部在处理佃业纠纷决议案中声称:“浙江省本年佃农缴租实施条例,绝对不含妥协性。”“土豪劣绅、恶田主及农人中之地棍、流氓,仍其本来面目,而有挟制压迫他人之行为者,治以反革命罪。”^{注7} 既反对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也反对农民中的所谓“地棍、流氓”,力图不偏不倚,站在中间。1929年2月,国民党浙江全省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及决议案,继续声称实行减租。会后举行常务委员会,决定会同省政府,成立缴租章程讨论委员会,讨论施行办法。

浙江省的“二五减租”幅度较大,佃农实际所得远大于地主,因此,自始即受到城乡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1928年10月,董士钧等以永嘉城乡全体等众名义上书,指责减租之举“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注8} 11月,董松溪等以浙江全省公民代表名义上书,指责浙江省党政两方“高坐堂皇,罔知民间情状”,“自党部至处理佃业各机关,以逮于各农协会,均为恶化、腐化、

无产暴民所占据”，“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帖耳。”同月，永嘉城区业主上书，指责佃业理事局“每袒于佃方，致业主所得不及佃农十之二三，不平太甚，众怨沸腾”。1929年2月，永嘉李芳等上书，攻击“永嘉近日农运，已入阶级专制状况，流毒所至，中等之家立见倾覆”。同月，叶清等上书，声称“二五减租原为调剂劳资冲突，实行阶级调和民生主义，应从全民利益着想。民等弱小业主，似此横受佃农非法压迫，心何以甘”。3月，叶何氏等上书称：“受佃农之压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夫岂训政时期实现民生主义之良象！”同月，屈映光、张载阳、吕公望、周凤岐联名上书，攻击浙江所订缴租章程“尚欠平允”，“共党乘机捣乱，勾结土匪、流氓，借减租问题向业方肆行抢掠，杀人烧屋，大祸频乘，势急倒悬。”上述四人中，屈映光是北洋政府大官僚，张载阳曾任浙江省省长、北洋政府时期的陆军上将；吕公望原为光复会会员，担任过广州军政府参谋部长；周凤岐原为孙传芳所部师长，向北伐军投诚后被任命为军长，曾任国民党浙江省政治分会临时主席。他们的联合上书，反映出浙江城乡地主、官僚、士绅对“二五减租”及其相关规定的强烈不满。

在城乡地主、官僚、士绅的强烈反对下，浙江省政府当局终于坐不住了。1929年4月，浙江省政府继任省主席张静江等人以“纠纷迭起”，“政府税收逐年减少”为理由提出：

本省自前年试办二五减租办法以来，佃业双方纠纷迭起，微特无成效可言，又并深受其害。初则佃农因收获多寡之争执起而抗租，继则业主因减租影响收入，将田亩收回自种，纷纷撤佃，于是佃农之强悍者又群起反抗撤佃，往往霸佃不让，而懦者即缘此失业。各地方凡遇此项情事发生，即有地痞、流氓从中把持唆煽，甚至土匪、共党，亦即乘机骚扰，以此种种原因，遂致佃业两方之生计，并皆不得安定。不独佃农与地主不能合作，共谋农业生产之发达，且田价暴落，社会经济发生急激之巨变，影响所至，竟致政府税收逐年短少，尤以田赋为甚。^{注9}

浙江省政府委员会随即召开会议，认为减租办法“洵属有弊无利”，决定暂时取消，此后田租

多寡，由佃业双方根据《佃农保护法》关于租额不得超过收获总量的40%范围以内，自行协定。^{注10}这样，佃农应缴租额就又较此前的百分之二十五提升了。

浙江省政府的决定受到强烈反对，浙江许多国民党员、农会及其工作人员纷纷呈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

武义县党务指导员胡福指责浙江省政府：“违背革命原则，莫此为甚。此等消灭民众对本党之信仰的议案，如不予以纠正，党国前途，何堪设想！”^{注11}

国民党鄞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赵见微分析说：二五减租，浙江推行已经两年，成效渐著，基础已立，纠纷所在，源于“土劣地主之反动”。“此后凡属革命建设，谁能保无纠纷，一遇纠纷，即行取消，则所有革命建设必致无从进行”。他责问说：“与其空言积极，继续剥削佃农以增肥地主，何如实行政纲，努力解放佃农以取信国民？”

余姚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萧显称：此事缘起，在于“土劣因租既被减，心犹未甘”。他谴责浙江省政府的决定有“四不通”、“二不法”，声称这一决定“摧残农运姑置不论，其如农民将对党失却信仰何”！

国民党萧山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周旦充分肯定二五减租的“伟大作用”，认为它可以“培养农民自修之抵抗力，消灭土劣压迫农民之凭借”。他表示：浙江农民“因得本党之扶植，始稍稍有反抗之表示”，国民党应该继续前进，彻底解决“佃业两方之纠纷”。他担心，国民党的政策自此改变，“拥护农工诚恐转为压迫农工”。

浙江省杭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尹希指责省政府的决定，不啻推翻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之决议案，是“撕碎本党之政纲政策反革命之行为”。

海盐县党务指导委员顾佑民称：二五减租“为解放农民第一步，本党必须继续努力”。

佃农代表涂侠等十人要求浙江省党部：不可因困难而中辍，不可因噎而废食。

萧山国民党员陈荫楠要求浙江省党部出面纠正，呈文称“党部为最高机关，省党部固具监督省政府权。而今省政府取消减租，违背政纲，大冒不韪，应直起纠正”。

这些呈文,维护原定的二五减租方案,激烈抨击浙江省政府,反映出广大农民和不少国民党浙江基层工作人员的心声。

鉴于广大党员纷纷反对浙江省政府的决定,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召开常务委员会讨论。会议认为二五减租为党政双方共同决议,不能由省政府单方取消,且亦与国民政府所颁布之《佃农保护法》大相刺谬。常务委员会朱家骅等人向浙江省政府提出《复议理由书》,要求开会复议。《理由书》首先提出:国民革命必须“首先解放农民”,“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的政策,须着眼于农民本身之利益”。接着,《理由书》陈述“二五减租”和孙中山倡导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之间的关系:“土地问题为民生主义之基础,而农田问题又为土地问题之主要部分。农田问题设无适当之解决,则整个社会问题亦不能解决……总理遗教,实欲于最短期间内促进耕者有其田,而二五减租实为实现平均地权之捷径。二五减租之基本观念,诚为解放农民之最低限度之政策。”《理由书》批驳浙江省政府“由业佃双方自订缴租数量”的决议案,“实不啻驱农民于水深火热之境,使任受地主之蹂躏”。《理由书》要求按照孙中山的遗教,“对抗税者加以没收土地之处分”,认为这样做,“迟以五年,则土地泰半将为农民所有”。^{注 12} 4月23日,浙江省政府复函浙江省党部,拒绝复议。《杭州民国日报》在省党部的支持下,大量刊登社评和各地反对取消“二五减租”的文电。张静江认为该报“妨碍省政府政策之推行,并损及省政府之威信,影响所至,尤关治安”,向该报提出警告。^{注 13} 继即勒令停刊,逮捕该报主笔。

4月27日,朱家骅与另两位常委叶溯中、陈希豪联名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申诉。朱等充分肯定浙江实行二五减租以来的成绩:“二年以来,因该项决议案之实行,浙省农村经济,率较他省安定,自耕农之逐年增加,农村小学学童之激进,工商业以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等,皆为不可掩之事实。”朱等严厉指责浙江省政府的做法只能引起“各地贪污豪绅之益肆凶焰,贫苦农民之剥肤及髓”,“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之繁多,社会各阶级之日趋尖锐化”,以致“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为共产党的发展提供“好机会”。《理由书》称:“以此而言民生,则日驱一千六百余万农民于

绝境;以此而言建设,则徒增多一般贪污豪绅之发财机会,构血花于白骨之上,以为伤心惨目之点缀品。此种举措,在各国专以驱骗贫苦民众、延缓资产阶级之寿命为职责、主张社会政策者亦不屑为,况夫实行三民主义,以冀达到世界大同之本党!”^{注 14} 朱等要求国民党中央迅速采取措施,纠正浙江省政府的错误决定。呈文称:“若中央对于浙江省政府此种违反党义党纲,僭越职权,以驱浙江千余万农民于绝境之取消二五减租不迅予纠正,严厉取消,则本党之所谓主义,所谓民生,将毋如屠人念佛,为本党仇敌所讪骂鄙夷,本党同志所疾首痛心。党国之威信无存,总理之遗教安在!”在浙江省党部向国民党中央申诉的同时,萧山县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也同时致电,表示将“率全萧三十万农民誓死力争”,并公推代表三人到南京请愿。^{注 15}

国民党中央接到浙江省党部和浙江省政府双方的呈文后,于5月2日召开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常务会议,决定接受戴季陶建议:1.核准浙江省政府的要求,取消《二五减租暂行办法》,但认为浙江省政府只是因实行上的困难而暂时停止,并非取消二五减租之原则,要求浙江省政府修正文字,以除误解。2.已实行减租的地方,而又无纠纷者,不得再将租额复旧,以免再起业佃两方的第二次纠纷。3.浙江省政府应于今后两年间,将乡村自治机关组织完全,土地调查办理清楚,并将二五减租之办法规定详密,以便施行。^{注 16} 其后,国民党中央派戴传贤赴浙,召集浙江省党部与省政府人员共同讨论,制订《浙江省佃农二五减租暂行办法》和《佃业争议处理暂行办法》,规定“土地收获除副产应全归农民所有外,由业佃双方就各该田亩情形,以常年正产全收获量百分之三七·五为缴租额,自行协定新租约”。在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二十五之间,采取了一个折中的百分比。

可以看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与浙江省政府的矛盾是“清党”后国民党内两种力量之间的一次角力,实际上是坚持还是否定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的斗争,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是否真正贯彻其社会改良主义路线的重要考验。国民党中央党部虽然在口头上表示要坚持“二五减租”,但在实际上支持的却是浙江省政府的“取消”办法。

这就表明，国民党的政策正在向地主阶级倾斜，其改良主义路线正在弱化。当时，浙江省政府委员陈布雷发表文章称：“实施减租之际，断不可含有片面的示惠佃农之观念。换言之，不能于二五限度以外，使田主再有所牺牲。”^{注 17} 陈的言论明显地表现出袒护城乡地主阶级的态度。但是，浙江城乡地主阶级仍不满意。1931 年 11 月，乐清县郑迈等 53 人致电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政府，继续指责二五减租办法“适以奖励惰农，生产力因之骤减，纠纷又日甚一日”。^{注 18} 同月，乐清徐可楼等 51 人具呈，认为“劳资合作，阶级乃能化合，而社会秩序始得维持。今平日感情极融洽之业佃双方，因减租各趋极端，已足影响治安”。12 月，乐清里长卢选臣等上书，认为二五减租使业佃双方“争长竞短，各不相让，因此发生绝大冲突，阶级斗争已成不可免之事实”，“绝对有弊无利”。1933 年，上虞县糜虞封等控告该县农会干事“额外减租，煽获佃农，抗租不缴”，国民政府居然批示：“应向该省主管机关呈诉。”^{注 19}

在地主阶级的强大压力下，浙江省的二五减租运动逐渐成为具文。全省八十多县中，只有少数县的部分区、乡有所动作，大多数县份仍是一潭死水，不见波纹。浙江省之外，其他各省均未实行，大部分省份连装模作样的减租条文都没有。国民党仅存的改良主义火星只是闪烁了一下，就灰飞烟灭。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重提二五减租，然而，死灰难以再燃，连些微的火星也难以见到了。

注 1 《敬告全国人民书》，《蒋校长演讲集》第 299 页。

注 2 《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录》，油印件。

注 3 《民生主义》第 3 讲，《孙中山选集》，第 849-850 页。

注 4 《土地改革史料》，国史馆 1988 年印行，第 33—34 页

注 5 《土地改革史料》，第 36 页。

注 6 《浙江省十七年佃农缴租

章程》，《土地改革史料》，第 37—38 页。

注 7 转引自万国鼎：《二五减租述》，《中农月刊》第 7 卷第二期，1946 年 2 月 28 日。

注 8 《土地改革史料》第 50 页。以下所引呈文，均见此书，不一一注明。

注 9 《抄原提案》，国民党党史馆档案，3.3/26.12。

注 10 《浙江省政府呈国民政府》，1929 年 4 月 30 日。国民党党史馆档案，档案号同上。

注 11 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3.3/26.12。以下所引各呈文均同，不一一注明。

注 12 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3.3/26.12。

注 13 《土地改革史料》，第 70 页。

注 14 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3.3/26.12。

注 15 《快邮代电》，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同上。

注 16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常务会议记录，1929 年 5 月 2 日，国民党党史馆藏。

注 17 陈布雷：《浙江省二五减租之前途》，上海《时事新报》，1929 年 5 月 9 日。

注 18 《土地改革史料》，第 110 页。以下所引各呈文均见同书。

注 19 《土地改革史料》，第 127 页。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徐庆全）

《炎黄世界》向海内外公开发行

立足广东，面向海外，纪实为主，刻画人物，贴近群众，干预生活，关心社会，注重民生，编辑力强，新闻性强，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写出内涵，体现亲情，突显风怀，溢露馨香，一流内容，一流包装，大型开本，彩色印刷，售价低廉，仅 6.5 元，单月出版，全年 39 元。

本刊由《家庭》原总编辑李骏主持编辑业务。

刊号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44- (Q) 1126

邮发代号 46- 159，欢迎到国内各地邮局订阅。

社址 广州市永福路 42 号永福楼西塔五层 504 室

电话：(020) 85171214、85171024

“4821”苏修特务案

● 韩磊

说起“4821”，不知内情的人大概会以为是一个秘密工厂或代号工程，其实不然。

1948年9月，为了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经党中央批准，由东北局选送21位“根正苗红”的年轻人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21个中共高干和著名烈士的子女一个不漏地被立案为“4821苏修特务案”，“坐牢的坐牢，隔离的隔离，受尽了苦难和折磨”（崔军语）。近日，笔者走访了这21位成员中的谢绍明和崔军，荒唐的“4821苏修特务案”在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1948年8月，东北局负责选送21位中共高干和著名烈士的子女赴苏联留学。他们是：罗镇涛（罗炳辉之女）、邹家华（邹韬奋之子）、谢绍明（谢子长之子）、叶正大（叶挺之子）、叶正明（叶挺之子）、任湘（任作民之子）、刘虎生（刘伯坚之子）、林汉雄（张浩之子，林彪之侄）、罗西北（罗亦农之子）、任岳（任铭鼎之女）、叶楚梅（叶剑英之女）、贺毅（贺晋年之子）、崔军（崔田夫之子）、项苏云（项英之女）、李鹏（李硕勋之子）、张代侠（张宗逊之侄）、朱忠洪（王稼祥义子）、萧永定（萧劲光之子）、江明（高岗外甥）、高毅（高岗之子）、杨廷藩（杨琪之子）。

这21个年轻人，19人是中共党员，根据上级要求成立了一个党支部，谢绍明、李鹏、崔军为支部委员。时年22岁的谢绍明早在红军时期就参加了革命，13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21人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位，因此被指定为这个“特别”党支部的书记，支部直接归东北局领导。

据谢绍明和崔军回忆，8月下旬，在他们21个人赴苏之前，中共东北局在哈尔滨国际俱乐部为他们开了一个钱行会，时任东北局领导人的高

岗、林彪、陈云、李富春悉数参加。在这个钱行会上，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代表党组织讲话，对这21个人出国学习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并明确了三条纪律：其一，必须刻苦学习，圆满完成学业；其二，专业学习，要根据祖国建设的需要选择；其三，留学期间，要集中精力学习，不准谈恋爱。

崔军少将离休前曾任武警水电指挥部副主任兼参谋长，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在讲到第二条纪律的时候，东北局领导高岗、林彪曾明确对他们说：你们的父辈打了一辈子江山，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新中国成立只是迟早的事了，用不着你们再打仗了，你们每个人都要学好技术，成为我们自己的专家，政治、军事就不要在苏联学了……

1948年9月2日，21个“红孩儿”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苏联。9月21日，他们来到了苏联首都莫斯科。不久，21个人被安排到距莫斯科300多公里的伊万诺沃城补习俄语，直到1949年7月。

1949年9月前后，赴苏留学的21个同学分别进了不同的大学，慎重选择了自己的专业，正式开始了在苏联的大学学习生活。罗西北、李鹏、崔军、林汉雄、贺毅等5位同学入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水电，晚一年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的萧永定选择了电机系；邹家华、刘虎生、张代侠等报考了莫斯科鲍曼工学院；叶正大、叶正明、朱忠洪等选择了莫斯科航空学院；杨廷藩、任岳、罗镇涛等报考了莫斯科财经学院；项苏云考入了莫斯科纺织学院；任湘进入了莫斯科地质学院；谢绍明、江明报考了莫斯科农学院；叶楚梅进入了莫斯科大学。

在之后的4到5年时间里，除2位同学因病提前回国之外，其他的19位同学都以优异成绩



1948年10月14日，“4821”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合影。前排左起：贺毅、谢绍明、项苏云、任岳、罗镇涛、叶楚梅、江明、罗西北；中排左起：李鹏、崔军、张代侠、叶正大、朱忠洪、杨廷藩；后排左起：刘虎生、叶正明、任湘、邹家华、林汉雄、高毅、萧永定（照片由崔军提供）

去打煤砖、挖臭水沟，甚至被支使去打扫女厕所所以羞辱他的人格。再后来，罗西北被关押在单间的“牛棚”里，被勒令交代二三十年前经历过的每一件小事，诸如在东北做地下工作时每一次发报的电报内容。达不到目的，专案组的人便反复地折磨和摧残他。他们把关押他的那间“牛棚”的窗户用牛毛毡钉死，把小单

间变成了黑屋子，吃喝拉撒睡都不准出屋。就这样，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被打倒了：罗西北的身体垮了，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出现了神经反应症状……

完成了在苏联的学习任务，于1954年前后先后回到已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新中国效力。然而，谁也无法预料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根正苗红”的“4821”群体，竟然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个大大的“问题”。

“我们21个人回国后，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党、为国家工作了十多年，谁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们全都倒了霉，‘4821’被打成了‘苏修特务案’，我们这些人坐牢的坐牢，隔离的隔离，受尽了苦难和折磨，无一幸免。”2009年年初的一天，已届八旬的崔军将军对笔者说起那一段已经过去了30年的噩梦般的岁月，悲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4821”21人当中，“文革”期间受罪最大的是罗亦农之子罗西北——一位卓越的水电专家。水电系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的时候，罗西北正在以总工程师的身份领导建设黄河刘家峡水电站。他全身心扑在自己钟爱的工作上，无论道德品质还是工作业绩都让造反派无懈可击。因此，“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罗西北没有被贴过一张大字报，成了当时刘家峡工程局唯一幸免的领导干部。

可是，1968年6月，罗西北突然成了“隐藏最深最深的阶级敌人”，批判他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刘家峡工程局的大院。之后，他被勒令

间变成了黑屋子，吃喝拉撒睡都不准出屋。就这样，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被打倒了：罗西北的身体垮了，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出现了神经反应症状……

崔军是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农民领袖崔田夫之子。“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在黄河青铜峡工程局任副总工程师兼质量处理办公室主任。“文革”开始后，由于一大批老同志和业务骨干被打倒，青铜峡工程整个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用崔军的话说，青铜峡的“革命”形势和全国一样，一天比一天“好”，生产形势也和全国一样，一天不如一天。

1967年7月24日，青铜峡工程局的两派“革命”组织“联总”和“工司”在青铜峡黄河大桥发生武斗，一青工在夺取火车头的“战斗”中不慎掉下来被火车轧死。事后，崔军去看望了这位青工的父亲，一位老浇注工人，并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让崔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个年月，许多人失去了正常思维，他的几句安慰话竟变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铁证。次日清晨，“打倒杀人凶手幕后策划人崔军”的大标语贴了出来。几天后，除了“杀人凶手”外，崔军又被戴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他“还没弄懂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稀里糊涂地推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崔军语）

1967年7月底的一个晚上,大概10点多钟,崔军的家门被叫开,一群戴着“造反”红袖章的人蜂拥而入,指着崔军的鼻子大骂“杀人犯”、“苏修特务”。随后,他家中的技术资料 and 从苏联带回来的书籍、毕业证书、生活照片及笔记,被革命小将撕的撕,摔的摔,扔了一地。崔军在苏联和外国学生、外国教师的合影照,他在黑海休假时和同学一块游泳、晒太阳的照片,成了他里通外国、生活腐化、搞特务活动的罪证。珍贵的技术资料和文艺书籍被销毁,照片和纪念品被抄走。崔军被关进牛棚,失去了自由。

之后,他每天胸前挂着重达二十多斤写有“杀人犯、苏修特务崔军”的大铁牌,戴着二尺多高、用15圆钢筋做成的高帽子,穿着纸糊的写着各种侮辱人格的词语的衣服游街,被人拳打脚踢,用指头粗细的钢筋棍抽,受尽了屈辱,吃尽了苦头。造反派扣发了他的全部工资,每天只给一毛钱吃饭。一毛钱,崔军天天只能吃个半饱,还要去干重体力活,打风钻、搬水泥……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

和罗西北、崔军大同小异,“4821”的其他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折磨和摧残。谢绍明在沈阳被隔离审查,每天就是两件事:干重体力活,接受批斗,饮食上只能吃窝窝头和咸菜。邹家华被关押在“牛棚”里,大夏天不给水喝,逼得他只能在吃完饭洗碗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偷喝洗碗水。朱忠洪在长春被打成反革命,在“文革”结束前后来到北京,不幸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那么,“4821 苏修特务案”究竟从何而来呢?

据崔军介绍,对于“苏修特务”这顶帽子,当时正在青铜峡“钻山沟”的他和其他受灾受难的“4821”成员一样,起初以为这只是空穴来风,那些人闹腾一阵子可能也就没劲了。但后来从多次批斗和不断有人来进行的外调中,他才知道这件事绝对非同小可。事过境迁之后,这些当时被蒙在鼓里的21位当事人才知道,原来,“4821 苏修特务案”是中央三办立案的大案,而且是由康生亲自抓的,把罗西北、崔军等人抓起来的指令也是康生等人亲自下达的。

谢绍明认为,“4821”成为一个问题,大背景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中苏交恶,直至后来彻底断绝来往,使得众多留苏人员无辜受到牵

连,成了不被信任的对象。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企图借助整治罗西北、邹家华、李鹏等人,达到其攻击、加害周恩来、叶剑英等开国元勋的罪恶目的。

“4821 苏修特务案”最终得以平反已是1982年的事了。

据经手平反此案的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曾志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给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送去了一份胡耀邦的亲笔批件,让中组部考察了解所列名单上21位同志的情况。并于1981年1月17日再次批示,要“中组部同他们(21位同志)的上级联合起来考察一下”,“对他们适当安排”。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中组部于1982年1月向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写出了报告,认为“所谓‘4821 苏修特务案’纯属冤假错案”,并宣布给予“平反”。加在21位同志头上的不实之辞被全盘推翻,但他们身心所经受的折磨和摧残,连同他们被耽误的岁月,以及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却永远无法弥补了。

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和批示下,除失踪的朱忠洪外,其他20位同志都得到了适当的安排和使用。截止到1981年底,20位“4821”成员中,提任部长的1人,担任副部长或相当职务的3人,副部级后备对象2人,担任司局级职务的7人,准备提拔为副局级的1人,处级干部3人,工程师2人,一般干部1人。

“虎毒尚不食子。这些人个顶个的根正苗红,不是高干子女,就是革命烈士的后代,绝对是这个党、这个国家最靠得住的依靠力量,结果‘文化大革命’连他们都不放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化大革命’是何等的灾难和荒谬啊!”李锐曾任原水电部副部长,与罗西北、崔军、李鹏、林汉雄等人自1954年起就有了交往,对“4821”半数以上的人都比较熟悉,对“4821 苏修特务案”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2009年3月5日,在跟笔者谈起这桩陈年旧事的时候,老人感慨万千地说了上述这段话。

(作者系《水利水电工程报》记者)

(责任编辑 李 晨)

我在良渚论坛的致辞里提出，学术讨论要畅所欲言，无拘无束。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所以论坛很生动。

这次许多同志谈到普世价值。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但也可以讲几点看法。第一是，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第二是，普世价值不可一概否定；第三是，发生争论时，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所谓人以群分，是指差异性。但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阶级与阶级，以及东西方，差异之外，还有同一性。过去对同一性讲得很不够。人类是有共同理想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可以看作人类的共同价值。也因此才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也是我们提倡“和谐”的前提。所以，普世价值客观存在。不能因为有人以自己所主张的价值或者某个地方的价值号称“普世价值”而一概否定普世价值的客观存在。根本上否认普世价值，也不利于我们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思想和先进的机制，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因为你把前提否定了，等于把交流和对话的基础也否定了。势必导致“文化相对主义”，也不符合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

我尤其想讲一下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发生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我不主张在发生此类问题时采取压制、戴帽子甚至政治威胁的方法。还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对待不同意见大致有以下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党同伐异”，你不同意我的，我就办你。就是孔子所说的“小人同而不和”。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鲜见。第二种是“求同存异”。这比前一种，进了一大步。我们现在奉行的就是求大同存小异。但我觉得，上述两种之外，还有一个根本态度问题，我个人认为可以称为一种境界，就是“敬其所异”。你有不同的意见

普世价值不可一概否定

· 高占祥

吗？你有不同的观点吗？我首先表示尊重。而且，这种尊重还表现为我尊重你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并且反对压抑你的不同意见。为什么要这样，一是因为意见虽然不同，但大家是平等的。在学术问题面前谁也不能居高临下。二是因为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就没有学术的进步。同样，无论个人还是集团，没有对手、没有竞争者也不会进步。所有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对手”。因此我说的“敬”字，是很真诚的。当然对于领导者，尊重不同意见，还是一种雅量，一种民主风度。

完全相同的东西，一万个加起来，还是一个东西。事物的发展，就是在同与不同的创新当中发展的。我记不清楚，哪位哲人讲过这样一句话：美好的东西是光明和阴影组成的。我对这句话很欣赏。因为我是搞摄影的，我知道如果都是一片光明，没有影，那就不叫摄影，顶多叫照相。你想，这张照片上全是一片光明，没有影，能够构成一张美好的图画和美好的作品吗？

世间任何美好的事物，恐怕都是由光明和阴影组成的。社会的进步也是由光明和黑暗两种力量从不同角度推动的。我们只有包容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观点，才能相互撞击相互吸纳相互融合，在融合中筛选，在筛选中升华，不断走向新的

的境界。

总之，我们对待不同的学术，对待不同的观点，都要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争议是有益的，不同意见和不同观点是需要善待的，只有保持这样宽松的心态，从容的心态，才能从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中吸纳有益的因素，才有助于我们认识的升华。（本文为高占祥同志在中华文化与普适价值讨论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

（作者系文化部原副部长）

社会主义的世纪遗产

• 应克复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统一、分裂、再走向合作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民主社会主义及其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时期，或称国际工人运动统一时期。时间是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869 年起，欧洲很多国家先后成立了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当时通称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当时也同意使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提法。李卜克内西的经典解释是“未来将属于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民主。”说明两者互为基础、不可分离。1876 年第一国际解散。1889 年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又组成第二国际，继续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第二阶段：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与对立时期。时间是第三国际成立（1919 年）至苏联解体（1991 年）。总的来说，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经历了大起大落：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但继而无不遭受重挫，不得不改道易帜，谋求新路。社会民主党经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阵容不断壮大，在许多国家纷纷上台执政，其影响超越西欧地区，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

一次大战爆发后，由于对战争看法的分歧致使第二国际分裂。1919 年 3 月，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成立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1923 年 5 月，以伯恩斯坦与考茨基为代表的右翼和中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从此，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互相对立的两个国际组织。1949 年，中国革命与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其领土、人口和工业总产值都约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此时期社会民主党在世界范围内共有 34 个，有德、英、法、瑞、丹等十几个社会党在竞选中先后上台执政或联合执政，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

从 1949 年到 1991 年苏联剧变，40 多年间双方继续对峙。共产党最辉煌时曾发展到 150 个左右，执政的有 16 个。由于体制的缺陷与执政中的重大失误，致使 1989 年到 1991 年，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垮掉了 11 个，出现了严重的败局。而此时期社会民主党得到稳步、快速的发展。1951 年，社会党国际成立。二次大战后，先后有 40 多个社会党上台长期执政，且效果显著。此时期社会民主党由欧洲扩展到世界五大洲。至 1991 年社会党已达 151 个，至 2003 年，已达 169 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遍及全球。苏东剧变后，原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绝大部分改名换姓，转变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还有一些西欧共产党也改名为社会民主党。

第三阶段：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和解与合作时期，时间是 20 世纪的 80 年代至今。1976 年社会党国际十三大后，社、共两党超越意识形态障碍，开始对话与合作。1991 年苏东剧变后，更进入了密切合作的新阶段。特别对于共产党，总结对立时期的经验教训，认识到社会民主党是值得共产党人借鉴学习的朋友，应求同存异，加强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二

两种社会主义，经过一个世纪实践的考验，一衰一兴，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人类的世纪遗产，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这里仅提出几个问题。

一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如果将其中一种方式作为获得国家政权与争取社会主义的绝对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可取。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都没有加以绝对化。“暴力”还是“和平”，不应当从革命政党的主观偏好出发，而是取决于各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地说，取决于统治者的统治状况。如

果有和平的可能应当以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这种可能的胜利。暴力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在已经有了健全民主制的社会里,依然鼓噪暴力,可能会被当作笑谈。我们不当崇拜暴力,迷恋暴力,但如果以和平的方式争取基本权利的道路被统治者全都堵塞,难道我们只能在无限止的忍受中等待死亡!所以,反抗权、革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当然,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启用这一权利。恩格斯晚年(1895)所声明的关于不放弃“革命权”的遗训,大概也出于这一考虑吧!《独立宣言》(1776)也特别声明这一权利:“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奉行着那一个目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过去我们只强调“暴力革命”,视“和平过渡”为修正主义。现在也不能走向另一极端。毕竟任何人都不能向我们担保:人类在今后将永不出现恶贯满盈、倒行逆施的暴政。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告别革命”一说是欠妥的。

二是怎样对待资本主义民主制?是粗暴的否定还是理智地继承,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更深层次的分歧了。从阶级观点出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民主制不可能作出肯定性的评价。他告诫工人,“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现成的国家机器”,就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列宁更是大贬资本主义民主制,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并声称,“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主要民主百万倍”。此点对中国党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大约整整50年间,无产阶级专政大行其道,对资本主义民主制一直缺乏理性的审视和客观的评价。其结果,自由、民主一概封杀。至80年代,自由仍作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横加挞伐,而专政才是无产阶级的,一再坚持而且时有强化。民主社会主义呢,它的成功,它的崛起,恰恰是依凭于资本主义民主制。首先,资本主义民主制容纳了社会民主党这个非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的存在;其次,这个政党享有与其他政党平等的资格加入竞选的行列,作为选民们自由选择未来政府中执政的对象;第三,社会民主党执政后,不是“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即资本主义民主制,而是尊奉这一制度所体现的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的普世理念,利用这一制度现成的一套规则对国家进行治理。实际上,它也只能按照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成规施政。它不可能废除选举制,不可能把议会成为一党的工具,不可能抛弃权力分立与政治竞争的基本制度,也不可能以人治取代法

治,更不可能剥夺公民的自由,侵犯公民的人权。它所能做的,只能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础上,推出某些改革措施,引导民主制向完善化的方向发展,以更利于社会民众。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两种态度,两种方法所产生的不同后果,作为世纪遗产值得人们深思。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在共产党人中,不是没有人对此作出过反省。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政治遗嘱》(1918)中,中共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1940)中,对资本主义民主制都曾作出过中肯的肯定性评价,堪称是两个代表性的例子,只是长期被尘封,无人知晓而已。普列汉诺夫认为,“民主即人民的权力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陈独秀也认为,“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还说,无产阶级民主“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可以这么说,否定资本主义民主制,我们根本无法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

三是在经济基础方面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是实行保守疗法还是连根拔除?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在确立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根本分野。剥夺资本,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马克思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主张。对此,共产党建政的国家无不都照此办理。问题是实践的结果如何?答案是:生产力发展的长期停滞乃至遭受破坏,物质财富的严重匮乏,社会的普遍贫穷。实践证明,此种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方法是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说复杂些可以写一部专著阐述之;如果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表述之:那就是劳动者对劳动缺乏兴趣;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力劳动者到脑力劳动者,概莫例外。整个社会生产由政府包办,劳动者不过是官家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不但与生产资料切断了联系,与生产成果也切断了联系。生产得多与少,生产得好与坏,与他们个人没有联系,无须他们去关心。人性中的自利性被放逐了。人人成了一心为公的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共产主义新人。这当然是虚假的。实际情况是,在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每个人再无条件去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实现自己的梦想与抱负。每个人都被捆死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饿不死也吃不好,只能苟安地活着。每个人都成了被动的工具,成了螺丝钉。可悲的是,为了坚持(下转38页)

谁都摆脱不了客观规律的掌控

• 冯东书

社会上有人在文章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另外又有人在文章中说“劝君少颂秦始皇”。

我倒是觉得对秦始皇不是个“骂”和“颂”的问题，他是一本很丰富的书，能教给我们许多道理。比如，我个人在他身上就体会到我们应该牢记的一个简单而普遍管用的真理，这就是无论是什么人，不管他是大人物，甚至大大的人物，还是小人物，小小的人物，无论做大事或做小事，都摆脱不了客观规律的掌控，谁不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下场一定好不了。

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当然是有过大功劳的人。他利用先朝商鞅等人变法改革使秦王朝国富兵强的条件，大展宏图，统一了六国，开发了岭南（广东、广西等地），在全国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统一了交通，建立了全新高度集权的郡县政体，从而为今日之大中华奠定了基础。这个历史功劳不大吗？大得很。他因此得意得很，自信得很，自立为“始皇帝”，下决心要千秋万代把他创立的这个大秦皇朝子子孙孙传下去。但是，他没有想到成功也会是失败之母这条辩证法。十分遗憾，他刚死，第二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暴动就风风火火大烧起来，马上刘邦、项羽等人也趁势造了反。秦始皇死后第三年，那个看上去强大得不可一世的秦皇朝就灭亡了。这么一个强大的政权，怎么说垮就垮掉了呢？原因很简单，天下事物的运动是辩证发展的。正是秦始皇的大胜利，从另一方面给他造成了大悲剧。他，认识不了自己了，也认识不了客观世界了，以为他手里有了能扫灭六国的军队，自己当然是天下最有力量，最有权威的神人了。他大权在握，觉得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他也听不得，也听不到逆耳话了，他完全没有想到天下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掌控着他的命运，这就是物极必反的客观规律。历史已经证明，亡秦者，秦始皇也！正是他的暴政，发动了人民群众要起来打倒他的皇朝，他正是挖坑埋葬他自己创立的大秦皇朝的第一人。一说到秦始皇的暴政，人们就要说到“焚书坑儒”。其实，在那个时代坑掉460多个儒生，实在算不了什么太大的事。开始造反的陈胜、吴广不是儒生，他们的队伍是农民造反队，是文盲队伍。

说起客观规律，因为它很不具体，看不见，摸不着。很多人不信其有，或只是嘴上讲讲，心里不信。特别是有些人功劳大了以后，权势大了以后，他们就越容易看不见，摸不着。他们和秦始皇一样，更相信权力、武力才是实实在在的，认为有了这些权力就能干成一切，就能拥有一切，甚至能改变客观规律。但是我们如果冷静下来细想想，包括中国、世界上的大事，分析其兴衰、成败，就能证明客观规律是确实确实存在的，而且是不以任何个人和集团的欲望为转移的，它掌控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结果。中国历代皇朝更替，从表面上看哪个末代皇帝手中没有权力？他们是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吗？没有哪个皇帝有这个自觉性，实际上他们当时已是有“权”无力了。他们是在挣扎中灭亡的，是社会矛盾中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他们必然走向没落。客观规律有那么大的力量，它到底在哪里呢？从社会运动来说，它存在于整个社会的人们心中。陈胜、吴广的队伍，都是小老百姓。刘邦先进咸阳，马上听取张良等人的意见，向群众约法三章，废除秦朝那一套苛政，自己不住进皇宫，因此大得人心，他聪明。项羽这个人是个二杆子，只相信自己，只相信武力，不会用人，就会乱杀人，到处显得自己了不起，他进了咸阳之后，废了刘邦向群众许诺

的“约法三章”，大开杀戒，不仅把皇宫里的宝贝卷走了，还一把火把皇宫烧了。宋代诗人张耒的诗说：“慷慨悲歌君勿恨，拔山盖世故应亡。”诗人说，项羽看起来很英雄，实际上活该灭亡。这就是客观规律在起作用，它决定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

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世，10月6日，从1966年到1976年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权倾全国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一伙人一下被抓了起来，竟没有费一枪一弹。中国从此开始走向了一场大改革。改什么？改过去执行了近三十多年的极左路线。在共产党里，“左”代表革命，“左派”是“革命派”。“右”则代表“不革命”，“右派”是“反革命派”。“极左路线”是什么？就是“极端革命”的路线。“四人帮”就是专搞“极端革命”的人。无论什么事，走向了极端，就一定走向反面，这就是客观规律。他们搞那个“革命”，从“革命对象”上来说，不仅早就革了资本家的命，后来连按共和国宪法选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其他新中国的开国元勋、老师及从中央到省（市）、地、县、乡（当时叫人民公社）各级党政领导和机关、学校、医院、报社、工厂等单位（当时没有民营单位）的领导人，小到县里的电影放映队队长（当时县里还没有电视），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都随便被“革命造反派”揪出来，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抄家、夺权、打倒、斗争。刘少奇等一大批上上下下的领导人被整死，没有任何人负法律责任，当时叫这是“造反有理”（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大平反，开追悼会）。农民则被说成是“小生产者”，“而小生产者是每日每时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五十年代就被用强制“自愿”的办法，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归了公，断了他们想依靠自己劳动发家致富的路，他们成为人民公社里无权、无自由的劳动工具。以后仍每年每月在和他们的所谓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这就得罪了全国最大多数的人。从那以后农民就不好好种地，弄得全国人民长期在半饥半饱中挣扎。因为农业上不去，全国农村又搞了一次“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说农业上不去是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不纯，里面混有坏人，有阶级敌人和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整了一大批农村

基层干部。山西省昔阳县整死40多人，陕西省长安县整死500多人。知识分子则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即学者、专家、文学家、艺术家、教师等），他们知道得太多，爱议政，爱讲民主，他们中间有55万人，早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分子”（造原子弹、导弹的保了下来），押送农村劳动改造，成为阶级敌人，是没有公民权的贱民。“文革”又整得更多，整死不少。受他们株连，全国有几百万“右派分子”家属也翻不了身。这样搞，当时凡讲真话者也都倒了霉，刘少奇就是在党内会上讲了真话，彭德怀元帅也是因为党内会上讲了真话，被打倒整死的。这就使人失去了思想自由、说真话的自由，只能讲官话、假话、空话。“三年困难”明明是“大跃进”、办人民公社造成的，公开只准说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

“极左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讲不调和的斗争哲学，即两个阶级（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两种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里的革命，“文革”中达到顶峰，要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革“金钱挂帅”、“利润挂帅”、“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等的命，学校中要革“文革”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因为它培养出来的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师道尊严”的命，所谓“旧”，“文革”前的都是“旧”的。于是“文革”中，全国人民没戏、电影、书看了，每天只能翻来覆去看江青插手搞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人们烦死了。歌只能唱“革命”歌，有人情味的歌是绝对禁止唱的，只能读毛泽东著作和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书。人性、人情、人道、道德都在批判之列，是“资产阶级情调”。事事、处处要讲阶级界线、路线界线。当时人们的衣服基本是三种色：蓝色、灰色、草绿色（军服），不能花，没有彩。“革命”还要搞到国外，大使馆里也造起反来，大使是当权派，成了革命对象，搞得大使没法工作。在外国贴鼓动极端“革命”的大标语，还在国内冲击外国驻华机构，搞得外国人很反感。最绝的是提出了“要革‘私’字的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是要和全人类作对了。

这场革命更绝的是，1966年“文革”开始被煽

动起来免费坐火车到全国各地去无法无天冲锋陷阵,冲机关、砸寺庙、烧文物,造反“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幼稚的青年学生成了最后一批革命对象。老师挨批挨斗,老教材不能用,学校上不了课了。最后,统统被赶到农村、农场,去当农民或农业工人,当时叫“插队(农村生产队)落户”。当时“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说,“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子的最后分界。”这场恐怖的,没完没了斗斗斗的“革命”,改革开放以后出的文章和书籍已经叙述很多很多了,这里就不用再多说了。总之,当时搞得天下大乱,人们无法正常生活,火车无法正点,工厂无法正常生产,除了造原子弹、发射卫星、导弹,“四人帮”不能乱插手外,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各地政府、各部门都乱了、瘫痪了以后,人民生活怎么办?社会怎么运转?靠周恩来总理和解放军出来苦撑。周恩来在病中不断被不点名批判。“文革”中大运动中套着小运动,如在“评法批儒”的大批判中,那个“儒”就是暗指周恩来。在“批林批孔批周公”中名义上“周公”是指周朝的周公,实际是批周恩来这个“周公”。在“评水浒”中宋江被批为投降派驾空了晁盖,实际上批的那个宋江又是暗指周恩来。周恩来办公室挂着一个口袋,口袋里面是牙刷等洗漱用具,随时准备被揪走。但是“四人帮”只会讲空话,不会治国,国家大小事离不开周恩来这个大管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就一直是总理。周恩来树大根深,是留法同学中共组织的创立者之一,是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第一支军队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书记,他那些战友、部下占着党、政府、军队要职,他勤恳工作,廉洁亲和,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民主党派内,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心中,分量奇重,又是个管家能手。“四人帮”不喜欢他,但又离不开他来管这个国家。天下被“四人帮”搞得太乱了,“四人帮”到处“放火”,他到处用巧法“灭火”,周恩来1976年1月8日去世,群众说是被“四人帮”搞得累死的。他去世以后“四人帮”说进行殡葬改革,规定除北京人民大会堂搞一个五千人的追悼会外,不准下面开追悼会,不准人们带黑纱。结果北京爆发了百万人参加的民间追悼活动,人们十里长街相送,有的

村都开追悼会。清明节,全国又自发爆发了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花圈如山,诗如潮,诗词都是抨击秦始皇和“四人帮”的。这时“四人帮”还不觉得自己已坐在火山口上了,把人们镇压下去以后他们还举杯庆祝自己的胜利。他们到那个份上,是相当疯狂而愚蠢的。

这样,到1976年“四人帮”被抓起来以前,中国大地上就剩下“四人帮”是最最革命的“革命者”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无论官与民,老与少,都成了革命的对象。你身上没有“四旧”吗?你脑子里没有一点“私”字吗?这种世界一大怪的“革命”还能不物极必反吗?还能不轮到由大家起来革他们的命吗?1976年10月6日抓“四人帮”时,他们孤立到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有。抓起来以后,全民欢腾。新中国又走上了新生之路。当年他们何其威风啊!最后下场惨得很哪。

只迷信自己的权力、权威就敢为所欲为者,他们的命运必然是“哭到最后”。这就是客观规律决定的。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李 晨)



从我的经历看反右

• 郭道晖

一、“双百方针”另有他图

毛泽东由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转而调转矛头大整群众（“右派”），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按他自己的解释是早已设下的“阳谋”。现在人们也多把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归于“引蛇出洞”的阳谋组成部分。这是与史实不完全相符的评断，是把始作俑者的复杂心计简单化了。

（一）双百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

1956 年到 1957 年初这段时期，尽管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却如毛泽东的估计，只是“吹皱了一池春水”，而苏共 20 大则在中国知识界多少起了一些思想解放的积极影响。中国大地满园春色，表面上是一片升平胜利景象：毛泽东提前加速推行的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接连取得“决定性胜利”，天安门广场举行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资本家敲锣打鼓（实际上当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是：“前门敲锣打鼓，后门抱头痛哭。”）；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总理作报告，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国务院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决议……

正是在这种“一片大好形势”的背景下，1956 年 5 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5 月 26 日，陆定一遵循毛的指示在怀仁堂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9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作出排除阶级斗争、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

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要求“向自然开战”。接着，毛泽东提出了十大关系的报告，特别是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宣告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现在的主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当时我是直接听了毛泽东这个讲话的全部原始录音的。我是湖南人，完全能听懂，至今留下的笔记也较详细。“讲话原稿”里根本没有反右运动后补加进去的所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很激烈”和“六项政治标准”等话语。他后来还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456 页）思想颇为开放。知识界欢呼雀跃，费孝通教授也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记得当时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袁永熙曾对我说：看来毛主席是想在他有生之年，做一个像唐太宗那样的“明君”，在他领导下，开辟一个超越“贞观之治”的开明盛世。

其实这其中还有更隐蔽的意图：联系国际上正在批判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党专政，毛泽东这些言论也是有意摆脱苏联的僵化模式，寻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显示中国党区别于苏共、毛泽东区别于斯大林的开明形象，有借此取代斯大林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考虑。正如有的老同志说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后，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过去他抵制过斯大林，证明是对的，斯大林死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舍我其谁”；惧的是怕中国党内也出个赫鲁晓夫。（见《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草案）》讨论会上朱德的秘书陈友群的发言，中直机关第 2 组第 15 期简报，并见其他人发言。）

所以，如果说毛提出双百方针和发动大鸣大放只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以之说明其中有他

对付极少数民主党派“右翼”人士的策略,或许适用。对广大一般知识分子而言,则并非如此。

可是,党内一些思想保守的高层干部并不理解也不习惯毛泽东有限度的开放方针,更不会洞察其中另有权谋。他们害怕放出“毒草”甚至“毒蛇”。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初讲话中,就说对双百方针,党内“十个高级干部就有九个不赞成”。据时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胡绩伟回忆,他当时就知道,“在中央最高领导集团中,了解毛泽东真实意图的人并不多。难怪毛说,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干部都不理解’。那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毛认为是保守的。毛批评《人民日报》对他的两次讲话在‘党报上没有声音’,而‘让非党报纸抓住了这面旗帜。’他表扬了《光明日报》、《文汇报》(引者注:两报总编辑分别是储安平、徐铸成)‘鸣放’得好。”(见胡绩伟《毛泽东与邓拓之死》,转引自 08-02-04 春雨博客)毛泽东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还点名批评解放军总政治部陈其通、陈沂等 4 位领导人写文章怀疑“百花齐放”未必能放出“大作品”,反而会放出牛鬼蛇神,从而否定“双百方针”的言论。毛批评说:“我看言之过早,还只 5 个月,如何就能有大作品?……苏联《文学报》也登了他们此文,可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台湾喜欢钟惦斐(注:指钟写的《电影的锣鼓》,被毛认为是否定电影事业的成就),苏联喜欢教条主义。”(见郭存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始讲话记录)当时苏共的领导人是很反对毛的双百方针的。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时,至少两次表示对这个方针的不满,他援引匈牙利事件来警告毛。(据接待伏氏的俄文翻译李越然:《国际舞台上的新中国领导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7—128 页)赫鲁晓夫对毛的双百方针也十分反感,他指示苏联报刊不再报道这方面的内容,“我们的立场是,中国的百花运动是中国为自己内部的需要而提出的口号,不适用于苏联社会。”(《赫鲁晓夫回忆录》英文版第 271 页。)苏共的党专政对毛泽东“恩赐民主”的双百方针也是容不得的,何况也深知毛醉翁之意是在利用这种适度开明的政治秀来同苏共唱对台戏。

(二) 毛泽东反对“避免毒草,力争鲜花”

当然,无需否认,毛泽东的双百方针,的确也

包含有要借此暴露民主党派中的“右派”的用心。清华党委 1957 年 4 月 23 日传达陆定一的一次讲话,就强调了这一点:

毛主席说:“‘避免毒草,力争鲜花’,这句话就是最大的毒草。”群众老说我们压他。群众看不到右派。一放,右派出来,群众看到了,左派就会起来,这样可以争取更多的群众。避免毒草就会使人思想僵化。右派不讲出来还暴露不出他的面目。

不过,他这里所指的“右派”,我认为还只是民主党派中的极少数被认为是“右翼”的人士,还没有延伸到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更排除了青年学生。这有陆定一在 1957 年 5 月 11 日来清华大学在党委常委会上的谈话为证。

我当时作为党委常委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见。开头,在蒋南翔校长向他一一介绍各位常委时,特别提到我这个基层党委宣传部长也是电机系毕业的,他还很感兴趣,因为他过去在上海交通大学念的也是电机系,笑说“那我们是双重同行。”陆定一听完蒋南翔等汇报清华鸣放情况后,说了下面一段话(据我当时的记录要点):

我们党,政治可打一百分,军事一百分,教育只 30 分。

不要怕人骂,我们骂了别人那么多年,他骂一、二句就不行?我们做了一阵秦始皇,不做,阶级消灭不了。

随着建设,有文化革命,要有学问,过去我们没有。政治、军事一百分,经济初步学会,就是文化教育还不行。文化中,文艺还有一支队伍,有力量,其余就没有了。如果长期不懂,就会被消灭。

队伍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青年长大,15 年后,熬出个教授来;二是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蒋南翔插话:清华有 109 个教授,其中党员 10 人。陆问:钱伟长为什么还没有入党?蒋有点发窘,向陆解释了一下钱的情况。因为他和钱之间有分歧。)

关于整风:闹要闹烂。准备闹事,不可避免,要闹烂才好。湖南三个高中学生写信给毛主席,说如果不让考大学,我们就武装暴动。……要闹就让他闹烂。

左、中、右,左派当权,中间攻,右派更攻。攻得不成样子了,中间派就会来批评了。那时就可

以大团结。

教授治校,本质是不要你领导。可以让他提,不要批驳。《人民日报》对雷海宗(时为南开大学历史学著名教授)文章加编者注(说他的观点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傻瓜。章乃器批评中宣部,报纸也给删去了。

登出来,不驳,要搞得烂了,中间派起来讲话了,这事就有办法了,他们主持正义了。要硬着头皮,沉住气。

由乱到治,一治一乱,这就是辩证法。

不会天下大乱。农民已经走上了合作化以后,他们闹得个鸟!

以上陆定一同清华党委常委的谈话,是在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前4天,看来陆虽然已知道毛有利用双百方针来“暴露”或“放”出“右派”的意图,也并未完全洞悉毛的“阳谋”。因为“暴露右派”早在提出双百方针的同时,就反复公开讲过。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8日、27日两次讲话),已经阐明了他鼓动鸣放的意图之一: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又要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页。)

对照毛泽东这段话,陆定一上面那段谈话,基本上是转述毛的精神的。而此时毛心目中所要“暴露”、“孤立”和打击的“右派”,也不过是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等民主人士中的“那一类”居然敢同他分庭抗礼的极少数人。并不包括一般民主人士和著名教授、学生。上引彭、陆、刘的讲话(见本刊今年第2期郭道晖文)中也如此。他们(彭、陆)还特别叮嘱要发展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要让青年熬出个教授来(陆定一),“学生中不要

主动去发动(鸣放),不要让学生去整教师。”(彭真)而且,那时只是把“右派”当着人民内部一个异己的政治思想派别或反对派,只企图从政治上把他们暴露后孤立,远没有像后来反右时当作反动派乃至反革命来严打。

二、整民主党派人士早有“阳谋”

在剖析毛泽东的“阳谋”提出的时间和针对性时,应当具体区别两类反右对象:一是民主党派中所谓“右翼”人士,二是一般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精英。毛对待这两类对象是有前后不同的变化的。

根据我亲历的历史事实和知悉的有关资料,我认为,对于民盟的所谓“右翼”,毛泽东倒的确早就谋算加以清扫了。有两个事实可以为证:

(一)毛泽东在建国前就谋划打击、抛弃民主党派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见《毛泽东文集》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512-513页)其中毛泽东审稿时特意加上了一段话:“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12页

据现今公开的苏联秘密档案,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一份电报中,就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该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见《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但斯大林不赞成毛的这个意见,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

复电中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见《百年潮》1998年第1期)遵从斯大林的这个指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是这样做的,但毛泽东一直不忘要削弱民主党派的实力和影响力。

(二) 建国初整民盟的一次预谋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即1951年—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我当时还是电机系毕业班的学生,任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被党委抽调去教师学习委员会担任学习组组长,提前毕业。我负责学委会的教务工作,还请中宣部黎澍同志担任清华学委会的顾问,我常去向他汇报请示。起初是正规地平静地学社会发展史等理论,还请了艾思奇“三进清华园”,给全校师生讲大课,受到热烈欢迎。但当他批判形式逻辑是“唯心主义”时,哲学系的金岳霖等老教授还同他辩论,说“你今天的演讲好就好在句句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气氛相当民主和谐。可是到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又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教师的理论学习就转变为“思想改造”。凡从旧社会过来的教授,人人“洗澡”,即作自我检讨,清理旧思想。在清华,这一运动名义上是由三反运动中成立的“节约检查委员会”主持(行政负责人即原学委会主任周培源教授),实际上是由学校党委和各系党总支具体领导。我被派负责联系文、法学院和理学院的工作。当时各系动员、组织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去“帮助”教授“洗澡”。抛弃了“尊师重道”的古训,让学生对老师开展群众性的严厉批评,教授们反映“洗澡水是滚烫的”。

多数教师被迫或半自愿地作了检查,顺利过关。但对社会系教授潘光旦先生,则扭住不放。他是费孝通的老师,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解放前是民主人士,政治上是进步的。但因为他和罗隆基

等人都是英美派的,因而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把他们当异己的势力。当时潘光旦是民盟中央常委会的委员和清华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清华“洗澡”重点是潘光旦,潘先生在社会系和法学院全院大会上先后做了三次检讨,还过不了关,说他是“铁心皮球”(外圆滑内顽固)。当时我想不通为什么要把他搞的那么突出,三次还不让过关?而解放前政治上比他“落后”的冯友兰教授却检讨一次就顺利通过。这种对潘光旦教授的特殊对待,其实并非清华党委的自作主张,而是由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掌握。我到市委统战部长李乐光同志(他也是清华大学的老校友)家里汇报。我说潘光旦已经在系里和文法学院检讨了三次,还不让他过关,是什么原因?李乐光说了一句:“这个你就别管了。”当时由统战部一位干部老吴(他原是北大地下党员)直接联系我。他后来说,这是中央直接掌握的,中央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担心他们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当时唯一能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就是民盟。民盟有政治资本,他们反国民党是有功的。我们党中央也担心这股势力强大了,成为一个对立面,所以解放初就说要对他们敲打敲打。……

可见,清华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是借批潘光旦,敲打罗隆基,是给民盟“右翼”一个警告。后来潘光旦第四次在全校大会上检讨,才勉强通过。为此市委还先后布置清华党委宣传部编印了《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和《欢迎潘光旦先生开始的进步》两期专刊,在校内外(特别是民盟中央)散发。

现在看来,这实际上为后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整民盟“右翼”留下了伏笔。如果说,反右早有预谋,以上毛泽东对待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的谋算和整潘的做法,就可说是毛泽东反右“阳谋”的序幕。

毛泽东“阳谋”首要对象是民盟,这一点,还可以从反右开始时他在6月8日和6月10日写的两份党内秘密指示看出来。其中他认为,民主党派中,民革、民建、民进和九三学社颇好,民盟、农工最坏,说章伯钧、罗隆基在拼命做颠覆活动,野性很大,党(指民主党派)要扩大,政要平权(指同共产党的政权“平起平坐”),等等。(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

分子的斗争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他在1957年7月1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中,主要矛头也是对着民盟和所谓“章罗联盟”的。

据1961年民盟中央公布的内部统计,民盟共划右派5173人,占民盟盟员总数的15%。民盟中央一级共划61人,占民盟中委和候补中委委员总数的33.6%(参见章怡和《泪祭罗隆基》,转引自五柳村网站2007年4月26日)。

三、整一般知识分子是后发的谋略

至于对党内外一般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从本文前述毛泽东和邓小平、彭真等人的一些讲话看来,在5月15日毛泽东决定反右“阳谋”以前,是并未当作整肃的对象看待,而只是要求教育、改造他们,争取他们“靠拢党”,甚至要吸收他们中有些人入党(如梁思成和钱伟长)。

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原稿对“毒草”还看得比较轻松,说“锄掉它作肥料就是了”。

真正对大批民主派知识分子的鸣放实施阳谋,则是自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党内指示才有此创意。这是基于出乎意外地发现,事情并非他原来企望的那样,把群众的矛头引向他要排斥的高层异己势力,相反却直接冲着他本人和党垄断执政地位而发,所以才说事情起了“变化”,实际上是他主观估计和谋略上起了大变化。鸣放出来的不只是他认定的所谓“毒草”,而居然直冲着毛泽东。像储安平等人居然胆敢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权(“党天下”),甚至暗讽毛泽东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直接触犯“圣上”的尊严和心病。甚至包括张奚若教授这样德高望重的无党派著名民主人士也直接批评毛“好大喜功,迷信将来”。鸣放中还有人说,“三害”的根子“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12页)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感到危及他绝对权威地位与“舆论一律”的思想政治统治。所以非给这些“吃共产党的饭”而自命清高,明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却还自诩“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分子一点颜色瞧瞧不可!这才对争民主的

知识分子精英、包括著名教授和冒尖的青年学生,大打出手。

四、标榜“阳谋”旨在安抚党内

毛泽东由发动整风转到反右的另一重要动因是来自党内的压力。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初讲话中,就说对双百方针,党内“十个高级干部就有九个不赞成”。加之,大鸣大放中群众火力多集中于基层党政干部,他们感受到群众巨大压力,也很有怨气,说毛主席这样发动群众来整我们,“我们已经顶不住了!”(如本文前引彭真的讲话中提及的:整风鸣放时党内干部“有人恐慌起来,自杀的也有”,有人“要上吊”。)纷纷上书要毛主席赶快“收”。毛泽东感到他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的做法显然是失算了,就赶忙来一个180度大转弯,变“放”为“收”,大肆反右。原拟借党内整风来整党内高层异己势力的打算就推后了。

我们党自执掌全国政权以来,一些干部以“打天下者坐天下”自居,从毛泽东到一些中、高级干部,常常一口一声“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的,别想翘尾巴!”抱着恩赐观点,高踞群众之上,还从来没有受到群众这么直接的批评、冲击、冒犯这么厉害。广大中上层党政干部当权以来对听取批评意见的民主是很不习惯的。1956年清华大学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受当时国内外情势的影响,许多党员对学校党政领导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算是比较尖锐的批评,党委书记蒋南翔在会上作了一些检查。后来他说:“我一辈子也没有作过这种检查!”

1954年—1955年在机关和学校的批胡风、搞肃反,已经很“左”了,在群众中已积压了不少怨气;平日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也引起群众不满。一到整风“大鸣大放”的情势下,就释放或爆发出来了。

据解密的反右档案资料,5月2日到12日,全国各地召开了28250次鸣放会,群众提出372345条意见,火力多集中于基层党政干部。他们感受到群众巨大压力,很有怨气,要毛主席赶快“收”。有的地方鸣放的矛头也冲着省委。如广东环江县委书记王定,带头搞包产到户,整风中

对省委提了十条意见。省委也坐不住了。反右后即对他们进行报复。《《红色纪念碑》第4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当时袁永熙曾告诉我：“现在毛主席收到各地雪片似地飞来的电报，都怕放乱了，想用‘乱’的情况来告急，压毛主席收。”

由整风鸣放转到反右，有多种因素，其中毛泽东怕脱离广大党内干部，怕批评他发动鸣放搞错了，有损他一贯“英明正确”的清誉，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他赶快大转弯，并改口说他早有反右洞见，是故设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其实不过是为掩饰他对形势估计的错误和倡导鸣放方针的失算，而自圆其说。以示他早就有神机妙算，洞察一切，从而取得党内保守势力的支持，消除对他发动鸣放的怨气，挽回广大党员干部对他的绝对信任和崇拜。

至于就全党而言，除极少数明智的、有民主思想作风的领导干部在毛泽东的威权和来势凶猛的反右气势的高压下，仍极力设法保护一些党内外精英免遭荼毒外，那些不理解或反对双百方针和鸣放的大多数党政官员，对反右的决策则是拥护的，因为“双百”的民主威胁了他们“个人说了算”的传统格局；反右的打压则是维护和巩固各级干部的权势地位的，这与文革只是大树特树毛泽东个人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而打击、剥夺各级领导干部、“走资派”的权力有很大不同。

党夺取政权后，许多干部的心态是“打天下者理所当然坐天下”，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被理解为国家一切资源都属共产党所有，必须听共产党的话，否则就是反党（其实相反，我们党并无独立的党产，其活动经费不是靠党员交纳的党费，而是几乎全部从国库支取的，所以恰恰是我们共产党吃人民和国家的饭）。那些不得人心、受冲击较大的干部，更觉得你们知识分子吃我们党的饭，居然胆敢批评我们，真是“右派翻天”！他们闻讯要反右，立即由满怀怨恨转为兴高采烈，如同获得解放，摩拳擦掌，准备反右立功，一泄整风鸣放中受批评冲击之恨。以致彭真也发出警告：“别把尾巴翘得比电线杆还高！”

如果说，毛提出双百方针意在塑造自己是“开明圣主”的形象，那么，“阳谋”之论则在于掩饰其失信于民、也有掩饰违全党意志搞鸣放的过错，维护自己“一世英明”的权威。如果说发动群

众帮党整风是为防止腐败，坐稳江山，那么，转向反右则是害怕秀才造反，并抚慰干部。因此，可以说，反右是“以攻为守”的策略，而后来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他退居二线，则是“以退为进”，让别人去收拾残局，保留其日后祭起“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批“形左实右”，发动文革。此即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五、大转盘基于多疑善变的“猴性”

由整风而急转反右，还有一个不宜忽视的缘由是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多疑善变、谄过于人的秉性或权谋。1966年7月，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在我身上有虎气，是为主，有些猴气，是为次。”毛的雄才大略，“敢教日月换新天”、推翻三座大山的气概，其虎气无敌；但“虎气”的另一面是占山为王，唯我独尊，容不得异己，“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据李锐回忆，毛年轻时很欣赏的一首诗是《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杨柳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其“猴性”则是他自称的“性不好束缚”而好“胡思乱想”，任性多变。

据李锐同志回忆，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见1980年党内讨论“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定草案”会议第10组第14期简报）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见同上）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

何尝不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六、清华大学的急转弯

毛泽东突然 180 度大转向的谋略，事前从中央到北京市委和清华大学党委，都是蒙在鼓里。清华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时为党中央候补委员，加上他同彭真的密切关系，本是可以通天的高干，可他直到 5 月中旬，也只知道要整风鸣放，而不知什么阳谋。清华党委是 1957 年 5 月 9 日召开党委领导核心和行政处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开始整风鸣放的（见《新清华》1957 年第 181 期报道）。会上，蒋南翔说，现在是要“放”，召开各种类型的会，党委应当自觉地置于内外夹攻的环境中，听取和吸收群众意见，开思想上的矿，沙里也可淘金。还指示校刊“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言论）不登”（这表示并无心要“暴露”视为敌人的右派）。经党委领导人审定的《新清华》发表的会议报道中，也说要“通过‘放’来揭露学校工作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可见并不知道要“引蛇出洞”的阳谋。

到 5 月 17 日（此时已是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后 2 日），在清华党委扩大会议上，蒋南翔发言还要求党员干部“要准备（接受）狂风暴雨来洗刷一下，对领导的要求要严格一些。”他当时是由于处在学校第一线，对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矛头对着自己，感到有压力，怕放乱，因而心存疑虑，以致到 5 月中旬以前，不大放手动员鸣放。到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正式决定反右以后，毛见蒋执行其“阳谋”不力，曾派他的一位秘书林克两次深夜来清华找蒋南翔“了解情况”，转交其“圣谕”，批评清华“放得不够”。这时北京市委大概也受到毛泽东决心反右的强大压力，来一个大转盘，大力狠抓反右。据蒋的秘书说，这时南翔几乎每天晚上都被叫去市委开会。有一次他回来时还很紧张地对秘书说，今天彭真同志又批评我了，说我为什么总舍不得你那些“徒子徒孙”（指蒋还犹疑不定，未把一些学生运动出身的清华干部打成右派）。

看来，这时北京市委领导人才从一味强调整

风的部署中猛转过弯来，急急忙忙紧跟毛的“阳谋”，催促蒋南翔大“挖”党内外右派，好向毛泽东交代。蒋这才于 5 月 24 日急忙亲自到学生食堂广播室发表讲话，号召全校师生大鸣大放。

24 日，清华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很快大字报遍及全校。26 日，北京大学 29 人来校串连，出现了自由论坛。

在正式开展反右斗争前若干天，同各地部署一样，清华大学领导对其所亲信的干部事先“打招呼”，让他们得知毛的反右“阳谋”和部署，一要他们对“右派进攻”（群众批评“硬着头皮顶住”）；二要他们紧急行动起来，选定对象，千方百计动员他们鸣放，将他们的发言中一时冲动的过激言论，断章取义、摘其所要地指令校刊登载，以便扩大战果，“暴露”更多的“右派”。这时才是有意识执行阳谋。不过，也有我这样“不识时务”的宣传部长兼校报总编辑，对这种做法心存抗拒，认为这样故入人罪，有违党的宣传教育方针和共产党员的道德，而有所抵制，结果我被划为“右派”的第一大罪状就是“坚决抗拒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针”（见清华党委“开除右派分子郭道晖党籍的决定”），事后知道，这就是说我抗拒毛泽东的“阳谋”，从而向毛泽东对清华“放得不够”的批评作出了“舍车保帅”的交代。

6 月 7 日，即反右前一天，蒋南翔校长找到他家里谈话，其他 5 位副书记也在座，他们是党委领导核心。把我一个人找去，是因为第二天《人民日报》要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声势浩大的反右大潮。他们要求校刊立即紧跟，争取主动，转入对“右派”的反击。蒋南翔说：“这次鸣放，是一场阶级斗争。”说钱伟长等人的“理工合校”、“教授治校”等主张，意在夺取党对教育的领导权，物理系何成钧教授说“毛主席的太阳没照到清华园”，这些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新清华》应该开始反击。

我却说，明明是我们自己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帮助党进行整风，一下子怎么变成阶级斗争了？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的言论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就是反党呢？我想不通。书记们轮流发言，做我的工作，批驳我的观点，从上午 10 时辩论到下午 2 时，午饭也顾不上吃，还是没有作通。最后我还明确坚持提出两点意见和一点声明：—

是不应当把整风鸣放定性为阶级斗争；二是“双管齐下”，首先应该是整风，应该接受群众合理的意见，“边整边改”，才能表明我们整风是有诚意的，才能团结大部分中间群众；而不应该以反右为主。一点声明是：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在“一二·九运动”中是爱国的积极分子，解放前后也是进步的。划他们为“右派”，我保留意见。4个小时的辩论，以一对六，颇有“舌战群儒”的味道，这就成了我被划为党内“右派分子”的第二大罪状：“顽固坚持反党右派立场”。这也多少反映了党内并非都是一味紧跟毛泽东的阳谋的。

刚开始反右时，清华一些干部对这种180度的大转弯还没有思想准备，甚或抵触，“反击右派”不力。此时，就将他们分批召到市委，由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直接出面做思想工作，动员反右。后来正式拉开反右斗争大潮时，也是由市委派一位领导人来清华，在清华召开的紧急党委会上宣布市委的决定（而不是事先经清华相关党支部和党委讨论通过）：开除袁永熙出党和“停止”11个党委委员和党总支干部的党籍（我也忝列其中）！其泰山压顶、突然袭击的威势，使我们猝然不防，惊诧不已！紧接着就在《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和《北京日报》第一版上发表专题报道，“揭批”所谓以袁永熙为首的清华大学党内反党右派集团（我也被点名

陪批），同时发表社论，号召开展反击党内右派的大斗争。这样，清华就成为毛泽东和北京市委推动反右运动的“先进”样板。

清华在蒋南翔主政下划了571个右派，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也表示不可理解，有所非议。因为她一贯认为蒋南翔是比较持中的。对钱伟长被划为“右派”，韦君宜也有过质疑。她在《思痛录》里写道：

“他（蒋南翔）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提出反对‘抢救’运动，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地划上钱伟长。这是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25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其实，要找解释，固然可以列出直接主事者的一些个人政德与私德上的缘由，但主要还应当从毛泽东的专权和翻云覆雨的权谋统治，以及党内残酷斗争的传统和体制的牢笼里去找。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李 晨）

按需出版

我公司自2004年开展按需出版业务后，深受广大作者的欢迎。5年来已为300多位作者出版了学术专著、回忆录、游记、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也为加拿大、台湾等作者出版了著作赠送大陆亲属友人，成为最有品味的礼物和比金钱更有价值的留给后代的纪念。

按需出版是最新的数码出版方式，有四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难题。(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投入过多印数过多造成浪费。(4)出版周期短，一般在1-2个月。

适用范围：个人著作、老辈遗作；书法、绘画、照片、奖状、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单位或个人旧书翻新重印；单位少量用书。

印数：100册以下最合适。

继续征稿（50本起印）

资金投入：自费。以20万字288页、大32开本为例，50本一般在4000元左右。具体价格视稿件情况确定。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需符合我国出版法规。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和赠送。作者享有著作权。

正文纸张：70克胶版纸（黑白）、128克进口铜板纸（彩色）。印刷质量：上乘。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1号楼1509号 邮编：100085；

热线：13521531088 陶女士。

电子邮箱(E-mail)：173736757@qq.com

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一个小学生在 1958 年的经历

• 高明

1958 年,我 11 岁,上小学(上半年 4 年级,下半年 5 年级)。由于生活在贫困、闭塞的中原农村,见闻十分有限。初中毕业前,我(包括我的许多同伴)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所以这里记述的,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只是当年我所在的那个公社、那个大队、那个生产队的一些情况。

少年儿童集中营——合校

合校,就是把本公社内方圆 20 里左右的几个小学合并在一起。合校是 1958 年下半年的事。

原先的小学比较分散,方圆四五里内就有一个,学生上学不超过 3 里,都是走读,十分方便。这些学校多是初小,每个学校有一至三个老师。

而我上的那个学校是个完小,离我家约 1 里地。它原来是一座寺庙,解放后,和尚们被赶走了,神像被砸掉了,改成了小学,条件虽然简陋,然而在校长和老师们的努力经营下,办得还不错。校园里有一口大井,两排柏树,七八棵梧桐树,郁郁葱葱,很有生气。尤其是十来个石碑还立在那里,下课后同学们经常站在石碑前认字,比赛谁认得多。

我在这里从初小第一册读到第八册,度过了 4 年美好的时光。初小毕业时是 1958 年 6 月,班主任老师让每个同学出 1 角钱,做面锦旗给学校留念,没有钱的同学可交 3 个鸡蛋凑数。锦旗做好后,我见上面写的是“向地球开战,向自然进军”,已露出了不同凡响的战斗气息。

过了暑假到学校去,老师告诉我们要合校了,我们的这所学校改作大队的养鸡场,各家各户的鸡被无偿捉来,集中饲养。饲养员和场长则由大队干部们的女家属担任。自从办了这个养鸡场后的几年里,我再也没有吃过一个鸡蛋。

新学校安排在距我家约 5 公里的村里,这个村的地主、富农比较多,因而瓦房也比较多。由于

合校的需要,这个村的住户都被分散到别的村了,腾出来的房子作了学校。

新学校由 5 个小学组成,各个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搬来了,大家互不认识,各自背着自己的书包(里面除了书本外,还有一个饭碗,一双筷子)、被子、稿荐(一种用麦子秆织成的长条形垫子,睡觉当铺草用),个个衣服破旧,蓬头垢面,像一群逃荒的小难民。同学们的年龄在 6 岁至 13 岁之间,不少是兄弟、姐妹一起来的,大家的脸上挂着惊惧的神色,年龄小的甚至在哭泣。因为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过集体生活了,学校规定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

合校后的军事化生活(其它两化是:思想革命化、作风战斗化)是什么情景呢?

先说吃。学校成立一个大食堂,300 多师生同灶。每个班在教室的墙角,立一口大缸,外面糊上泥巴,为的是保温。开饭时,由值日生用木桶将饭打回,倒进缸里,然后大家排着队,各拿各的碗依次去盛。有的同学个子小,缸又深,盛到最后时,必须俯下身子才能盛到,不少同学衣服上被稀饭糊得硬梆梆、明晃晃的。

早饭一般都是蒸红薯加稀饭(稀饭多用高粱面煮成的糊糊),没有菜,有时调些生萝卜丝。中午一般是玉米糝糊糊,放些萝卜条或菜叶。晚饭和中午一样,偶尔可以喝上一顿汤面条(从来没有吃过捞面条)。吃蒸红薯的时候最多,高粱面窝头、玉米面馍算是好的了,从来没有吃过白面馒头,更不用说肉和鸡蛋了。只是到了春节那天的中午,每个同学才喝到一碗羊肉汤,里面有几个油炸绿豆面萝卜丝丸子。

后来见到有人写 1958 年吃大锅饭的文章,说“吃饭不要钱,天天尽吃好的,大鱼大肉,放开肚皮吃”。我就感到奇怪:我怎么没有碰上这样的好事呀?吃饭不要钱倒是真的,农民干活不拿工资,甚至连工分都没有,凭什么要钱?

再说住。每个班一个集体宿舍,几十个同学住在一起,几十张草垫子一张挨一张地铺在地上,再铺一张席子(谁也没有褥子和床单),找来一块砖头或土坯当枕头,就是我们的床了。老师和我们住在一个房子里,在窗台下面用土坯单独支一张床,上面有床单和布枕头而已。睡觉时各自将自己的被子伸开,一个紧挨一个地躺下。有兄弟二人同校的,弟弟跟哥哥睡在一个被窝里,各睡一头,当地叫“通腿儿”。有的同学家里实在太穷,连一床破被子也拿不出来,只好请求与同学“通腿儿”。实在不行只好躺在墙角,脱下衣服盖在身上睡觉。

那时农村没有电灯,宿舍里只有一盏小煤油灯,到了半夜灯灭了,同学们起来小便时,常常踩到别人的头。尿桶放在门外,夜深天寒,屋里屋外漆黑一片,胆小的同学不敢起来,有的宁可尿在床上。那些六七岁的小同学,半夜醒来哭着喊爹叫妈,真是可怜。

由于长期不洗澡(除了夏天可以到河里池塘洗澡外,其他时间根本无澡可洗),不换衣服(无衣可换),同学们的头上、身上和被子上长满了虱子。宿舍里阴暗潮湿,充满了霉烂的气味。我们长期睡在泥地上,不少同学得了腿疼病(关节炎),有的生了疥疮。

再说学习和劳动。1958年秋天合校后,上课只是断断续续的,主要是生产劳动。秋季开学后,好长时间没有发课本,只老师有一本。老师把课文抄在黑板上,我们再抄下来。记得《在毛主席家做客》、《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等课文,就是抄下来的。教室里贴着毛泽东的话:“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表明劳动是学生不可避免的事,加之青壮年们都被弄去炼钢铁、修水利了,于是干农活的事,便落在我们这些小學生身上了。

我们干的活主要是拽犁子、收红薯、淘铁沙,都是苦活、重活。

拽犁子就是用人工拉犁耕地。生产队牛很少,我们这些小學生便成了牛。每人一条绳子,一头拴在犁上,一头套在肩膀上,十几个人一组。在后面扶犁的多由老师或年龄大、个子大的同学担任。

通常是一吃过早饭就上地了,不到中午开饭

收工不能休息。午饭过后又立即上地。各组各班之间开展比赛,大队干部身披红布绶带在田间巡视,谁落后谁就是“白旗”、“右倾”。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就这样弓着身子,吃力地拽呀拉呀,从早上干到晚上。极度的劳累、瞌睡,不可言状。有的同学绳子断了,一头栽到地上,就睡着了。有的同学去沟里解手,身子一歪,也睡着了。

被耕的土地上,大多留有庄稼茬,十分锋利。我们穿的布鞋,常常被扎透,扎得双脚疼痛难忍,甚至鲜血淋漓。可是谁也不敢喊一声疼,更不能坐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收红薯也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劳动。1958年雨水比较调匀,秋庄稼长得好,尤其是红薯大丰产。由于村上的大人们几乎走光了,就让我们收红薯,村里的老人、妇女也得上地。有几天下大雨,地里泥泞不堪,队长就命令大家赤脚下手去摸,不光我们这些小學生,就连那些五六十岁的小脚老太太,也得赤脚进地摸红薯。已至深秋,天下着雨,刮着风,人人冻得发抖,脚冻得麻木难忍,但队长不说收工,谁也不敢回去。

天晴地干后,先用犁子把红薯犁出来,然后让我们去捡。白天捡不完,晚上接着捡,有时一直捡到天亮。

收起来的红薯堆在地头,本来应当存入红薯窖内,或切片晒干贮藏起来。可是,哪里还有劳动力呢?只好听任雨淋风吹,一堆一堆烂掉。“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翁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咙呼。”彭德怀元帅当年对他湖南家乡“大跃进”的悲叹,同样也是我们那里的真实写照。由于大量的红薯烂在地里,丰产不丰收,夏季的粮食(小麦、大麦、豌豆等)早已被国家征收干净,这就为第二年开始的大饥荒埋下了祸根。

再说淘铁沙。1958年是大办钢铁的一年,所谓“钢铁元帅升帐”、“为1070万吨钢铁而奋斗”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当时我们经常唱的歌是:“小高炉遍地开花,新中国跨上骏马”,“决心像愚公,干劲赛武松,困难压不倒有心人,全国人民大跃进”。

我在公社所在地炼铁现场见到的是:十几个小高炉一齐点火,白天狼烟滚滚,夜里一片火光,十几里外都能看到,煞是壮观。炼好后,铁水流

出,然而冷却后却是一堆毫无用处的铁渣。但是,当时的人们(主要是基层干部)却把这成堆的铁渣视若珍宝,狂呼“我们炼出钢铁啦”,抬着红纸写的喜报,敲锣打鼓地向上级“报喜”。

后来听人说,当时作为炼铁主要原料的铁沙,是铁的一种氧化物,含铁量很低,根本没有冶炼价值。可是,当时谁懂得这些呢?即使懂得,谁敢说这实话呢?于是,成千上万的人们被驱赶到河里淘铁沙。

1958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刚从学校回到家里,队长来对我妈说:“明天你们两个淘铁沙去。”第二天五更里,我们就被叫起来上路了。我和妈妈穿着单衣,寒风刺骨,冻得直抖。一起八九个人中,有一半是四五十岁的小脚妇女。去淘铁沙的村子在一条大沙河边,距我们村20多里,我们赶到那里时,已经聚集了数百人,中老年妇女和小学生几乎各占一半,黑压压的望不到头。

淘铁沙是把含有铁沙的黄沙从沙滩里挖出来,倒在簸箕里,倾斜放在水边,人赤脚站在河里,水深及膝,弯着腰,用脸盆不停地向沙上泼水。黄沙渐渐被水冲走了,黑沙(铁沙)留了下来。每次淘20斤黄沙,可得铁沙1斤左右,约需半个小时。

淘铁沙也是从早上干到中午,午饭后干到太阳落山才收工(大、小便时需向队长请假)。这种高强度的体力活儿,其疲惫劳累可想而知。晚上收工后,几十个人挨个睡在地上,都像死了一样。

交铁沙时,各队之间还要评比,达不到指标的,就给“插黑旗”。黑旗上用白油漆写着“奋起直追”、“落后可耻”的字样,或画上猪、乌龟等,极尽污辱。得黑旗的队,队长必然强迫自己的社员加班加点,或加大劳动强度。

由于长时间泡在水里,又是深秋天气,人一出水,双腿被风吹干。这样反复几次,腿上就裂出了数不清的小口,不停地流血,像千刀万剐一般,许多小同学疼得哇哇直哭。我的腿上也裂出了密密麻麻的小口子,妈妈心疼得直落泪,然而又有什么用呢?

荒唐的“破除迷信”——砸石碑,扒古墓,找砖头

1958年的另一件大事是兴修水利,修堰、塘、坝、打井,需要砖头和石灰;“美化环境”、刷墙、写标语口号,也需要石灰。到哪里去找砖头和石灰呢?干部们把眼光瞄向了石碑坊和古墓。砸了石碑,扒了古墓,劈了棺材,用棺材板当燃料烧石灰,一举多得。

为了消除人们的顾虑——扒坟是伤天害理的事,老百姓们不愿轻易干,于是打出了一个旗号“破除封建迷信”。干部们动员说,能够立牌坊、立石碑、用砖头圈墓的,不是大官,就是地主老财。他们是封建地主阶级,应当把他们彻底打倒,这是破除封建迷信。于是,一座座精美的石碑坊被拆除,一个个高大的石碑被砸碎,一座座保存了上百年的古墓被挖开。当时老百姓们编了个顺口溜:“唐朝的庙,宋朝的塔,共产党来了胡乱扒。”

我们这些小学生们也加入了“破除封建迷信”的行列,具体任务是扛棺材板,搬运碎石碑和砖头,有时还负责烧石灰。方法是在沟边挖一个大洞,上边留个出烟口。棺材板、柴火放在最底层,碎石碑放在上面。点上火,浸透了油漆的棺材板立即燃烧起来。一天工夫,碧青碧青的石碑、牌坊碎块,就变成了雪白的石灰。

我亲眼目睹过扒古坟的一幕。

我们学校所在村庄的附近有一座古墓,据说埋的是清朝的一个五品官。坟很高大,坟前立着一个一丈多高的青石大碑,坟旁栽了许多柏树,长得高大阴森,平时一两个人不敢进这座坟地。

1958年初冬的一天,民兵营长带领一群人,来扒这座坟了。他们先把石碑放倒、砸烂,然后扒坟。20多人干了一上午,才把墓墙打开。老师通知大家下午去坟上搬东西。我们赶到那里时,紫红的棺材已经露出来了,民兵营长手提一把七八斤的开山大斧,站在棺材顶上,连劈了十几下,才将棺材劈开。

当棺材顶盖被揭开时,人们一下子惊呆了!棺材里躺着一个白胡子老头,脸皮黑干,双目深陷,张着嘴巴,黑洞洞的。民兵营长用一个粪耙子卡着那个老头的脖子,“嗨”地一声,把老头拉起来,拖出棺材,扔在地上。

这时民兵营长已累得气喘吁吁,别人又抡起大斧,将棺材彻底劈碎。老师命令我们赶快动手,

同学们不敢怠慢,搬砖的搬砖,抬棺材板的抬棺材板,一路小跑,将这些东西运到指定地点。

搬坟上的东西时,大家谁也不嫌脏。潮湿的墓砖,我们都是用双手托在胸前走的,每人搬三四块。潮湿的棺材板,大的两人抬一块,小的一人扛一块,闻着它发出的怪味,既不害怕,也不恶心,一心想着多搬快跑。因为要是落下“偷懒”、“右倾”的名声,丢人就大了。

至于那具干尸,在露天里晒了两天之后,身上的衣服化成了碎片,自动脱落了,只剩下一具黑乎乎的骷髅。他的后代族人把他放进原来的墓坑里,盖了一层干草,悄悄地掩埋了。一座保存了上百年的古墓,就这样消失了。

惊心动魄的“帮助”方式——辩论

1958年,我们那里流行一种奇特的“帮助落后人的”方式——辩论。这不是一般正常的辩论,是不折不扣的武斗,是强者对弱者肉体的摧残和人格的侮辱,其场面之残忍,令人目不忍睹。

所谓“落后人”,是说了“落后话”或发了几句牢骚的人,比如说过“干活太重”、“光吃红薯”、“大炼钢铁砍树太多”等等,或者偷吃了地里一个萝卜、一把花生,这些事如果被干部们发现,或被别人报告,这个人就是“右倾落后分子”了,就要被“辩论”、被“帮助”。

“辩论”的具体形式,我见到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推他”。“推”之前,干部们先找骨干或勇敢分子们开小会布置,点明辩论对象,然后开大会。干部们讲了某某人的落后表现后,一声断喝:“某某某站出来!”被点名的人站到会场中央,推手们立即围了上去。辩论主持人一声令下,周围的人们就把这个“落后分子”猛推起来。被推者常常被推得东倒西歪,倒在地上,被勒令爬起来再推。在现场的人们,不论是“推手”还是被推者,都是多年的乡亲,或几十年的伙伴,甚至是本家本族的人,此时却成了仇人一般。

干部们见推得差不多了,才发话结束这场“辩论”。一般每次辩论,只推一个人,这样可以经常开辩论会,做到“常流水,不断线;反右倾,不间断”。

二是“挂箩头”。箩头是用荆条编成的筐,用

以装粪运土。辩论时,在箩头里装上土或碎砖头,约20来斤,挂在被辩论者的脖子上。此方式多对已婚的女性施行,挂箩头时,可以让她站着,也可以让她同时跪在碎砖头上。

我们村有一位军人家属,丈夫当兵在部队,当时她约20多岁,一人独居。她娘家是小破落地主,她便成了地主子女。队干部想占她的便宜,她不从,队干部就说她“讲了落后话”、“干活懒”,决定开大会辩论她。给她脖子上挂箩头,还让她跪在碎砖头上。这位军人家属曾上吊自杀,幸被邻居救下。

被辩论的妇女多时,队干部就让她们互打耳光,互吐唾沫,互相骂“你不要脸”、“像坏女人”等。

三是抵架。这是一种最惨烈的辩论形式。多在公社或大队等较大场合进行。每次选出本公社或本大队两个典型的“右倾落后分子”,让他们在群众大会上“辩论”,即像牛羊那样抵架:二人相距七八步远,低头弯腰,主持人喊一声“抵”,二人即飞步向前,向对方奔去。只听“咚”的一声,两个人头撞在一起,力气小的往往倒地。但他必须立即爬起来,然后各自后退,重新再抵。直到二人中的一个实在爬不起来了,这场辩论才算告一段落。

当时我们公社有一个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老钱,30来岁,因同情“潘杨王”(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当时是河南省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集团”)被定为“严重右倾分子”,选作辩论的抵架手。老钱个子不高,身体也不算强壮,却在抵架中连连取胜,几乎没有失败过。事后有朋友问老钱,为啥你总能“赢”?老钱说:“人到那个地方,已经没脸没皮了,大不了一死。你横下一条心,猛冲过去,吃亏反而会小些。”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经验”啊!

几十年过去了,我曾不断想过,是什么力量能够把人性中最丑恶、最阴暗的东西呼唤出来?为什么要把隐藏在人的灵魂深处的野兽驱赶出来,让同类、同志、朋友、亲人之间互相残杀?也许这是个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

(作者系南方医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李正文的奇功

● 张惠卿

1995年11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受叶利钦总统委托,代表前苏联政府授予阎宝航、阎明诗、李正文三人“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奖章,表彰他们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特殊贡献。李正文出席了这次隆重的颁奖典礼。

去年8月31日是李正文同志的百岁诞辰,他逝世已六年。作为他的学生和部下,我十分怀念他。他是我党的一位杰出的地下工作者和隐蔽战线的功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经机智无畏、出生入死、英勇战斗在敌占区上海的无形战场上,屡建奇功,很多业绩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在建国后的动荡年代里,他却历经坎坷。

(一)

1908年8月31日,李正文出生在山东省潍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8岁时全家逃荒到了东北关东的四平街。他从小喜爱读书,勤奋好学,1925年离家到了沈阳,考入奉天省立第三中学初中班上了一年半学,1927年又考入东北大学附属高中文科,以优异成绩读完了三年高中课程,直接升入东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成了一名大学生。

李资质聪慧,领悟力极强,从中学时代起,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他积极参与当时任沈阳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的活动,受到阎宝航的关注和信任。

进入东北大学后,李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托主编一本宣传进步理论的刊物《现实月刊》,但该书不久被沈阳国民党市党部查封,李本人也被通缉。接着发生“九一八”事变,李逃亡到了北平。

1932年初,李参加了北平“左联”,不久被选

为执委兼理论部长。从这时起,李已基本上脱离了学生生涯,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同年冬,李转到北平“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并担任执委和研究部长。“左联”、“社联”高举抗日和民主两面大旗,宣传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爱国民主主张。

1933年10月,经北平“社联”党团书记宋劭文介绍,李正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社联”的党团成员。

当时北平的白色恐怖十分猖獗,蒋孝先的国民党宪兵三团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赤色群众,党组织屡遭破坏。1934年5月宋劭文被捕,“社联”被迫停止活动,李正文已不能再留在北平了。

经在共产国际情报部工作的刘一樵推荐,他决定去苏联学习。1934年8月,李到上海办理去苏联的手续,辗转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35年1月了。

李正文被送到莫斯科郊区一所苏联国防部的专门培训情报人员的学校学习了将近两年,结业后住进了国际人员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谁知一等就是一年多。

当时苏联国内正经历着一场风暴。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不仅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本国的共产党人遭逮捕,很多人惨遭杀害,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工作和学习乃至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也同时遭殃,一批接着一批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审讯,然后投入监狱和劳改营。住在招待所的六名中国人,除一人外,都先后被捕,罪名都是“日本间谍嫌疑”。1937年11月李正文和一位叫吴先清的女同志一起被捕。

李被关进了莫斯科的鲁别克监狱。他开始以为自己的被捕完全出于误会,弄清后很快就会获释,谁知大错特错了。对他的审讯既草率又粗暴,审讯者硬逼他承认是“日本间谍”,还用手枪顶着

他的脑袋吓唬他,李一再抗议申辩,他们根本不听。最后又完全不顾事实,也不要任何证据,就把李定为“日本间谍嫌疑”,并被判处5年徒刑。李正文就这样成了苏联的反革命罪犯。

他在监狱里被关押一段时间后,就被发配到西伯利亚靠近北极圈的一个劳改营服役。这个处于苏联最北端的劳改营,自然环境极为恶劣,一年四季都天寒地冻,最冷时可达摄氏零下50度以下。他们每天都要从事10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每人都有劳动定额,而口粮面包是按完成定额多少来分配的,李正文体弱力气小,累得半死也完不成定额,也就经常挨饿。整个劳改营是一座可怕的人间地狱,不少人就在那里被活活折磨而死,有饿死的,有累死的,有病死的,还有冻死的,死了就抬出去一埋了之。和李正文一起被押解到这个劳改营的几个中国“政治犯”,包括吴先清同志,都先后在这个劳改营里悲惨死去,李正文若不是有幸得到难友姚良的全力帮助,也必死无疑。

李正文这次所以能死里逃生还依靠他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因为他对自己的冤案始终不甘心,他被捕后就不断给斯大林写信,信中还特意引用斯大林本人说过的话,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他坚持不懈地用俄文先后写了60多封这样的信,最后终于出现奇迹,据说斯大林亲自发了话,经过有关部门甄别,于1939年9月向李宣布:“撤销原判,平反释放。”

李是被捕受冤者中极少数例外的幸运者,只被关押了近两年,就逃脱了这场厄运。但苏联当局虽然把李平反释放了,却不准他再回莫斯科,而是“遣返回国”。他是和各地的一批批华侨刑事犯一起被遣返的,辗转押解,经过好几个劳改营,一直到1940年秋天,才从阿亚古兹出境,送到我国新疆的塔城。李正文急于投身抗日行列,他没有在塔城停留,辗转到达重庆。

他在重庆见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徐冰,徐对他说:“你在苏联被捕过,要恢复党的关系,先要有苏联方面正式平反的证明。”李找到阎宝航请求帮助。阎当时是我党重要的地下党员,直接受周恩来领导。他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社会活动家,交往很广,他还是共产国际的秘密人员,和重庆的苏联驻华大使馆有直接联系。他了

解了李正文的情况后,十分同情李在苏联的不幸遭遇,立即告知苏联使馆的武官罗申(罗申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是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请他查询此事。

苏联方面很快来了答复,说“李正文是位好同志,他的被捕完全是一场误会,早已平反,共产国际已决定留他在东方部工作”。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上是苏联在远东的一个情报机构。罗申直接找李正文谈了话,并把这个答复的书面材料交给了他。

李拿了这份平反材料去见徐冰,要求徐同意他回到中国党来。徐却说:“既然共产国际要留你们在那里工作,你就应该接受。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不能和他们抢干部,反正你在哪里都是一样干革命。”李一再请求,徐冰就是不同意。李只好去罗申那里报到了。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人员,罗申就是他的领导人。罗要他先协助阎宝航工作。

阎将李安排在黄炎培先生主持的重庆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任职,作为职业掩护。阎宝航当时身负重任,又有多重身份,需要各方应付,处境复杂艰险,李正文忠诚机智,处事得体,成了他身边最可靠最得力的助手和联络员。



李正文、陈薰瑛夫妇 1942 年在上海

(二)

1941年7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决定派李正文去上海从事对日寇和汪伪的情报工作。上海对李正文来说十分陌生,阎宝航介绍了两个在上海的熟人给他。

李到上海后先找了阎宝航介绍的上海慈幼教养院院长姚淑文,得到姚多方帮助,并找到固定住处,安顿了下来,然后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上海地区情报工作的苏联人尼克莱·伊万诺维奇接上了关系。

尼克莱告诉李:“你的工作是搞日伪军政情报,活动地点在上海、南京、杭州这个三角地带。没有现成的工作人员和工作对象交给你,完全要靠你自己设法开辟工作,要打入日伪的军政机关,尽量多和人交往,这样就有可能搞到第一手情报。另外,要有掩护职业,以便比较安全地在上海呆下去。特别注意不要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任何关系,以免在安全上相互影响,不要看进步书刊,以免暴露自己。”尼还和李约好今后会面的时间和方式。

当时日伪统治下的上海,情况极为险恶。日本宪兵队、汪伪特务机关到处抓人,屠杀抗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市,稍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李正文到达上海时,已成为“孤岛”的英法租界还在,稍有活动周转的余地,但几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孤岛”就不存在了。

凭借通晓英、日、俄三国语言的优势,李正文很快落实了掩护职业。李应聘担任了原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日文教员,给原来以英文做通用语言的工部局职员教日文,职员中有不少外国人,因此日文教员必须懂英语才能胜任。这个职务对开展情报工作极为有利。

李又考取了上海申报馆的日文翻译,为该馆翻译日文资料,同时还受聘担任上海震旦大学的日文教员,有了大学教授的身份。这项工作后来成为李的妻子的陈蕙瑛介绍的,她当时是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不久李就发展她参加地下革命斗争,成为他在情报工作上的得力帮手。

除上海外,李也经常去汪伪的首脑机关所在地南京活动。他发展了一批得力的情报人员,包

括东北大学的同学许家俊、张殿傅,社会科学研究会的陈波涛、沈明钊,还有沈孟先等,他们都是忠诚的革命同志,在李正文的领导下,利用各自的关系,为李开辟了很多情报来源。

通过好友裘维琳,李正文发展了一个叫稽显庭的重要关系。稽是南京汪伪政府秘书长周隆庠的大舅兄,在该政府任文书科长,即高级机要秘书。日伪最高头目每周都要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商讨决定一些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会议内容的记录和整理都由稽负责,整理稿经审定后再打印三份,分送日伪双方有关当局。后来他又偷偷多打印一份给李正文。这些都是敌人的最高机密,据此可以了解日伪的最新动向。

为此李在尼克莱的支持下,付给稽显庭相当可观的报酬,因为稽毕竟不是革命者,他靠他大汉奸妹夫当上了这个伪差,一心只想捞钱买房置地。除会议纪要外,稽还将他从别的渠道获悉的其他情报,也都提供给李正文。

所有这些情报,李正文都交给了尼克莱,但其中很多信息都和我方,特别是同苏北新四军直接有关,必须尽快告知他们。李不知尼克莱是如何和我党联系的,能否及时给他们送交这些情报。有一次他向尼提出,他可否和新四军联系,把情报直接发给他们?不料尼克莱大为恼火,严厉批评李说:“你怎么想到要同中共联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所有情报我们都会负责,你不必考虑。”李试图说服他,他根本不听,还说这是组织纪律,必须服从。

李正文考虑再三,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在敌我斗争如此尖锐复杂的情势下,对这些关系国家命运和抗日事业的大事,他不能完全听从尼克莱。李通过去过苏北根据地的沈孟先很快和我方接上了关系。以后就将获得的情报搞成两份,一份给尼克莱,一份通过约定的传递渠道直接发往苏北根据地。这样,李正文就成了我方在上海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苏北新华分社负责人于毅夫和李保持着联系。

1943年上半年,李正文通过申报馆的同事日文翻译肖百新认识了汪精卫的参军长唐莽。李和唐交往过多次,有一次唐莽透露,重庆蒋政府有个高官的姨太太,最近不断来往于重庆和上海、南京之间,同日伪头目接触频繁,很明显是蒋

介石最近回应日本方面的和平攻势,派此人来作为投降试探的先遣代表,十分可疑。而李正文前不久正得知,汪伪上层人士最近在华懋饭店举办的一次有陈公博市长夫妇参加的舞会上,发现国民党要员孙科的二夫人蓝妮也来了,此人远在中国,怎么会跑到上海这个汉奸窝里来参加什么舞会?李估计这个昔日著名的交际花蓝妮极有可能就是唐莽所说的那个可疑的女人。李将这一情况向尼克莱报告后,尼克莱十分重视,因为此事涉及到蒋日伪合流的重大机密,如合流成功,不仅对抗日战争极为不利,也将构成对苏联的直接威胁,必须设法制止。这以后,这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女人就再也没有在上海出现过。

肖百新还介绍了一位反军国主义的日本友人德田恒夫与李正文认识。德田原是日本的战地记者,他看透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野蛮的侵华战争是日本民族和日本人民的致命灾难,是损华害日的极大罪恶,因而坚决反对。他是一位坚定的反战斗士,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李正文和德田思想一致,相处融洽,并逐渐发展成为知交好友。德田和日方政要常有接触,消息灵通,并十分乐意帮助李正文。他多次为李提供过重要情报,如日本军方掌握的中共及新四军的资料和日方的对策,关东军到达上海的消息,以及日侨的政治活动等。

有一次于毅夫奉新四军军长陈毅之命,潜入上海找到李正文,迫切希望搞到载有日军围剿新四军的详细计划和部署的两本日文绝密刊物。这件事难度极大。李就求助于德田,德田冒了很大风险,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居然从日本大使馆里拿到了这两本绝密件交给李正文。此事曾受到陈老总的高度赞赏。

约在1945年初,李正文派妻子陈蕙瑛代表他秘密赶赴苏北中共中央华中局所在地,见到了城工部部长刘长胜。陈蕙瑛将李正文的历史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他们掌握的有关情况,向



2000年2月,作者(左)和李正文夫妇

刘长胜做了汇报,希望组织上接受他正式回到中国党来。华中局领导研究后,同意了李正文的请求。

日寇投降后的1945年9月间,张执一同志代表党组织来上海接上了李正文的关系。此时尼克莱也已被苏联政府召回国内,李正文名正言顺地回到了中国党的行列。

(三)

张执一同志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日寇投降后,他曾奉命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起义计划取消后,他和沙文汉同志一起负责党的文教宣传和统战工作,和工商界上层人士、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建立密切联系。

1945年10月起,李正文在张执一领导下并协助张开展统战工作,和上海工商界、文教界人士广泛交往。

他应黄炎培先生之邀,担任民主建国会总会的副秘书长,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和活动,他还参加陈叔通老人主持的民主工商界的联谊会,结识了一批著名的民主人士。

1946年8月,以张志让、沈体兰为核心,成立了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很快发展到80余人,包括马寅初、周谷城、周予同、蔡尚思、楚图南、郑振铎、叶圣陶、翦伯赞、杜国庠等一大批著名教授。李正文参加了“大教联”组织,在张志让的支持下,被选为七人干事会成员,分管组织工作。张志让是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在大学教授中有很高威望。

“大教联”的爱国民主活动,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这些活动成为中共中央号召的开辟第二战场、发展第二条战线的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

《大公报》是当时在国统区发行量最大的一份非官方报纸,在广大读者中有重要影响。李正文通过该报记者地下党员李纯青对该报的总负责人王芸生作过多次争取工作,最后在破解了王芸生多年积累的对共产党的疑虑之后,终于说服他愿意接受党的领导。194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李正文作为上海地下党的代表,在李纯青陪同下,和王芸生正式晤谈,当时王特别高兴和激动,表示愿意为全国解放事业服务。他说,上海《大公报》决不随同蒋介石迁往台湾,所有人员全部留下,并正式宣布,从现在起,港沪两地的《大公报》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命令复旦大学迁往台湾,陈立夫亲自动员校长章益,章益已准备从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志让,张志让立即找李正文商量,李要张说服章益,绝不能接受去台湾的命令,想方设法把复旦大学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张志让和章益是至交,平时关系很好。张和章作了多次交谈,最后终于说服了章益,章毅然拒绝了国民党的撤退命令,把复旦大学完整地留在上海交给了新中国。

从1948年秋天开始,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中的许多军政人员感到大势已去,纷纷寻找出路。为适应这一形势,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以张执一同志为书记的策反工作委员会,李正文、王锡珍(陈约珥)、田云樵三人为委员,分别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展开秘密活动。李正文从此时起已完全转入地下,不再进行公开活动。

1948年10月,李奉调去香港学习,作解放上海的准备,张执一也在那里。11月中,张告诉李:“中央通知我们,要邀请上海32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尽快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这也是对他们采取的一项保护措施,以免遭受国民党迫害。上海局决定派你回上海代表中央去邀请他们。”张随即把这32人的名单交给李正文。其中有张志让、叶圣陶、马寅初、陈叔通、周建人、盛丕华、郑振铎、包达三、张炯伯、许广平、沈体兰、周予同、郑太朴、卢于道、储安平、王芸生、傅秉然、宋云彬等。

当时这些人在爱国有罪的国统区上海,已程度不同地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随时有被捕的危险。马寅初、郑太朴早已躲藏起来,叶圣陶等许多人也已不在家中居住。因此必须十分小心地协助他们离开上海,稍有不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察觉,将会给他们招来杀身之祸。

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李正文临行前作了充分准备,他装成一个“高等华人”,从香港到达上海后,把名单藏匿在一个安全处,就开始按照心里背熟的人名一个一个地拜访。

名单中有不少人是李正文熟识的,有的曾是并肩携手、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他们得知后都非常高兴和激动,感谢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有少数人从未和李正文见过面,李就委托陈叔通和张志让分别代为转达党的邀请。最后的结果是,32人中除有一人因事不能脱身而未能应邀前去外,其他人或坐船或乘车都先后安全离开上海到达香港,经组织安排,再转从海路北上进入解放区。马寅初因目标太大,李正文请海关的地下党员孙恩元同志护送他经海关通道也平安地到达了香港。遗憾的是,郑太朴因带病远行,在香港下船时不慎摔倒,抢救无效,不幸逝世。

李正文这次在上海期间,还根据张执一的指示,到南京国民党海军部去会见了海军部办公厅少将主任金声。金声是一位爱国将领,坚决反对内战,革命热情很高。他和宦乡是好朋友。半年多以前,金声就要宦乡为他沟通中共方面的关系,宦乡在香港见到张执一时谈起此事,张就要李正文代表党去南京会见金声。并请宦乡将此事通知金声,告知了接头暗语。

当时局势已相当紧张,李到南京海军部时,

那里岗哨密布,警卫森严,金声在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专用的小会议厅和李正文会见,还把桂永清的上校机要秘书游侠叫来介绍给李,说游侠是自己人,早就有意参加革命,苦于找不到关系,他对海军部大小事情都了如指掌,可说是一部活字典,海军的机要都掌握在他手里。

金声和游侠同李正文联系上后的几个月内,两人就经常带着有关的重要情报,从南京到上海在约定地点和李见面,这些情报都经由他们两人作过精心整理和分析,详细而具体地把蒋介石整个海军的行动计划和作战部署,特别是沿海和沿长江的布防计划,包括炮台位置及其兵力、火力配备情况,还有海军部所掌握的其他兵种,如陆军、空军的调动计划和作战部署等都一一列出,有的还用地图和图解形式标出来。这些情报立即由上海地下党派人送往苏北解放军指挥部。张执一对李正文说:“他们这些情报非常宝贵,是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特别是他们提供的蒋军沿长江的炮台位置和兵力、火力部署情报,对解放军渡江作战的胜利将起到极大作用”。

(四)

1949年初,李正文被派去和以段伯宇为核心的一批准备反蒋起义的国民党进步将领会面。段伯宇是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少将高级参谋,1938年加入我党,后失去组织关系,1942年考入了国民党的陆军大学,在该校结识并团结了一批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同学,经常在一起秘密讨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他们结业后先后分配到了国防部和其他军事机关,都握有一定的军权,彼此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到1948年,他们在段伯宇的引导和倡议下,决定弃暗投明,倒戈起义。大家一致同意寻找共产党的领导,投身中国解放战争的洪流。段通过他的表弟中共党员温尚煜联系到党的关系,张执一了解了这一切后,决定派李正文和他们联系。

李正文和段伯宇一见如故,通过段,李陆续会见了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预干总队少将总队长贾亦斌,淞沪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兼上海铁路指挥官段仲宇(段伯宇的弟弟),伞兵第三团上校团长刘农峻,工兵第四团上校团长王海

嶠,江苏省保安总队少将总队长齐国樑,陆军第九十六军少将参谋长宋健人等人。

段氏兄弟、贾亦斌、刘农峻他们原来的起义设想是联合熟悉的所有部队约有六七万人在江浙皖三省,主要在宁沪杭三角地带同时起义,时间选在解放军渡江作战时,起里应外合的作用。

在段伯宇的陪同下,李正文去了这些部队的驻地,代表上海局策委会和这些要求起义的将领一一见面谈了话,实地了解了他们的实力和情况。然后策委会派遣党的联络员张文藻、周其昌、汪声明、陈景明等同志分别进入贾亦斌、刘农峻、王海嶠、齐国樑等部队。

1949年2月间,上海党组织恢复了段伯宇长期失掉的组织关系,随后又批准贾亦斌、段仲宇、刘农峻、宋健人等人的入党要求。对这些新党员和联络员,都按地下党的特别组织原则,由李正文单线联系和领导。

但是对他们的联合起义计划,策委会和上海局领导经过仔细分析和反复研究以后,认为条件不足不能实行。因为即使加上我党所掌握的其他所有准备起义的部队一起联合起义,也会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而难以成功,只有各自利用有利时机单独起义、分别行动比较合适。上海党对贾亦斌领导的预干总队特别重视,认为在嘉兴的这支部队虽然受到蒋军的重兵包围,起义难免失败,但也应该起义。因为这是蒋经国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王牌“太子军”,是专门训练素质较高的青年干部,用以配备30个现代化新军来支撑蒋家王朝的擎天柱,可说是嫡系中的嫡系,如果它一旦起义,对整个蒋军的震动之大,可想而知,必能达到动摇蒋介石总后方基地的作用,其政治影响无可估量。

李正文在段仲宇公馆向段氏兄弟、贾亦斌、刘农峻等人传达了上海局这些考虑和意见后,很快取得了共识,同时他们对预干总队的起义时机和方法等问题作了详细研究,并立即行动。

贾亦斌回嘉兴后,在联络员张文藻的协助下,在预干总队官兵中开展了准备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大队长李恺寅等一批进步分子也积极配合贾亦斌,在官兵中开展准备起义的秘密活动。预干总队约有近四千名学员,都是一些有文化素质和有思想抱负的青年,他们早就对专制腐

败的蒋政权极为反感，决不愿为蒋介石卖命，因此当得知他们一向爱戴的总队长贾亦斌领导他们准备起义时，无不欢欣鼓舞，热烈拥护。

但是反动的副总队长黎天铎向在溪口的蒋介石父子告了密。蒋介石下令撤了贾亦斌的职，总队长由黎天铎取代。贾亦斌和李正文、段伯宇研究后，决定尽量拖延办理移交的时间，以待完成起义的准备工作。但时间紧迫，不宜拖延过久，于是，贾亦斌就日夜留在嘉兴部队里活动，同组织上的联系，则由李正文去嘉兴和贾见面。4月5日李正文最后一次去嘉兴，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李和贾亦斌商定了整个行动计划。

4月7日凌晨，贾亦斌毅然决然地率领预干总队的3000多名官兵，制服了黎天铎和其他几个反动军官，以去莫干山行军演习的名义，把部队拉出去起义了，他们准备和浙西的游击队会合。

起义部队出了嘉兴后，南京国防部和溪口方面同时接到急电：“贾亦斌叛变，黎天铎下落不明”，这对蒋政权犹如一声惊天霹雳。为除此心腹大患，蒋介石急调四个整师和一个军的一部分，以及江浙皖三省的保安部队、交警部队，甚至不惜动用防守“长江天堑”的陆军和空军，以几十倍于起义部队的兵力，设下重重包围圈和堵截线，并悬赏5万银元缉拿贾亦斌。

起义部队在贾亦斌、李恺寅的带领下，浴血奋战，终因力量悬殊太大，寡不敌众，牺牲惨重，终于被打散。贾亦斌逃出重围，身负重伤，历尽艰险，最后在当地群众和游击队的救助下，安全脱险。国民党的报纸则大肆宣传，说他“已被击毙”。李恺寅也死里逃生，回到了人民的队伍。预干总队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一“从心窝里反出来”的正义行动，震动全国，影响深远，是对蒋家王朝的沉重打击，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伞兵第三团也是蒋介石十分重视的嫡系部队。他们的起义工作早有准备，李正文和刘农峻联系后，发展他入了党，并派去了联络员周其昌，在那里建立了党支部。团副李贵田、副排长孟虎、参谋陈家懋等都是党员，协助刘农峻积极开展起义活动。

起义原准备在解放军解放上海时里应外合，但蒋介石已多次催促该团立即撤往台湾，不能再

拖。策委会决定将计就计，让刘农峻打着奉蒋介石之命撤往台湾的幌子，一出海就改变航向，直奔我解放区连云港。

但连云港和台湾的基隆港不同，没有码头，轮船不能靠岸，只能用登陆艇。于是策委会就请段仲宇利用职权调拨了一艘3000吨的美式大型登陆艇给刘农峻。除可以运送伞兵第三团3000多名官兵外，还有数百人的空余舱位。伞兵司令部就又装了一批武器和通讯器材，要他们带到台湾。就这样，1949年4月15日伞兵第三团的起义，不仅给解放军增加了全副武装的3000多名伞兵，还把这些武器和通讯器材送了解放区。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起义行动，他们在连云港受到了以谷牧为首的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给他们发来了贺电。

王海嶠的工兵第四团是蒋军中配备最精良的重型工兵团，全部是美式装备。蒋介石和国防部多次命令，要该团撤往广州。李正文通过联络员汪声明并和王海嶠亲自多次商讨对策，最后决定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声言服从命令向广州撤退。先是制造借口一再拖延，然后在段仲宇的配合下，把工兵的装甲列车和一批重型机械设备装车从上海运到浙赣铁路金华以南地带，便佯称机车发生故障，必须停下来修复后才能南下，故意东一辆西一辆地停散在好几条铁路上，不仅使工兵第四团再也动弹不了，还堵死了浙赣铁路的许多路段，使蒋军南调部队无法通过。蒋介石一再催促，毫无结果，才发现有变，下令撤了王海嶠的职，并派特务到处缉拿他和有关人员。王海嶠和联络员汪声明干脆一起跑往香港并转道去了解放区，下属官兵则分散隐蔽起来，使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这批车辆和装备始终在浙赣路上躺着，直到人民解放军到来全部接收。

在协助伞兵第三团起义和工兵第四团堵塞浙赣铁路阻挠国民党军运的重大行动上，主管上海一带水陆交通运输的段仲宇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段仲宇还曾机智地保护了铁路职工的大罢工，使他们得以避免特务头子毛森的血腥屠杀，并对许多地下党领导同志进出上海火车站提供了保护性措施。特别是在解放上海战役期间，他率领辎重汽车团起义，加入了解放军，并集中大

量汽车组成追击部队，输送解放军追歼蒋军，有力地支援了解放上海的军事行动。

(五)

1949年4月上旬，李正文刚从嘉兴和贾亦斌会面后回到上海，就发现一个姓朱的关系，被捕后叛变，这几天正带着特务到李平时出入的地方搜捕他，情况危急。组织上决定他立即撤离上海去北平。李将一些未了的工作移交给策委会的田云樵等同志，于4月10日化装潜离上海，转道香港到达北平，从此结束了在上海敌占区长达八年的地下工作。

北平已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李正文在那里见到了原上海局书记刘晓，刘这时已被任命为华东局组织部长。刘要李立即随同第三野战军总部南下，准备接管上海。

5月底，李正文回到了已经解放了的大上海，这里已是人民的天下。

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告知李正文，他已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高教处副处长和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的军代表。随后又任命他为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大学的接管工作。

1950年2月，华东局调李正文担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华东革大的校部在苏州，他在那里工作了两年。1952年2月，李奉调回上海，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复旦大学是李正文最熟悉的一所大学。在复旦大学工作的两年半时间，是他一生中最为留恋的日子。

1954年秋天，李正文被调到北京高等教育部工作，任政治理论教育司副司长。李一如既往，忠于职守，勤奋工作。他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学校的四门政治理论课，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教学指导工作。

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位对党无限忠诚，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过如此重大贡献的老同志，却被怀疑历史不清而不被信任。

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李正文被认为有严重右倾思想和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而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在大小会上无理批斗，最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销职务、留部察看

处分。

1962年全国都对反右倾的错误结论进行了甄别平反，李正文却是个例外，拖了两年后，又给他加上了一条有系统修正主义思想的罪名，不予平反。接着十年浩劫，李一直处在暗无天日的厄运中。直到1979年10月，组织上才给他做出“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职务”的复查结论，时间已过去了整整二十年，李正文同志已是一位进入古稀之年的七十一岁的老人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国改革开放的春风使李老的暮年重新焕发了青春，他很快成为一位活跃于学术界、理论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国际共运史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他都是学术带头人。他思想敏锐，谦虚诚恳，他的文章和讲话富有创意，分析透彻，说理清楚，深受大家的敬佩和欢迎。

李正文同志病故于2002年2月，终年九十四岁。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李 晨)

更 正

读者郝成鸣就2009年第2期靖鸣一文《“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新闻考》提出两点质疑。1、“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间，经查，此系1963年2月11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大跃进时期没有此语；2、范长江是1970年10月23日被迫害致死的，而不是大跃进时期。读者的意见是对的。

第3期第57页右栏第12行“今年拉萨骚乱”应为“去年”；第62页右栏第16行“窃购”应为“窃钩”；第67页右栏第27行“得到映证”应为“得到印证”。

第4期章立凡一文中第41页、44页左栏第6行“冷□”应为“冷通”；第45页左栏第5行“黄绍□”应为“黄绍竑”；右栏注6中的“楼开□”应为“楼开炤”。

本刊2008年第9期第29页右栏第三行中的“三八六部队”有误，应删掉。

贵刊今年第3期刊出我撰写的《人民日报是怎样改正右派的》一文后，我收到当事人方达前辈来信，告知我在第74页“转往江西和河南”标题下第3段文字中的“陈国安”字样是错的，应为“方达”。经检点系初始记录所误，因核对不周而发生错误，特向方达前辈表示歉意！

钱江

另一个段祺瑞

● 杜婉华

段祺瑞是北洋时期皖系的头目。北洋时期应该算近代史最黑暗的时期。军阀割据，相互征战残杀，压榨盘剥百姓，独裁，腐败，阻碍全国统一。段祺瑞更是“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一文早就把他鞭挞得体无完肤。

这是教科书里给人们的印象。

可是，近年我的好朋友张乃惠（段祺瑞的外孙女）多次跟我谈起她外公的情况，却还有另一个段祺瑞。家人心中的段祺瑞很值得深思……

乃惠说：我外公段祺瑞的私生活在当时是有名的清廉朴素，就是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当时人称他为“六不沾总理”。

当然，我外公和当时其他军阀一样，也讨了几房姨太太。听母亲说，外婆怕别人说她太不贤惠，就主动给外公找姨太，当时的第四位姨太，一进门就愁眉不展，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外公就吩咐我外婆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出嫁的事，在当时传为佳话。

外公当了那么大的官，人们会以为他财产不会太少，母亲也能继承他的遗产，还有文物什么的。

其实，外公不吃空缺席，不收礼，除了好家风，什么也没留下。母亲印象最深刻的礼物是当时的江苏督军、后来成为日伪汉奸齐燮元送的，其中一件是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非常惹眼。家里人都喜欢得不得了，都盼望我外公能留下这件宝物。谁知第二天再看，宝物不见了。原来外公一早就派人归还给齐燮元。我外公除薪水外，没有其他收入。他下台后经济紧张，就搬到小房子住。以前从不过问家务事的外公，开始算细账。……

人们不会相信，外公当官二十来年，一直租房住，倒也有过所谓的房产，怎么回事哪？我外婆是袁世凯的干女儿，老袁就以送套房子给他义女的

名义，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是和老袁打牌输了40万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给老袁，可没给房契。等老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外公说，既然房契在人家手里，就应当把房子退给人家，他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这栋房子只住了两年。

但是，不管怎么说，外公曾是堂堂中国的领袖级人物。数千年家天下和世袭传统的熏陶，位高权重的官员总要荫及子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怎么说我舅舅、姨父什么的总要捞个有实权的一官半职吧。

偏偏我的外公不在此列。母亲说，大舅段宏业从小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才回到外公身边，小时候缺少良好教育，文化水平不算高。可能受外公影响吧，特别痴迷围棋，是当时围棋界的尖子。不少人劝外公给儿子在政府部门安排个职位，外公都不答应。我外公是根据他自身经历考虑的。他小时候受的是儒学教育，十五岁的时候因段家遭受劫难，家里人无奈，给他极少的钱让他独自离家，徒步跋涉两千里去找堂兄参军入伍。当兵后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常人无法想象。所以，外公认为，孩子们应该靠自己，从最低层做起，一步步上升，不能一下子就做官。

乃惠笑笑说：“段祺瑞的后代，就像我这样的，平常人，没出息！”

乃惠一直生活在北京，知道北京张自忠路三号（当年执政府，段祺瑞办公的地方），很长时间都作为东城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26年3月18日这里发生了段祺瑞下令枪杀游行学生事件。她知道无论外公如何清廉正派，都没办法掩盖他杀死无辜群众的罪行。

可她强调，这里有一些事情非说清不可。

我们家认为这是千古奇冤。听母亲说，当时我外公并没在执政府，而是在家里。学生游行示威的事，他事先并不知道，怎么能下令开枪。那时候，通

讯可不像现在这样神速。当然,学生们游行是有正当理由的,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目的是要结束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当国民革命军来到天津大沽口与东北军阀奉军开战时,日本帝国的军舰居然协助奉军,并与英美等八个西方国家联合发出通牒,威逼国民军撤退,还要求撤销大沽口的防务。列强公然在中国领土上指手画脚,有血性的中国人当然难以容忍,于是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带领下,先在天安门聚会,随后示威群众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大门,要求进去面见段祺瑞本人。激愤的群众不顾一切地向大门内冲,一个值班营长,见群众来势凶猛,慌了神,脱口喊:“开枪!”士兵听令持枪向人群直射。惨案就发生了。

乃惠说: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又犯了,真是身心交瘁。他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他们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这里说的“被人利用”显然指的是共产党人。不必讳言,外公确有他一贯的反动立场,不会轻易改变。但是他又认为,学生们应该得到同情并给以保护。他颁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请你们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开枪杀人,他何必这样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却不顾自己的痛苦,长跪不起。

当然,有人 would 认为,政客为了平息老百姓的愤怒,有时也会做秀。这,我不好说什么。

乃惠说,我向活到 102 岁的母亲发过誓,一定要还原真实的段祺瑞给世人,特别是晚年的赎罪补过之情。我希望他能得到人们的谅解。

听了乃惠的一席话。我陷入了沉思。特别是这一长跪不起的形象与我心目中的段祺瑞迥然是两个人。

我不会忘记:三一八惨案,死了 47 人,伤了 150 余人。当时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连国外媒体都有反映。国内有良知的社会知名人士鲁迅、周作

人、梁启超、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闻一多、凌叔华等,纷纷发表谴责言论。北洋时期的报刊很多,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晨报》、《现代评论》、《清华特刊》等全都加入批评谴责的行列。特别是共产党员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连续发表了 133 篇各式文章,猛烈抨击段祺瑞政府,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了京城。社交媒体轰轰烈烈的阵势,使段祺瑞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段政府最终以内阁总辞职下台,民间抗议声才渐渐平静下来。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呢?!

按照多年的思维定势,总觉得段的长跪和吃素怕是一种“作秀”。尽管如此,又觉得,即便是“作秀”,在那种特定的环境里,是不是多少有利于缓和一触即发的官民对峙局面,总比警特密布,紧盯捂紧要强一些。

也许我太天真,太善良了?!

(责任编辑 徐庆全)

书屋 2009 年第 5 期目录

书屋讲坛	1919: 一个人和他的国家	马小军
	“五四”感言: 任重道远的反封建	雷池月
	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五四”时卖国贼的两则轶事	徐康
灯下随笔	执政者与国民性	靳树鹏
	宙斯与玉皇大帝之比较	鸣弓
	传统文化的“三大谜团”	李茗公 叶青山
	我生长在铁一号——重读“三·一八”惨案	顾士
人物春秋	郑孝胥与陈三立的诗歌人生	王蕾
	秋郊访黄	吴茂华
	陈丹青的优越感	丁国强
说长论短	文学是什么?	姜弘
	客心惶惑——吴伯箫散文侧记	陈汉书
	英雄的诞生	冯蓉
书屋品茗	想起了张岱的《夜航船》	张则桐
	灯下常伴《夜读抄》	林谷
域外传真	从“帝国式问候”到纳粹帝国语言	赵刚
思史佚篇	出家人的隐权力	吴钩
	“周文疲惫”	
	——试论后世何以不用“鲁”作国号	袁鑫恣
	英国历史上的一次“文字狱”	史敬轩

邮发代号: 42-150 月刊 每月 6 日出版 定价: 6.00 元
地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书屋》杂志 邮编: 410007
电话: 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 0731-5790197
邮箱: nlh5314@263.net

耀邦同志教我们做人做事

——公开一个鲜为人知的批示

• 马懋如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不管情况有什么变化,他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为人,他的所为,有口皆碑。

此时,此刻,回忆起了和我有关,使我感受很深的一件事,容我从头说起:

在那三十年前,拨乱反正之中,全国各地受“文革”之害的群众纷纷来京上诉,出现了一个上访大潮。信访是党联系群众,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耀邦同志极为重视,他说,他没有批过条子,批了很多信。确实如此。

1978年底耀邦同志兼任中宣部部长后,中宣部收到的来信(来访)成倍增长,不少信件是直接写给耀邦同志的。据信访处统计,197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收到来信一千五百多件,一至六月份共受理来信九千三百三十四件,是上年同期的三点六倍。来访者络绎不绝,应接不暇。这里的工作人员少,任务重,条件差。当时的信访处设在部外的一个失修的楼房底层,接待室里仅有一张掉了油漆的乒乓球台子,两张长条板凳,几张旧木椅,一个坐着要陷下去的长沙发;办公室里也只有几张旧桌椅,一部电话机,两个竹皮热水瓶,就此而已。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弱势群体,一批受害者,是血和泪的控诉。那些人哪有钱买信封信纸,不少来信写在废纸上、手纸上、香烟盒的背面或书报的边角空白处……有的信上还留有血、泪的斑痕。不少信件字迹不清,很难辨认。来访者,不少来自边远地区,有的是从监狱或劳改农场出来的,他们中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他们扒火车,或步行数日、十数日,或沿途乞讨,他们身无分文,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含着冤、淌着泪,带着伤痛,怀着极大的希望,来到京城,找中央,找党,找耀邦同志。负责接待的同志怀着很大同情,热情、耐心听取他们的申诉,常常一

谈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半天,十几个小时,还要作安抚工作,为他们解决食宿,还常常拿出粮票、衣物和钱等,解囊相助。他们常常不能按时下班、吃饭、休息,日以继夜,急来者之所急,办来者之所需,毫无怨言。重要的来信、来访,每日必摘要报送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必及时批示下达。耀邦同志对这里的人和事极为关注,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79年8月17日耀邦同志在中宣部信访处写的《信访处今年—上半年处理人民来信工作总结》上作了重要批示。全文如下:

退成绩卓著的信访工作同志

那些默默无闻,但每天每时都在点点滴滴为人民办好事的同志,是深深受人尊敬的,也是值得每个真正的革命者去爱慕的;而那些威风凛凛专说大话瞎话给人民造成损害的老爷或少爷,人民心里是痛恨的,每个真正的革命者也有权鄙视这种人。

“文革”结束后,我从中宣部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到哪里工作,一时还定不下来。已在中宣部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庞达同志把我找去,问我愿不愿意到部的信访处工作。说那里接待信访十分繁忙,要我去担任信访处的副处长。开始我有点犹豫,因为我原是在宣传处工作,信访不是我的本行。庞达同志拿出耀邦的批示给我看。我看到耀邦的亲笔批示,立即被批示的话深深感动。我决定改行,加入了信访工作的行列之中,和那些默默无闻,点点滴滴为人民办好事的同志们并肩,为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做了一点事情。几年来我从中得益不少。

耀邦同志的这一批示不仅仅是针对信访工作的,也不仅仅是批给中宣部的信访工作同志的,含义很深。从中看到了耀邦同志的为人、做事,看到了他所敬重和鄙视的;他所提倡的和反对的……

这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要提倡的和应该反对的。耀邦同志是在教我们做人、做事。他要求我们、希望我们做人,不要当那些威风凛凛专说大话瞎话的老爷或少爷;做事,要甘愿去做那些默默无闻,点点滴滴对人民有利的事。耀邦同志的批示是我的座右铭,我复印珍藏到如今。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昨天不是少爷,今天没有当老爷,明天也决不会当那被人鄙视的人!

耀邦同志离世 20 年,批示时隔 30 年,虽时过

境迁,批文没有过时,没有退色,依然(更加)切中时弊,有益当今。可惜,这一批鲜为人知,在这纪念耀邦同志的时刻,特公之于众,愿与新老朋友共勉!

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批示永远是我们的座右铭!

2009 年 2 月

(作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徐庆全)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锐著	29.50	7.00
潜规则 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 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揭秘	杨天石	60.00	8.00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雷 颐	29.80	7.00
王明传	戴茂林 曹仲彬	38.00	7.00
党史札记未编	龚育之	32.00	7.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张化 苗采青等	59.80	9.00
丁玲在北大荒	郑笑枫	28.00	6.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国史札记	林蕴辉	40.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著 何怀宏译	20.00	5.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6.00
1949 年 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傅国涌	30.00	6.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	闫健编	35.0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22.80	6.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	36.00	7.00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26.00	6.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大寨寓言——“农业学大寨”的历史警示	陈大斌	38.00	7.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6.00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张 胜	45.00	7.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6.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28.00	7.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一场突破禁区与僵化的思想解放运动,身处核心地带、参与和直面大讨论的亲历者,以第一手资料回顾 30 年前的讨论内幕。

《走出个人崇拜》 神化领袖,搞个人崇拜,先后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浮现,并泛滥成灾,如苏联 30 年代——50 年代兴起的个人崇拜,导致肃反扩大化灾难。中国 60 年代——70 年代个人崇拜的狂潮伴随文革悲剧的发生。作者对昔日政坛上的领袖们,以人生的视角做出新的考察和反思……

《丁玲在北大荒》 无罪流放,知识分子 20 年沉重背负的改造史……

《直言》 尝忆 50 年代,为鼓励放胆直言,毛泽东多次谈及,共产党员应有六不怕:不怕扣机会主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六者除头顾虑在,其余皆已身历。自谓因祸得福,筋骨耐劳,心志耐苦,世事洞明,胆气犹壮。今年 80 有余,回首平生,行止无愧天地,得失从不萦怀,素与“左”倾无缘,足以自慰矣!来日无多,请问尚有何眷恋?关怀莫过后来者,忆旧休忘左祸殃,但愿一言堂永绝,神州遍地百花香。

——李锐

《潜规则》 一本伟大的普及读物。作者对历史准确的剖析,为我们打开了中国传统历史真实游戏规则的秘密。

《王明传》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曾名噪一时的人物,是怎样在中苏两国两党的复杂背景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洪流中跳跃与沉沦的,历史的谜团是由历史铸就的,也只有历史的真相才能破解。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这是一部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书,但不同于个人回忆录,书中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作者将了解的情况如实写出来,留给今人和后人探讨。

缅怀萧克老将军

● 黎白

萧克老将军是我的老首长、老师，如果高攀些的话，也可以说是我的老朋友，可以倾吐、交心的老朋友。或者，更确切地说，萧老是一位谦虚、直爽、不计职务高低，很主动地与一些同志倾吐心声，而且言之有物，议论深刻，和他交谈，受益良多。

我从解放战争时期接触萧老——我们的司令员以来，这个感触有增无减。后来，与萧老交谈多了，这种感触就更加深刻了。

萧老是有文化、肯思索、有勇有谋的红军高级将领，也是炎黄文化研究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首先发表了对陈独秀的公正评价，这在当时是很大的突破，有很大影响，也是开天下先的、十分严肃的对党史的贡献。

他坚持不懈几十年创作的文学作品《浴血罗霄》用他在《后记》中所写：“《浴血罗霄》经过五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出版了。此刻，虽然了却了一件心事，但过去的那些艰苦岁月常浮现在眼前。”

我在2002年10月20日有一段记载是：“当年曾拜读萧克同志送来的打印稿，几十年后重读此书，深感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实为真理。此书最大的特色是有真实生活气息，真实反映了当时的人物思想……”

我和我的老首长萧老的往来也是从《浴血罗霄》发展起来的。我们交谈最多的时期是1963年参加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的两年中。那时，党中央决定编写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战史。毛主席签发了组成三个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命令。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主持人是贺龙元帅，副组长是许光达大将。原红六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也是编委会领导成员。我奉调参加编委会对战史的编写工作，分工执笔的主要是红二军团创建发展的历史，对红六军团的历史也必需了解。为此，我多次到萧老家里访问。

萧老都是热情接待，更主要的是，他有惊人的记忆力。红六军团的创建、发展、战斗，讲得十分准确、具体、生动，使我受益极大，也更进一步对萧克同志的才华、儒将风格有了深入的了解，也更增加了对他的敬佩。

与萧克同志交往多了，在他的亲切关怀和督促之下，我写了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南天一柱》。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是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于1934年10月在四川、贵州两省边界会师后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战斗的纪实性文学作品。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辉煌斗争历史在几十年来文学作品中极少涉及，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不必去讲。实际上，这段历史是应该以浓墨着力去书写的。它有其十分独特的地方，也有其很显著的历史意义。

1989年11月13日，《红二方面军战史》修改完成，原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及主持战史修改的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位健在的老同志杨秀山、廖汉生、王恩茂、黄新廷、谭善和、谭友林等和我们几位执笔修史的成员，在中南海中顾委会议室举行了座谈会。会前，萧克、王震同志向我说：应该将红二、六军团会师，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的历史写成文学作品，希望我承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应该以文艺形式反映这一段历史的提法。而我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有写好的把握，所以，当时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因为那时我已接受了参加编写和修改《贺龙传》的任务，时间至少要两三年。即使接受萧克、王震同志提出的建议，也只能待《贺龙传》完成以后才能开始落实。不过，萧克、王震同志的建议，却使我萌发了尽责的想法。我认为我是应该写的，为了中青年

了解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文学形式反映,作为党和部队培养了几十年的文艺工作者,我是责无旁贷的。

1990年3月6日,在军委办公厅审查影片时,我又见到了萧克、王震等同志。萧克同志把我拉到稍后边的沙发上,对我说:“我想了很久,一直想见到你时再更详细地向你提一下,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开辟湘鄂川黔苏区这一年是很应该写的。故事影片、电视剧、小说……都是可以表现的,也是很有价值的……”他停顿了一刹,向我笑着说:“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开辟苏区,坚持斗争,意义很大,可也有些不很一致的微妙看法呢。所以,二、六军团这一年的创建根据地,消灭几个师敌军,坚持在江南高举红旗一年多的斗争的历史,以后在党史、军史上都是很少提起,或者没有提起的。这个么,尽在不言中吧!我找你谈的是再次强调这一年斗争的当时重大意义和以后的深远意义,是应该以浓墨着力去写的。它有其独特的地方,也有其很显著的历史,它表现在:第一,两个军团会师时,总兵力不足八千,弹少药缺,人疲粮尽,是两支各自经历极其困难之后会师的疲惫之师。然而,在会师之后的近十个月的时间里,展开了六次规模颇大的战斗,消灭了敌军三个师共二十几个团,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成为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长江以南之后,惟一在江南与敌进行战斗并取得伟大胜利、开辟广阔苏区的一支主力红军。这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上是独特的,具有很大意义的。因此,写出这段历史,对于加强对我党、我军历史的宣传,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都很有必要的。”

第二点,红二、六军团会师之际,正是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并在长征途中的湘中战役遭到极其严重损失之时,红一方面军撤离苏区时总兵力为八万六千余,湘中战役减员过半,也是疲惫之师。红二、六军团为全力支援红一方面军,以万余人的全部兵力,坚决、果敢地进军湖南心脏地区,歼灭敌军、威慑省府,使敌惊恐万分,急调围堵追击红一方面军的主力80余个团回撤。红二、六军团不计得失地支援红一方面军,全力保护党中央的安全,是在我军历史上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刻

刻做出顾全大局的重大贡献。在我军历史上也是辉煌的一页,在我党的历史上,同样是体现共产主义高尚品德的光辉一页。

第三,湘鄂川黔地区的斗争,是我们二、六军团团结一致,创造辉煌成绩的一年,对贺龙、弼时、王震和我也是经受住了严峻考验的一年。有些微妙的是这一段历史鲜为人知,不必研究是什么原因了,现在写出来,用以启示当代青年也不算晚,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萧克同志很庄重地对我说:“当年的红二、六军团的老同志不多了!军团只剩下王震和我,师团两级几乎没有健在的人了。廖汉生、黄新廷、王恩茂、杨秀山几位是硕果仅存的。我以前自认为记忆力不差,如今也不行啰。当年一些战役、战斗的细节还记得一些,再过几年,恐怕就没有人能讲这些历史啰。你编过红二方面军战史,又参加修改战史,编《贺龙传》,又参加修改《贺龙传》,又是作家,电影剧作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希望你能写一写,对革命历史,对烈士、对青年负责嘛!你我熟悉,是我那个寒舍的常客,随时欢迎你来,我会尽所知详细和你谈的。这是我的请求,也是你的责任,你看如何?”

萧克同志用了“请求”两字,分量太重了,我确深有触动,向萧克同志说:“《贺龙传》完成后,我保证写,写的水平如何,我不敢肯定,只能向您保证,我确有些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只能向您保证竭尽全力。”

1993年,《贺龙传》被审查通过出版。11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首发式。此后,我即着手看战史,查历史资料,访问几位老红军同志。在1996年写出了《南天一柱》十集电视剧本,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投入拍摄。于是,我决心写长篇小说了。

这个创作始末和创作过程先后经历了二十年,扼要叙述一下,也是一个记录、一种抒怀,一个向萧克同志的交待吧!

现在,萧克同志以102岁的高龄跨鹤西去,使我很为悲痛,回忆起许多年以来与我敬仰、钦佩的老首长的交往,倾吐,谈心,受教良多,我认为我应该也有义务写一篇缅怀萧老的文章,以表达我的情感于万一。

(责任编辑 致中)

汤寿潜与晚清立宪运动

● 傅国涌

上距戊戌变法不足十年，又有立宪运动勃兴。在享有全国声望的立宪派领袖中，江苏南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和争路权、办铁路而受到普遍敬重的浙江汤寿潜以“张、汤”并称。

汤寿潜(1856—1917)是杭州萧山(当时还属于绍兴山阴)人，原名汤震，字蛰先(或叫蛰仙)，早在1890年他就写出了著名的《危言》，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早了4年，提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维新变法思想，包括改革考试、任官制度，裁并机构，遣汰冗官，提倡采用西法，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废除捐官制度，迁都长安，刷新吏治，严惩贪官，废除武举，设立武备院，加强海军等，更值得重视的是广造铁路、兴修水利、改革税制、开发矿藏、整治道路、改善环境卫生、实行晚婚等主张，他在《议院》一篇中倡议设立议院，其中对西方议院赞美有加，认为可以仿效并且变通，第一步先以王公大臣四品以上翰林组成上院，军机处主持，其他官员组成下院，由都察院主持，地方上则由绅士、贡生、监生、农工商代表人物组成议院，每有大事，进行集议。同时他提出兴新学、植人才作为议院之本，以开议院作为开风气之先。当然他设想的议院本身还有很多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与西方的议会制度相去甚远，但他提出议院这个思路本身是超前的，这是他立宪思想的初次表达。《危言》的出版使年轻的汤寿潜赢得了维新思想家之名，当时人们将他和唐甄、冯桂芬等相提并论。可以说，他的思想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基本成熟，后来他办铁路、兴实业、推动立宪运动，都从这里可以找到思想的起点。

1892年，汤寿潜中进士，在翰林院呆了三年，1895年3月到安徽青阳县上任，离京前夕，读过《危言》的翁同龢召见，促膝长谈一番，日记中评价他“于时事极有识”。翁在私下以为他“必

为好官”，然而不过三个月他就辞官回乡了。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两次通过浙江巡抚廖寿丰召他进京，以备任用，他因为母亲有病，请求缓行，躲过了戊戌一劫。谭嗣同写给汪康年的信里惋惜，汤是自己素来欣慕之人，“而不会一见”。

汤寿潜在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应该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时，他和张謇等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发起“东南互保”运动，确保了江南的秩序和经济繁荣。张謇说汤是最初的倡议人，当年6月18日率先到南京与张謇等合力游说推动此事。然后，他们奔走于武汉、南京之间，说服了张之洞、刘坤一两位封疆大吏。也就是在这一年12月，他在南京和张謇等人共商立宪之事。1901年7月7日，应张謇的邀请，他们同赴南京，与刘坤一共商立宪事，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当年9月，他写出了《宪法古义》三卷，对元首的权力、议院的权力、行政大臣及法院的权力作了区分，对大臣任责、法院独立、法官选任、刑官终身、陪审制度等都有论述，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第三卷“国民之权利”列举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尊信自由、产业自由、家宅自由、本身自由、书函秘密权、赴诉权、鸣愿权等十几种自由权。在《宪法古义叙》中，他从《尚书》、《周官》等古书中寻找立宪的依据，认为宪法不仅在西方实行，也是中国所固有的，其实是想把立宪的理想与古老传统嫁接在一起。他的这些思想、言论、行动上接1890年《危言》中的开议院主张，而有了很大突破，下启1906年直接成立立宪团体推进立宪。这是他立宪思想的一次集中表达。

1903年，清廷任用汤寿潜为两淮盐运使的肥缺，他托词辞谢。从1895年到1904年，他先后出任金华丽正书院、上海龙门书院(龙门师范学堂)的山长，他深知“教育为文明之导师”，在民智

未开的中国,他想以教育事业来启迪民智,作为立宪的先导,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他就极力赞成。这是他著《危言》以来一贯的看法。但是,教育的推动毕竟是缓慢的,要真正推动立宪,还是有赖于实际的政治行动。

就在这个时候,在《浙江潮》第7期刊载的《四政客论》一文中首次出现“立宪派”这个新名词,从此,“维新派”一词逐渐被“立宪派”所取代,立宪运动的呼声日渐高涨,从体制外渐渐蔓延到体制内,当时声势最大、最用力的无疑是江浙的立宪派,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就是在他们着力推动下成行的,其中当然就有汤寿潜的作用。他是个坚定的立宪派,从那时起持续地通过游说、上书等方式,呼吁清王朝走上立宪的轨道。

从1904年5月起,张謇不断与张之洞、魏光燾等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还为他们代拟了立宪奏稿,汤也参与了包括拟稿在内的这些活动,张之洞没有应承,而是要他们去探询袁世凯的意思。张謇在给袁世凯写信请其赞助立宪的同时,和汤寿潜、张元济等连日会谈,决定游说军机大臣瞿鸿禨和其他达官显贵,来推动立宪。6月5日,他们通过张美翊给瞿转呈了一个说帖,产生初步成效。9月10日,汤又通过章梫连续带给瞿两封信,第一封信鼓动瞿站出来倡导立宪,“以去就争之,岂非中国一伟人乎?”事成,后世将为其树铜像,不成,也可以奉身而退,此举光明正大。他在第二封信中建议,“考求宪法”和保卫主权可以有“一笔两用之策”,这可以作为出国考察宪法的主题。他希望瞿以一片愚公山、精卫石之心,“独为其难,天下之幸”。瞿为之心动。瞿当时深受慈禧的信任,他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慈禧的决策。汤不断地给瞿写信促动,瞿除了面奏派员出洋,甚至希望自己亲到欧美去考察政治。在军机重臣中他受到立宪派的影响最大,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其他封疆大吏、王公大臣的态度也都有变化,各种因素终于促成了1905年冬天的五大臣出洋。

戴鸿慈、端方等考察政治大臣从日本、美国到欧洲考察,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张謇和汤寿潜等四次谒见,竭力劝说他们迅速奏请立宪,不可再延宕。就是这一年,他向朝廷递了一份《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要求维持舆论,制定

报律是用来保障而不是摧残报纸,以合乎宪政之名等。在当时推动立宪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端方等抵达天津时,就有8万名学生上书要求颁布宪法、更改官制、重定法律。可以说,这年9月1日颁布的“仿行宪政”上谕就是顺应了这一时代的呼声,其中确立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

消息传来,朝野上下、商学各界一片叫好声,以为这是千古未有的盛举,到处奔走相告,甚至有喜极而泪下的。张謇、汤寿潜等代表的国内立宪派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无不欢欣鼓舞。汤寿潜写信给瞿鸿禨:“以五千年相延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矣。”内心的欣喜之情毕露无遗。9月9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师、总商会、华商体操会、南市商业体操会、洋货会馆、商学补习馆、商学补习会、商学公会、各学校纷纷开会庆祝,上街游行。16日,上海各大报《申报》、《时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南方报》等联合举办庆祝会,到会的有上千人。江苏各地包括南京、无锡、常州、扬州、镇江、松江等地商会、学堂都召开了庆祝会,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的就是当时普遍的心声:“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全国许多省的情况也都差不多,用立宪派的话来说,“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祝”,这一切都是自发的,不是官方组织的。在晚清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那些自治组织和新兴的学校、报纸,无疑是宪政最坚定的支持力量。当年10月2日《申报》报道说,消息传到深宫,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颇深嘉悦”。

包括汤寿潜在内多少善良的人们,在专制的暗夜中生活了多少个世代,以为清朝真的要踏上宪政轨道了,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平等的人的日子了。不能嘲笑他们的愿望是天真、可怜的,谁又能想到这一切都只是空头的许诺,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1906年的预备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设立了专门机构——编制馆,虽然只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中央体制的改革,实际上的改动幅度很有限,仅以满、汉之分来说,改革以前,各重要部门

大臣都是满、汉各半,改革以后名义上说满汉不分,实际上在 11 个部的 13 名大臣、尚书中,满族占了 7 人,蒙古族 1 人,汉族只有 5 人,反而不如改制前。立宪派由此感到失望。

中央体制大致上确立以后,厘定官制大臣于当年 11 月 5 日通电各省疆吏,提出改革地方体制的方案,计划将地方分为府、州、县三级,各设议事会,由人民选举议员,公议应办之事;设立董事会,由人民选举会员辅助地方官,办理议事会议决之事,逐步推广,设立下级自治机关。另外设立地方审判厅,受理诉讼。从现在来看,以“地方自治”为内核的这一方案,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大约到 1907 年 2 月 17 日以前,各地封疆大吏陆续表明自己的态度,看法不一,众说纷纭,推行难度很大。

最热闹的还是民间宪政派的自发组织应运而生,它们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这是 1906 年慈禧接受宪政改革主张的最大成果,以铁的事实证明了国人对宪政的热忱。最具影响力的立宪派团体就是“预备立宪公会”,1906 年 9 月上旬开始密商、讨论,12 月 15 日在上海愚园正式开成立大会,投票选出了 15 名董事,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成员以江、浙、闽为主,逐渐拓展到国内十多个省及港、澳、海参崴、南洋各地,江西、安徽、山西、四川、吉林等省的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后来也都加入进来。特别是囊括了上海工商界、新闻界、教育界的精英,比如李平书、荣氏兄弟等实业家,《时报》的狄平子、《中外日报》的叶瀚、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张元济等报人和出版家,创办浦东中学堂的黄炎培、杨斯盛,以及孟森、孟昭常、雷奋、杨廷栋等年轻的才俊。“预备立宪公会”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活动,做了大量推动宪政的工作,首先是出版书刊、普及宪政知识,仅孟昭常编的《公民必读》就发行了 13 万册,其次是开办法政讲习所,第三是推动地方自治及咨议局的成立,第四是编订商法。这个重要的立宪团体,每年选举一次,汤寿潜多次当选为副会长,他在 1908 年、1909 年力辞,1910 年还是当选了。

其他各省各种立宪、自治团体也相继诞生。在海外,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

会”,留学生杨度在日本组织了“宪政公会”,梁启超组织了“政闻社”。从上海到日本东京,民间立宪团体的诞生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换,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在 1895 年甲午战败的泪水和屈辱中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那么张謇、汤寿潜这些江浙实业家的代表则从 1906 年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身手,毫无疑问在这一波推动宪政变革的浪潮中,他们的声光盖过了康、梁一辈,这已经是他们的时代。他们与江南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他们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士绅、读书人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汤寿潜和张謇在立宪派中属于温和派,他认识到立宪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民权的伸张,二是法律的制订,三是舆论的监督,法律不仅约束人民而且约束君臣,凡事取决于公论,“尤为宪政之本”。1906 年,他们会两次联名发出请速开国会电,要求以两年为限,在他加的文字中有“时不可失,敌不我待”二语。结果当然是都被搁置。他已看出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在《拟上摄政王书》中指出“今则预备立宪,形式是而精神非”。但他还是没有放弃立宪的立场。

在投身立宪运动之时,汤寿潜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了铁路上面。“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这是张謇为他做传时的概括,他在晚清之所以赢得很高声望,就是因为全身心投入保卫路权、兴建铁路的实践中,并取得显著成效。早在 1898 年,英国银公司与清政府就有《苏杭甬铁路草约》,此后便一直没有动静,连勘测都没有做过。20 世纪初,江浙民间要求收回路权的呼声很高。1903 年在晚清新政改革中,新生的商部准许各地设立路矿公司,1905 年春天,正好有美商到上海活动,试图得到浙赣铁路的修建权。年近半百、素怀实业兴邦之志的汤寿潜就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当年 7 月,他和张元济、夏曾佑等浙江籍名流在上海发起“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他被推为总理(南浔“四象”之首刘镛之子、候补四品京堂刘锦藻为副理),决议向全省人民集资办铁路,获清廷批准,授予他四品卿衔,总理全浙铁路事宜,责成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交涉收回苏杭甬路权。

从 1906 年到 1909 年,浙江境内修成铁路 328.2 华里,沿路筑桥 144 座,平均每里铁路的造价只有 13400 银元(不计建桥及车辆),当时浙江

旅沪学会评价“中国商办铁路,其成效以我浙为最速,其经费以我浙为最省”。这与他本人芒鞋徒步、风尘仆仆、不计劳苦奔走于杭、沪之间,而且不受薪金、不支公费是分不开的。期间还创办了浙江高等工业学堂(铁路学堂),为管理大笔集资款,1907年创立了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然而当铁路开工之后,英国银公司不肯废约,通过驻华使馆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向英方借款。实际上是将铁路抵押给他们。消息传来,浙江铁路公司于1907年10月发起“浙江国民拒款会”,汤寿潜多次电军机处抗争,路潮汹涌,清廷一度想动用武力,军队都已集结。为了把他支走,1909年,先后几次任命他为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每一次他都再三辞谢,坚持留下修路,到1910年8月他还致电军机处反对盛宣怀为邮传部侍郎。清廷指责他“狂悖已极”,将他革职,不准干预路事。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浙江各界、浙江旅居外地的同乡纷纷请愿、集会、抗议,电文雪片般飞向北京,甚至有一个工程师、一个工头以身殉路。一时舆论汹汹,上海《天铎报》、《申报》、《文汇报》、《民呼日报》及各英文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报道,浙江咨议局乃至浙江巡抚都出面请求朝廷收回成命。8月25日,当清廷下令严禁上海、浙江、江苏各地为汤寿潜革职而集会,他在两天后只身前往山东,登泰山、谒孔林,放松身心。而杭州商务总会于8月28日、9月5日两次举行集会,9月9日旅沪同乡几千人乘专列到杭州,冒雨前往巡抚衙门请愿,秩序井然。至10月1日杭州还在举行集会声援。他为了争路权弹劾大臣,顶撞朝廷,不惜冒杀头危险,因此而成为维护主权、艰苦创业的代名词。

在一波又一波捍卫路权的声浪中,混合着要求速行立宪、召开国会的呼喊。1908年颁布的《结社集会律》毕竟给了老百姓结社集会的权利。

1907年12月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公会、政闻社、宪政研究会等团体决定成立“国会期成会”,作为领导全国请愿运动的临时团体,派人到浙、苏、皖、湘、赣、粤、豫等省活动串联。当年12月和1908年1月,张謇、汤寿潜两度和人讨论国会问题,1908年2月,在预备立宪公会第一次会员常会上,讨论了创办私立法政大学(即上海政

法学院前身)、请求开国会、设立“宣讲研习所”等事项,张、汤、孟昭常等都在会上发表演说。同年4月,他们决定派代表到北京请愿。6月7日,他们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邀请全国各省的立宪团体,共同赴京请愿,敦促召开国会,7月12日,“国会期成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目标是速开国会,拉开了晚清国会请愿运动的大幕。浙江的运动就是在汤寿潜直接促动下开展起来的,借助办铁路赢得的社会声望,他对推动立宪运动起到了旁人难以起到的作用。这年6月,他在上海电促浙江各团体行动起来,8月10日推出代表,会上通过了由他执笔起草的《代拟浙人国会请愿书》,再次阐述了他的立宪思想,其中指出:“汲汲需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得以增长其智力。”他认为,国民程度不是立宪、行民权的必要前提,而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可以让人民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水平,议员应是“有才能者,有学识者,多额纳税者”,要给予“天下通才参政的机会”。“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这些思路即便今天读来还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这份请愿书由前礼部侍郎朱祖谋领衔,有8千人签名,包括不少旗人,还有500多名天主教徒。8月20日,由三名代表到都察院递,呼吁“国会迅速成立”。此次国会请愿有18省参与,8个立宪团体还有留学生、海外华侨,签名人数可查的达15万人,各省人民集体向朝廷要权利,“极千古未有之奇观”。清廷的回应是查禁“政闻社”,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九年立宪,一年内各省先成立咨议局,再成立资政院。在接下来的咨议局议员选举中,各地立宪派的代表人物纷纷当选。

1909年3月,汤寿潜在杭州发起“自治筹备处”,受他的影响,商业繁荣的小镇湖州南浔也成立了自治局。1910年,在立宪派推动下,以各省咨议局为中心,先后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国会请愿浪潮。先是1909年10月,张謇决定出面联合各省咨议局要求召开国会。11月,汤寿潜在杭州与张謇会面,他同意张的意见。当月28日,他给朝廷上了一份《为国势危迫敬陈存亡大计》,提出治标之策4条,提早开国会、急筹公债、联盟美国以分日本之势、锐意断发以易短便之服。同时有治本之策4条,注重典学,以培植经国的基本,事

必独断,要有真正负责任的内阁 统筹财政,以解燃眉之急 议决币制,以定国币之价。1910 年,他到广州等地活动,发起集资自办东南铁路,上海《时报》4 月 25 日发表了他在广东向各界呼吁“请开国会”的演讲全文。1910 年 1 月 21 日,王公大臣在请愿代表见面时,庆亲王向代表问及汤寿潜、张謇对此事的意见如何。各代表回答,汤、张都极力主张。这次对话,上海的《申报》有详细报道。可见他们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朝廷,都有不容忽视的分量。

1911 年 5 月,“皇族内阁”出笼,汤寿潜等联名致电摄政王,要求改组,遭到拒绝,至此,立宪运动走到了尽头。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包括张、汤在内有影响的立宪派头面人物纷纷都对清廷投了反对票,汤被推为浙江都督,随后他和张謇一起成为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阁总长。浙江革命党人黄元秀回忆,辛亥之前,他“常与民党中人往还,虽未参加革命,行动早有默契”。正是立宪派和革命派联手把绵延数千年的王朝政治送进了历史博物馆。汤的理想本来是君主立宪,为立宪奔走多年,然而当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

所公认,面对清廷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赞同以美国制度为模范。他写给赵凤昌的信中,要赵运动法国政府承认中国的民主共和制,“法亦民主,能与美同时承认,他国宜不至为梗,庶中国从此不亡。”从他给张謇、张元济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已超越君主立宪的信仰,皈依共和。几年后袁世凯称帝,他坚决反对。

汤寿潜一生对于做官、敛财毫无兴趣,所以才一再辞官,1903 年 4 月瞿鸿禨保举他应经济特科,他不去。同年,清廷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不干。1904 年,他坚辞两淮盐运使。1906 年,学部任用他为头等咨议官,他不受。1909 年,他连辞浙江署财政议绅、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等多项任命。在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一职被革除前,他至少十几次提出辞职。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在近代的历史人物中,论辞官次数之多,也许无第二人。

1917 年 6 月 6 日,他在杭州萧山临浦牛场头的家中谢世,终年 61 岁,葬于桐庐的青山绿水之间。

(责任编辑 李 晨)

广 告

大午温泉度假村

大午温泉度假村位于保定市徐水县,距北京 110 公里(京石高速徐水出口),是以大午温泉地热井为依托兴建的一处园林美景。

大午温泉地热井深 3003 米,井底水温 62℃,出井水温 56℃,日出水量达 1200 立方米。温泉是地壳深处经过几亿年的蕴酿而成,含有多种具有活性作用的微量元素,如钙、钠、镁、钾、锶等离子,有一定的矿化度。大午温泉水质卓越,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

大午温泉度假村地处乡村田野,绿树环抱,鸟语花香,清幽娴静,远离尘嚣,初入使人有世外桃源之感,可谓“源于自然、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若天成”。度假村下设温泉贵宾馆、温泉佳宾馆、温泉游泳馆、温泉露天池及大午企业文化主题公园,馆内设休闲大厅并配备大、中、小型会议室,集温泉泡浴、按摩保健、休闲娱乐、会议接待、餐饮住宿、度假旅游多功能于一体,可观赏田园风光,品尝乡村野味。宾馆高档舒适,价格低廉,服务超值,适合工薪阶层全家出游,更适合离退休老人的休闲疗养。

“古有武陵源,今有大午城”,大午的天是蓝的,水是甜的,人是善良的,诚实善良的大午人,欢迎您的光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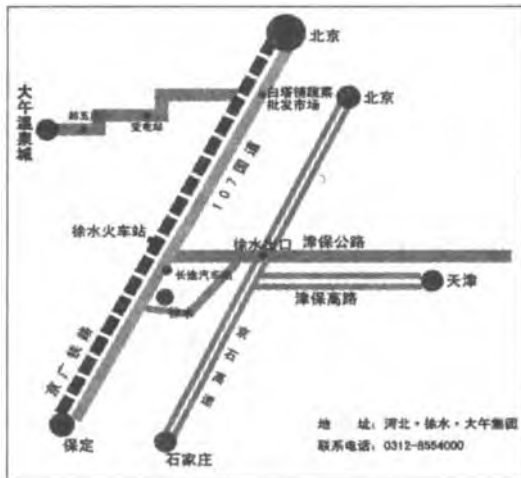
客房价目:大午庄园标间 60 元,温泉佳宾馆标间 280 元(含温泉门票 48 元)。

地 址:河北省徐水县河北大午农牧集团

联系电话:0312-8554000 8554999

自驾:京石高速徐水出口下,沿 107 国道北行至白塔铺蔬菜市场,沿大午集团指示路牌西行 5 公里即到。

火车:从北京西客站搭火车到保定火车站或徐水火车站。大午温泉度假村距徐水火车站 5 公里、距保定市 25 公里。保定市 12 路公交车直达大午温泉度假村。



一个人的抗议史

● 贾西津

每次路过哈佛广场，总可以看到不同的街头表演者。广场有一片圆形的空地，邻凹下地面的地铁站和马萨诸塞街分布向各个方向的路口，半侧阶梯台阶使空地形成舞池的效果，是街头表演最好的位置。遵循“先占先得”的原则，来得早的表演者就占据这片小小的舞台。

有一天是“农民”乐队演奏，在架子鼓手乐不可支的伴奏中，两个演奏者舞着吉他，歌声狂野奔放，引得观看的人围了层层叠叠。我正欣赏他们的

表演，发现“观众席”上一个人，他盘腿坐在路面最高处的石墩上，手里举着一张半人高竖起的牌子，身边还放着一块小牌，同样的黑底白字：“911真相是时候了！”他安静地坐着，看着舞池，什么也不说，就像看表演的众人中间的一个。他的身边同样坐着、站着观看表演、拍照、叫好、跟着舞动的人，似乎也没有人觉得他不是众多观众中的一个。他算是个举着牌子的观众呢，还是在观众中的一个举牌示威者？

我准备凑过去看看他想做什么。移步中，另一个人已经开始和他攀谈起来。我站在旁边听他们谈话，摇滚乐声响彻耳边，两人要大声喊才能听见。他们互相说着911事件还有很多没查清楚，政府的故事不相信之类。见我在旁边倾听，举牌子的先生向我点头打招呼。我问他：你在做什么？另一个人抢先做了回答：911的真相没有搞



在哈佛广场诉求“911真相”的一个人

清楚，他们的报告根本没有说明问题，没有内部人员参与，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单独恐怖分子做不到那些事，布什为了宣战制造理由，政府掩盖了真相。我有些惊讶：你相信政府参与了？他说：我相信，太多疑点了。“你知道除了两座世贸大楼倒塌外，还有一座第7号楼，在完全没有任何飞机撞击的情况下，也塌了吗？”举牌的先生向我介绍知识，并拿出一张明信片指给我看。明信片上画着三张图，是一座大楼第0秒、第2秒、第3秒的连拍示意，显示一座完好的高层建筑，瞬间整体坍塌了下去。图片下有一段说明，黑体的标题写着：第一点，世贸中心7号楼的神秘坍塌。

我确实不了解世贸中心7号楼。搜索一下自己的记忆库，911虽然是个举世震惊的大事件，但在这个热闹纷呈的世界里，它也不过是一个印象派的作品。我听他们继续说明，原来那张明信

片是“911 真相运动”的一张宣传页,911 事件后,陆续有人提出诸多疑点,特别是对于世贸 7 号楼不彰不显地倒塌,以及大厦倒塌方式与人工爆破技术之相似提出质疑;同时,对于政府拖了很久才给出的“官方故事”不满意,认为其忽略了所有的主要疑问。他们怀疑的对象直接指向布什政府——911 事件政府合谋,为伊拉克战争制造理由。

我觉得这个巨大的怀疑与眼前坐在“观众席”上举着一面小旗的孤零零形象颇不相称。仔细听了他的理由,以及后来又看了相关资料,我并不认为他的怀疑没有道理——事实上,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释,确实难以说调查已经做出了结论。比如对于他手里明信片上提出的“11 个关于 911 事件的显著事实”:

1. 世贸中心 7 号楼的神秘坍塌:除了两座大厦外,世贸中心还有一座高层建筑坍塌,即世贸中心 7 号楼——两座塔楼旁边的 47 层钢架摩天大厦,在没有被任何飞机撞击的情况下,于当晚 5:20 分也坍塌了。坍塌方式完全是专业爆破的方式——突然倒塌、爆炸性、原地直立坍塌、接近自由落体速度、完全粉碎、不损及周边其它建筑物——等等 11 个只有控制性爆破技术才存在的坍塌特征。该楼承租人 Larry Silverstein 在 2002 年公共广播电台说到当天下午他就“拆毁”(pull it) 7 号楼向纽约市政消防局提建议,而“拆毁”在建筑学上专指大型爆破,需要专业人员数星期的设计和布置。令人惊讶的是,在 571 页的 911 委员会报告中居然未提及世贸中心 7 号楼瞩目的坍塌。

2. 官方说坍塌是因为着火,事实上除了 911 事件,火从来没有造成过钢架结构建筑的坍塌。

3. 可以检查出爆炸特征的世贸中心建筑钢架,很快被运往海外熔毁了,这是史无前例的对联邦有关犯罪现场法律的违犯。

4. 任何飞机失去联系,战斗机都会常规性地到空中巡查,这种情况平均每年出现 100 次,基本在 20 分钟之内都会实现。而 911 的飞机失去联系却近 2 个小时没有侦察。

5. 安全部门一反既有惯例,在得知美国被袭击并且总统可能成为目标之后很长时间,让布什总统留在一间非常开放的教室拍照。

6. 有未明身份的内部人士在美国航空、美联航和被恐怖袭击影响的有关公司股票上,买“看跌期权”获利数百万美元,这种赌注式行为就发生在 911 前夕。

7. 至少有来自 11 个其它国家的警告说明有可能袭击,911 之前内部人士如军方高层官员 John Ashcroft 和旧金山市长 Willie Brown 被警告不要飞行。

8. 2000 年 9 月,一群新保守主义鹰派,其中很多其后即在布什政府里任要职的人,写信说他们认为:如果“缺乏一些灾难性的和可催化性事件——比如新珍珠港”,他们大量集结军队的计划会进展很慢。

9. 据 BBC 和《卫报》报道,一些被宣布为 911 “自杀劫机者”的人仍然活着并活得很好,据《每周新闻》和其他来源的报道,其中至少 5 人在美国军方基地受过训练。

10. 布什政府抵制 911 委员会的成立长达 441 天,其他类似调查,如对于珍珠港事件、肯尼迪总统刺杀案、宇宙飞船遇难等事件,均在一周内启动调查。

11. 4 个勇敢的 911 丧夫者组成的“泽西女孩”最终促成 911 委员会成立并提出许多问题,但是其中大多问题被忽视。布什政府内部人士 Philip Zelikow 领导下的最终报告,未就任何指向官方共谋的证据做出解释。

另外一份资料来自一个建筑和工程学专家组织,提出了世贸大厦坍塌所具有的 15 个控制性爆破技术特征:

1. 突发:突然开始的坍塌;

2. 基底爆破和闪光:100 名以上目击者报告,在坍塌一秒以前有来自基底层的爆破声和闪光;

3. 自由落体速度:坍塌接近自由落体速度;

4. 均匀式坍塌:是遵循最佳阻抗方式的均匀式坍塌,倒塌在自身地基上;

5. 侧喷:20 吨被支解的钢柱和梁的钢束侧面喷出达 500 英尺(约 150 米)——大量铝热剂燃烧切割装置产生数吨融化的钢铁,会产生此现象,火的燃烧不会;

6. 冲击波:建筑窗户爆出 400 英尺(约 120 米)远的冲击波;

7. 摧毁波:整个建筑周边竖直进程的摧毁

波；

8.空中粉尘 空中粉碎混凝土形成外向拱架烟尘；

9.“蘑菇云” 大量的火成碎屑流形成蘑菇云；

10.“爆竹”：即定焦爆破的起爆雷管特征，在 40 层以下“倒塌”的楼层窗口清晰可见爆炸性喷射物；

11.完全分解 钢架核心柱状结构完全分解；

12.1400 英尺直径圆状残迹 建筑中心向外呈圆形碎片均匀分布区；

13.混合燃烧剂证据 在钢融渣、凝固金属和灰烬样本中发现混合燃烧剂——一种高技术的燃烧剂——的化学证据；

14.粒间融化 联邦应急管理局钢铁分析显示，钢铁样本中有硫化、氧化、粒间融化，这些是铝热剂的证据；

15.融钢 诸多目击报告碎石中有大量融化钢流，物理学博士此前在 Steven Jones 在世贸中心废墟上发现融铁球覆盖整片曼哈顿低地，融铁正是铝热剂的副产品。

在一张下载刻录的 CD 上，大量的采访资料提出了更多的问題，比如世贸 7 号楼的背景，是美国安全局、中央情报局（CIA）、国防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紧急情况管理市长办公室，以及一些银行、保险业等所在，7 号楼倒塌没有人员伤亡；再如一个名为 securacom 的公司负责世贸中心、美联航、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等的安全系统，1996 年—2000 年政府予之 830 万美元合同打造世贸中心新的安全系统，而这个世贸中心唯一的安全系统负责公司恰是布什的弟弟 Marvin P. Bush 于 1993 年—2000 年在任董事会，布什的堂兄 Wirt D. Walker III 于 1999 年—2002 年任主席和执行总裁的一个公司，其他方面还有幸存者目击 911 一周前整个周末的全楼停电、所有安全措施和记录缺失，该周内的反常警报，炸弹搜寻警犬被撤，34 层空楼层的奇怪工程，98 层突然全层搬空，大批人员周末进入“架设网线”等



神秘倒塌的世贸 7 号楼

异常现象 同时更详细的影像对大厦倒塌特征做了解析，包括欧洲的一流专家指出控制性专业爆破的证据。所有这些被提出的问题和证据在 911 报告中均未予提及。

“你明白吗？”眼前这位穿着运动衫、牛仔裤、一头蓬发的先生对我说，“如果证实真是专业摧毁，那就是一场深远的骗局！”

我想，我明白，我认为所有的这些疑问需要回答，而且对于权力所可能制造出的离奇，我们的想象永远都不会超出实际。但是我仍然觉得仿佛看到一场表演秀或者行为艺术——主人公和他要面对的主题比例反差太远了，台下没有观众，也不像街边摇滚可以自娱自乐。他接着说：“说小的谎言是很容易被识破的，如果说谎，就说大的谎言，谎言太大了，就不会被人们怀疑。我看了很多资料，越深入了解越发觉这里面有问题。”

他仍然举着那面不大不小的旗子，黑底白字地写着：“911 真相是时候了！”他的身旁仍然站满了观看摇滚的人，有人随之舞动，人们似乎对这面旗子既不陌生，也不相识。正如我自己的感觉：做了不多，不做不少，那种形象不是很可怜？在心理学上，有一类典型的心理防御机制叫做逃

避,即将自己不能应对的不愉快体验从意识中排除出去,或者当作它根本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对于过度的异常反而会熟视无睹,为了给自己的行为一个合理化理由,甚至会加入认同,并把追究不放的个体视为“唐吉珂德”式的滑稽一笑;也不难理解,有人要把已经有“答案”的难题重新翻出来再验算一遍,一定不受欢迎。在 911 事件上,美国人的反应也是如此,一种普遍的态度是——免谈。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说。“怎么会?”他回答,“那么多人死了,美国被带入战争,又有很多人要去做战士,美国需要对它的政策做出反省。政府掩盖真相,但秘密不可能被永远保有。”

“美国有很发达的媒体。”“主流媒体一样是大集团利益控制,他们根本没有指出很多关键问题。”

“那你一定期望今年总统大选改换党派来追究共和党?”“改换党派或许会有帮助,但不能指望通过他们做出独立调查。你来自哪儿——噢,你们有个一党系统,我们有个两党系统,其实都一样,民主党、共和党,区别能有多大?他们一样不会愿意触动这件事。美国说它是民主的,别相信它!——不过有一点,确实很重要:你可以表达。我想我在中国做这些事就会被警察抓了。”一旁的攀谈者说了句:人们不关心,也是一种控制,我宁愿有危险,让人们听到。这句话更让人感到一种深不见底的无奈。

“媒体、党派都不可能,你希望通过什么‘有用’?”“公民。更多的公民。只有更多的人意识到问题,我们才可能推动真相。——事实上,人们只要获知信息,就会对政府的 911 故事产生质疑,现在很多人只是不知道,公众处于催眠状态,关键是让他们知道真相。我让一个人了解了,他就会告诉他身边的人,知道的人再传给知道的人,了解的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加入其中。”

“可是好像人们并不关心。”“因为我们总是期待别人去做。人们总是想:会有人去做的。不,没有人能替你做。一个人必须自己行动。”

“你一个人能做什么?就是谈几十个、上百个人,又怎么样?”“不,你说错了,我不是谈了几十个、一百个,我从 02 年就开始做,到今天为止已

经谈了上千人。”他认真地纠正我随口使用的“白发三千丈”手法的措辞,“我并不是一个人,很多人加入‘911 真相’运动。今天和我在 02 年开始做的时候已经有很大变化,比如他——我们两人从来各自不相识,今天一见面却发现原来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现在在街上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02 年的时候就不会。”才刚与他攀谈的那位先生点头认可:“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虽然各自有不同的方式,不一定相互知道,但是大家在走向一个目标。”

“是这样的。比如我自己,我就是因为 02 年听到有人向我介绍,然后我从网上、其他地方去找看资料,大量的资料使我发现确实有诸多疑点,才开始认真关注,后来逐步开始自己做宣传。我自己从网上刻录了资料,给人们看。”举旗者说。另一位先生继续同他切磋:“哦,你是这样做。我还举办了很多活动,宣传、抗议、示威。”

“你们这样做没有遇到过麻烦吗?”我问。站着的先生说:“我被警察抓过。我知道他们非常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话题,有的聚会激烈起来,就会和警察发生冲突。”我问他既然是公民自由,什么情况警察可以干涉。还是举旗的人向我做了回答:“这必须得掌握尺度,警察可以找各种理由,比如交通、你不能有肢体冲突等。”“而且,”他笑了笑,“街头警察有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权力干涉,但他们会‘讹’你。比如你在一个地方,街警会过来要求看你的证件,给你指定一个什么地方等,很多人以为既然是警察,自然得听从,就给他证件看、去他指定的地方。但是如果你知道,他没有权力要你的证件,或者不让你呆在一个地方,他就没有办法了。比如我会告诉警察,他没有权力要我这样做,但同时我绝不动手或者对他抵触、冲突,那么他就只能让我继续呆在那。如果他动手挪动我,那他就惹上大麻烦了,对警察的肢体接触也是规定很严的,他们不敢那样做。很关键的是公民要知道自己的权利——很多人并不知道。”

看来权力和权利的博弈,像猫和老鼠的关系一样是天下无国界的嘛,我暗自想。“你的最终诉求是什么呢?”“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重新对 911 过程做出评估。只有具有传票权的真正独立的犯罪调查,才是有意义的,布什政府成员领导

的那种调查团简直是开玩笑。你看材料就知道,还有上百的事实与官方的 911 故事相冲突,需要做出解答。”

我问他们:你们认为自己做下去有可能得到 911 真相?两个人却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未来的乐观。示威者举例:“就像珍珠港事件,肯尼迪被刺,可能不会有无疑的结论,但我们总会更接近真相。比如俄克拉荷马城恐怖袭击案——你看,我以前就不曾知道这个小城的事——在看资料的过程得知,1995 年它遭到恐怖袭击,调查官已公开承认可能有政府合谋。911 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还不知道情况,但只要做下去,总会逐渐清楚。当初布什政府抵制 911 调查委员会,不也是因为几个人坚持不懈,才有了推动。”

“我们虽然各自在做,却并不孤单。已经有上百的组织和许多个人加入其中,数百名建筑和工程专家联合要求重新调查,并在邀请更多的专家加盟。你可以看这些网站和资料,人们有很多行动,这个行动在不断扩大,相信有一天——秘密不可能被永远保有。”

当回来从网站咨询上链接出去,我发现对那两个孤零零的身影感以“可怜”也是件很可怜的事。有那么多的人、组织、运动,如那两位先生描述的“滚雪球”式的方式,与“911 真相”运动联成一体。他们所做的方式、动机,或许很多样,但它展示了社会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容留了一个个体抗议强大权力的可能。

可以看到个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到“911 真相”运动。教授、民权运动顾问、记者、普通个人,通过参与组织、组织活动、媒体报道、个人网站持续不断地关注“911”。上述提到的 512 名建筑和工程学专家、2610 名包括建筑和工程学学生在内的其他支持者,签署递交国会的请愿书,要求真正的独立调查。

有公共网站记录着“911 以来失去的公民权”,记载下政府对于公民权利所做的不良记录。包括在言论、出版、隐私、机场和移民安全、对权利和自由的强制等方面的自由权利记录,以及在法律变革,囚犯权利,保密,监视等方面的权利记录。

更多的组织和运动与伊拉克战争关联,斥责政府用谎言制造战争。如成立于 2004 年,目前已

有来自 49 个州及加拿大、美国军方和海外的 1300 名成员的伊拉克退伍兵反战组织 (IVAW),其宗旨在于使得军队各方人员可以聚在一起,共同反对非法、非正义、不可胜的战争。他们提出了如下十条反战理由,包括提出士兵有拒绝非法战争的公民权利:1. 伊拉克战争立基于谎言和欺骗,在 911 之前就酝酿战争,谎称化学武器、隐瞒伤亡人数 2. 违反国际法,不经联合国安理会同意攻击和占领伊拉克,违背了进攻伊拉克理由同样的法则 3. 大集团靠战争牟取暴利 4. 每日累增的人员伤亡 5. 士兵们有权利拒绝非法的战争 6. 由于政府失职使服役者面临严峻的健康恶果 7. 战争使我们的家庭分离 8. 战争债券掠夺了家园建设非常需要的资金,将每月 103 亿美元用于战争 9. 战争践踏了伊拉克人权和他们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 10. 军队被几度的部署调度、强制扩编、动用预备队和后备役等消耗得疲惫不堪。

还有一些带有专业技术性的网站,数字化地教育和帮助公民参与国家政策。如国家优先权计划 (NPP),是一个 501 (c) (3) 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它们通过提供联邦数据分析,让人们明白进而能够影响他们的纳税开支使用,向国家问责其每元钱被花到哪里。在 NPP 网站上,放置着一个伊拉克战争计数器,以每秒近千美元的速度持续翻新,显示开战至今已经支付了 5700 多亿美元,平均每天 34.14 千万美元,合每个家庭分摊 4681 美元,每人分摊 1721 美元。在“你的纳税钱能被花得更好吗?”栏目下,人们可以选择看自己所在州的更详细情况,并看到这些开支如果优先用于其它用途,本可以做的事情——也即政府优先开支了某个项目所意味的代价。我选择目前所在的马萨诸塞州,查到本州纳税人为伊拉克支付了 185 亿美元,这些资金如果用于他用,可以为 5,556,422 人买一年保险,或者 6,951,852 孩子一年的健康计划,或者支付 363,689 个公共安全官一年的工资、或 317,450 个音乐与艺术教师的工资、或 265,270 名小学教师工资、或 312,105 名港口集装箱检验员工资,或者 1,932,158 名大学生奖学金,或者 64,395 单元廉价住宅,或者一年的 28,904,954 个家庭再生电,或者 2,217,591 处儿童场所(顺便看到,马萨诸塞州纳税人为华尔街救市计划支付了 198 亿美元,比伊拉克战争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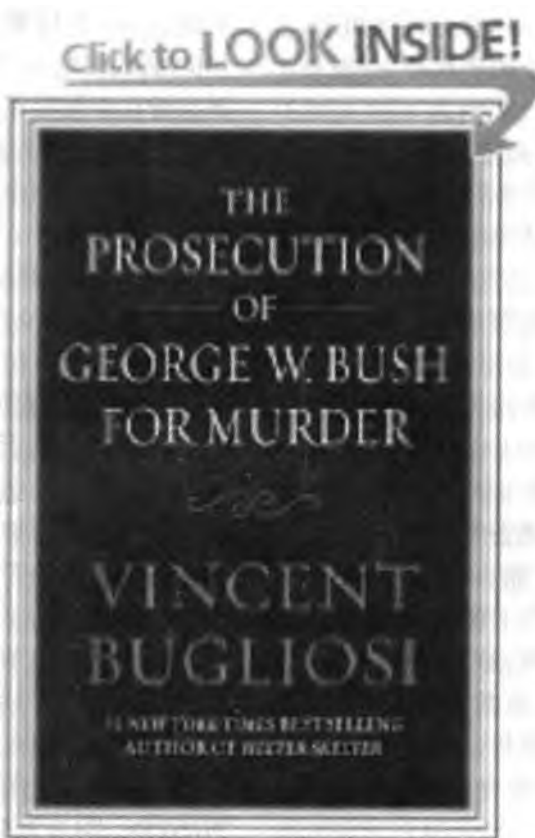
还要多)。类似的网站还可以计算个人支出,比如你如果是一个 10 万美金收入的家庭户主,可知自己 2007 年缴纳联邦税 20,175 美元,其中 6,980.41 用于伊拉克战争——包括 2,317.61 美元已支出资金和 4,662.80 负债(士兵健康保险、残疾补偿等需要支付尚未支付的费用)。精细的计算和比较,不禁让人有切肤之感,什么叫纳税人“自己的钱”。

有一本新书连登《纽约时报》畅销榜排行首位,是畅销书作家 Vincent Bugliosi 的《起诉乔治·布什谋杀》(The Prosecution of George W. Bush for Murder),论述布什用谎言制造战争,构成对几千人的蓄意谋杀。它并不是一部泄愤或争夺眼球的幻想小说,作者表示自己用大量严肃的证据,目的很简单要做一件事:带来正义。

有读者随即为之建立网站,发起倡议,准备给全美每位首席检察官和众议院选区检举人送达人手一册,以“相信有勇气者在这个国家重树法治规则,让‘没有人在法律之上’不食其言”。

再进一步,佛蒙特州律师 Charlotte Dennett 与刑事检举人 Vincent Bugliosi (也即前述畅销书的作者)联合宣布要将布什诉之法律程序。进步党候选人 Dennett 正在佛蒙特州竞争首席检察官一职,承诺如获当选,将任命 Bugliosi 为特别检举人,立即对布什、切尼、赖斯等人提起诉讼。“911 真相”运动相关组织在力推助其当选。该州参议院 2007 年 4 月即通过决议,呼吁国会弹劾布什和副总统切尼,其中两个镇今年 3 月投票通过提案,要求起诉布什和切尼因伊拉克战争违反宪法。

随着不断了解信息,我发现,那个举着小旗的孤单个体与巨大的权力体系之间的天平,令人惊讶地晃了晃。公民表达、社会运动、数字化易化



畅销书《起诉乔治·布什谋杀》

的公民参与、公民教育、法律程序,这些使得弱小的个人不再没有意义,他们本身又是个体不断抗议强权的结果。有一本书叫《大卫为什么会赢?》取自圣经故事牧羊人大卫战胜巨人的故事,讲述弱者的倡导力量。自由,最终是个体层面的,任何集体和权力都有自我扩张的本性,民主产生的权力也不例外。布什政府到底有没有“弥天大谎”,能不能构成蓄意谋杀,就像所有与权力集团相关的谜团,都不会有一个简单的结果。公民的权利运动,虽然未必能让我们“知道”真相,至少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可能“不知道”真相——有多少历史,明白后者与做到前者是一样的困难。

广场上的摇滚乐演出结束了。示威者也起身准备“收工”。他同乐手打招呼聊几句,原来摇滚乐手和他是认识的,而且乐手本身也是要求追究“911 真相”的一个人,其个人网站上表达了很多对布什政府、911 事件、伊拉克战争等的观点,并用了 James Baldwin 的一句话:“对现实闭上眼睛只会导致自己的覆灭。”原来来广场示威的先生还是哈佛大学做计算机技术的工作人员。看来这个运动涉及面真是挺广泛。

“人都是一样的!”另一位攀谈的先生扬起双臂,做出一个滑向远方的姿势,“我去过中国,人们很热情,我喜欢那里。人民就是人民,人都是很好的。”

“政府就是政府?”我把他潜在的话补足。他竖起大拇指向我示意:“祝你和平、自由、快乐!”

我说:“我会把你们提出的质疑记在我的笔记里,因为我也你们传递了信息的一个人。”是为此记。

(写于 2008 年 8 月)

(责任编辑 李 晨)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炎黄春秋》隆重推出 2008年精装和简装合订本

为了方便读者收藏和保存，我社将2008年杂志装订成册，分为精装本和简装本，简装本又分为全年合订本和上、下半年分装本，有需要的读者可直接向我社汇款购买：

合订本的价格（不另收邮费）：

精装本：85元 简装本：80元

上、下半年分装本：90元（不拆卖）

汇款信息：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炎黄春秋 YAN HUANG CHUN QIU 2009年第**5**期

五四运动及民族主义的走向

大学大学：何时再有蔡元培

住房改革的由来与现状

从我的经历看反右

李正文的奇功

国民党在大陆“二五减租”的失败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6.90元